

整風文獻

訂正本

解放社編

華東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四月

213

整風文獻

訂正本

解 放 社 編

華東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四月再版

整風文獻 (訂正本)

編者 解放社

印行者 華東新華書店

· 一九四九年四月渤海版 ·

再版 1—5000

目次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 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毛澤東	(一)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七)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	(二九)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四九)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五三)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毛澤東	(六三)
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	毛澤東	(六七)
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	陳雲	(七三)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劉少奇	(八〇)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劉少奇	(九九)
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劉少奇	(一四五)
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	劉少奇	(一四九)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劉少奇	(一六〇)

CASO 10

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一六九)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一七六)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 (一八三)
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	劉少奇 (二三二)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二四六)
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二五五)
反對黨內幾種不正確的傾向	(二六五)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二七二)
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二七七)
宣傳指南	
列寧是怎樣進行宣傳的	(二八二)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羣衆化	(二八四)
魯迅論創作要怎樣才會好	(二八八)
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	(二八九)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二九一)
『聯共黨史』結束語	(二九四)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三一二)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三五四)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 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 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一九四一年七月以來，中央關於黨性的決定、調查研究決定及其他決定，最近毛澤東同志關於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及反黨八股的報告，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銳利武器。為了使幹部充分掌握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的精神和實質，並在工作中運用這一武器，必須認識這是一個長時期的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的問題，如果以為討論一次就解決了問題，是沒有那樣容易的事情的。

鑒於前次討論中央關於增強黨性決定和調查研究決定的經驗，其缺點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及行政領導機關很少有準備的有計劃的組織這一討論，而讓一般支部自行討論。其結果，多數支部只做到就文件討論文件，沒有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實質，更沒有進一步發揮這些文件，即是根據文件的精神實質，來檢討本部門的工作及每個同志的工作與思想，發揚其成績，糾正其錯誤，鞏固黨內團結，創造正確作風。但要這樣做，單靠一般支部進行討論是不可能的，單責備支部也是不可以的，首先必須黨的各部門領導機關的負責人把這種責任擔負起來。又鑒於個別機關雖是由行政方面領導討論並檢查工作，但沒有在幹部中預先研究清楚，醞釀成熟，及周密考慮各方面情況，以致發生某些不適當現象，今後亦應避免此種情形。因此，本部對於研究及討論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的方法，特有如下的決定。

(一)各機關各學校對於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報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在考察別人亦是如此，必須作歷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話不說的態度是不對的；避開自

己、專攻別人的態度也是不對的。

(二) 各部門的(包括黨的和行政的)負責人，在研究及討論中央文件時，應有準備有計劃的來領導這一研究討論過程。然後好好的想一想本部門及本人的工作，並與他人交換意見，擬定檢查工作的計劃。然後着手檢查本部門及每個幹部的工作。然後做出改進工作的結論。這是由研究到檢查到結論的不可缺少的程序。在檢查工作時，不要泛泛的檢查，而要切實的檢查。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與各個側面的。不只是揭發與糾正缺點及錯誤方面，而且要發揚與鞏固成績和正確方面，並要估計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那一方面是次要的。如此，方能運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實質，澈底改造本部門的工作，澈底改造每個同志的工作作風與思想作風。

(三) 討論及檢查的方式，應以上面領導和發揚民主同時並重，不可偏廢。只有上面領導，而不啓發下面的積極性，是不能澈底討論文件與檢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積極性，而沒有上面的領導，會使討論與檢查脫離正確方向。發揚民主的程度又要依據各機關不同性質的情況有所伸縮。在某些機關內應組織檢查委員會，此委員會內包括該機關領導同志及從工作人員中吸收的人員。在某些學校中，除領導人當然參加並負領導責任外，可以用選舉方式，從學生中選出若干人參加委員會。在

討論中要發展爭論，在規定檢查期間內，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意見，都得自由發表，不得加以抑制。但領導方面應善於注意把錯誤意見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去，不得將錯誤意見變成結論。

(四) 研究、討論與檢查的目標是爲着徹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內容，認真的切實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改造工作，團結幹部，團結全黨。一切與此目的相違反的言論及行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討論與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澈底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坦白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爲善的。而一切冷嘲暗箭、誣毀謾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都是不正確的。在討論中，應時常把握毛澤東同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警語，對於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進步，即使是在進步中尚不免有錯誤，也應鼓勵他，幫助他。要歡迎每一同志的微小進步，從此去爭取他的完全進步。要使同志們懂得：我們是爲此目的而去使用批評武器的。

(五) 研究中央指定文件的時間，各機關規定爲三個月，學校規定爲兩個月。然後開始檢查工作。其檢查工作時間，由各機關學校自行規定，取得上級同意。個別機關學校已經實行檢查並得中央同意者，不在此例。

(六) 在討論與檢查期間內可以用簡報，並設簡報委員會領導之。

(七) 有非黨人員共同工作的機關，應與非黨人員一道進行討論與檢查。

(八) 各機關學校討論及檢查工作的最後結論，須由上級機關批准，其重要者須得中央批准。各機關學校自己做結論後，在上級或中央尚未批准之前，對結論有不同意見者，允許向上級或中央申述其意見。但一經批准，便須服從。

(九) 政府中軍隊中的黨組織研究及討論中央文件的辦法，完全適用本決定，但檢查工作的民主範圍，須依情況有所增減。其辦法由西北局及總政治部規定之。

(十) 參加討論文件與檢查工作者以幹部及閱讀中央文件者為限，學校中包括學生在內。

(十一) 爲了考察幹部及學生是否確實了解中央文件及本決定的內容與意義，本部決定舉行普通考試一次，其辦法另定。

(十二) 規定下列十八個文件爲幹部(學生在內)考試的範圍：(1) 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2) 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3) 康生兩次報告；(4)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決定；(5)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決定；(6) 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決定；(7) 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決定；(8) 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9) 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10) 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11)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12) 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13) 斯大

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14）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15）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16）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17）宣傳指南小冊；（18）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增加下列四個文件，作為第十九到第二十二文件：

（19）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20）列寧斯大林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21）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22）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

爲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爲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要是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因爲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敵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敵人作艱

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確。

那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確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一種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這個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

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列主義的，它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

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際聯系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

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爲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

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作興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末，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较最無

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吧，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

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牠，牠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

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讀聯共黨史這樣馬糊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看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去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括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因爲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并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怎麼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爲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噎消食經呢？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

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嗎？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治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的統一團結。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與團結全國人

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鬧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的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燾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綫的錯誤。現在講的，雖然不是張國燾、李立三那樣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黨員，每一局部工作，每一言論、文字或行動，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鬧這種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大笑）。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

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爲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裏來了。這種人吃虧就在於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的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是老實人？馬恩列斯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是不老實？托洛茨基、布哈林、張國燾是大不老實，李立三也不老實，爲個人利益爲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不老實。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爲得計，自以爲很聰明，其實是最蠢的人，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都要清除乾淨。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與宗派主義。

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是團結的，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因爲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因此，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同志必須懂得，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的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否則是不可能的。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

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與聯系羣衆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形，對於與陝北人民的聯系，我比高崗同志他們就差得多，無論怎樣進行調查研究，比起陝北幹部來總是要差些。我們到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如此，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因為根據地內的各個區域有發展前後之不同，幹部中也有外來本地之別，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到比較落後區域裏去，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就一般情形說來，凡屬外來幹部負領導責任的地方，如果與本地幹部關係弄不好，那末，這個責任主要的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主要領導的同志，他的責任就更大。現在對這個問題的注意還不够，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譏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土包子！」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幹部的重要性，既不了解本地幹部的長處，也不了解自己的短處，所以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一切外來幹部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經常幫助他們，而不是譏笑他們，打擊他們。自然，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狹隘觀點，以求與外來幹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義的傾向。

軍隊工作幹部與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必須完全團結一致，必須

反對宗派主義傾向。軍隊幹部必須幫助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必須幫助軍隊幹部，如有糾紛，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各對自己作正確的自我批評。在軍隊幹部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的身上。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責任，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方能使根據地的戰爭工作與建設工作得到順利進行的條件。

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的傾向。調幹部則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鄰為壑，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就叫做本位主義，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樣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要危害黨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抗戰以來，我黨有廣大的發展，大批新幹部也產生了，這是很好的現象。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間說：「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少於需要之數，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而開始局部的衰老死亡故。」他在這裏講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

們黨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誠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都是有缺點的，他們還參加革命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鍛鍊中逐漸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斯大林說過的，是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是缺乏的。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必須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局部與全體的關係，個人與黨的關係，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軍隊與軍隊、地方與地方，這一工作部門與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都是黨內的相互關係，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以利戰鬥之目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黨風，必須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如采不要主觀主義，實行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黨的利益高於個人與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

地步。

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黨內關係上是應該消滅的，在黨外關係上也是應該消滅的，這也是必須整頓的黨風。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方能戰勝敵人。我們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上，二十年來做了艱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戰以來，這個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有了正確的作風，都沒有了宗派主義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是確實存在着這種傾向的，有些人並且很嚴重。許多我們的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渺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傾向。這些同志，學了幾句馬列主義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的比例，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與非黨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與我們合作及可能與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却不懂得這個道理。對於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人，看不起他，甚至排斥他，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恩列斯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

的，相反，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繫羣衆，而不是脫離羣衆。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的，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羣衆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所以一切脫離羣衆的行爲，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裏作怪。因爲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綫的實行，所以我們要在黨內進行很大的教育，首先要從我們的幹部開始，使他們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與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與實際革命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在反對宗派主義時，也要反對主觀主義。

關於黨八股的問題，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它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今天不能一下講完，待下次再講。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他們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爲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却不

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由於這個原故，使得我們許多同志蒙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啓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為只有我們的敵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壞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蒙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貨一樣。一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東西，我們都要抵制它，不要使它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出賣它的那一套。任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應該使它在市場上銷售困難。爲此目的，就要提高同志們的嗅覺：對於任何東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鑑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於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實際，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最後 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的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顯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

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發了盲腸炎，醫生兜兜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把他變爲一個好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講了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熱烈的鼓掌）。

反對黨八股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的演說)

毛澤東

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反掉，那它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勢必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那已經較之自己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的樣子，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給大家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的。

黨八股也就是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是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爲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爲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士氣。也算一個創作罷！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內戰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

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這話怎麼講？

「五四」運動時期，一般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有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與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楊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不止這一個功績，它還有與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

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教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或新八股、新教條，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很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

是形式主義向「左」翼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來批判新八股，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極端主義的束縛。洋八股、洋教條的爲害之大，不是大家看見了的嗎？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啓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展；而對於老八股、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對於這些東西的摧毀廓清，也就達不到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

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層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與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表現的一種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的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的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做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罷。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羣衆看。因為長而且空，羣衆見了就搖頭，那裏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

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十萬字。現在是全世界大戰爭時代，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麼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嘆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麼？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些空話。但是主要的與首先的對象，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茅廁裏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仔細讀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爲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也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成一個樣子，故意嚇人，這裏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

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却深怕人家駁，非常胆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我們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應該採用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毒計。但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手段，這就是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但是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則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乃至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

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地位和「威達敏」的目的，那更是卑劣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頭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了個互字。人字呢？在右邊腳上加了三撇，寫成了彡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戰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明其妙了。大概他的目的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那裏都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爲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却要偏向人民羣衆

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羣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是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而想些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就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癩三。上海人叫小癩三的那批脚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還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癩三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大學畢業。沒有同人民羣衆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替羣衆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衆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爲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爲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第一，要學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這種語言，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到，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凍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學外國

語言，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就變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們不是硬搬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的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語言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國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語言**。比如『黨與非黨的聯盟』，這是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新憲法的演說中講到的。我們就吸收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裡面，講成『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如此等類，總之，我們非多多吸收外國的好東西不可。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現在民間的語言，大批地是由古人傳下來的。古人的語言寶庫還可以掘發，只要是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豐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古典，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合理的東西還應該吸收。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則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有用語言，一概不接受，不肯下苦工去學。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大會上說：『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新鮮事物失去了感覺』。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很多的新鮮事物都看不見，這個毛病必須醫治。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

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學習各種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用功學習。如果我們不學習羣衆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羣衆。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你們去看一看中藥舖，那裏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 D，小abcd，還有阿刺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舖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舖，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看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的使用這個開中藥舖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的最幼稚的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

相沒有內部聯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裏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裏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側面加以大略的調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還不能解決問題。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裏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不能發現基於基本的兩個矛盾側面所發生與發展着的許多次要的矛盾側面，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方

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給它指破，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的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呵！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後臉上還留一個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鏡子一樣，就媽媽糊糊的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彷彿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裏面藏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黨病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申討黨八股的檄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語言文字的形式。這種形式，早已產生，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黨八股之後，新的語言文字的形式就可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地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麼？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着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造麼？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衆化了，這是很好的。但是「化」者，

徹頭徹尾澈裏澈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却在那裏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脫離不了教條主義與黨八股，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衆化而實是小衆化的人，就更要當心，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什麼大衆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衆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喚大衆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衆化。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裏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

第一篇是從聯共黨史上摘下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做宣傳。其中講到列寧寫傳單的情形：「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當在某一個工廠裏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裏的情形的，——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曾揭露廠主盤剝虐待工人的事實，曾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曾寫着工人們底要求。」

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機體上的腐爛癥結，關於工人們底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底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實情況，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曾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不然，就是列寧也寫不出的，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麼？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着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的。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與羣衆說話，說話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羣衆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思想，

都要反映出成千百萬羣衆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絕對不是時常都會用簡單的語氣，具體的口吻，用羣衆懂得的譬喻，來和羣衆們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够拋棄那些背得爛熟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

『實在的，你們只要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刊物和文件，是寫得如何深奧啊！甚至於連我們黨的負責人員都難懂，更用不着說普通工人了。』

怎麼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麼？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作法律，當作布爾塞維克的法律：當你寫東西做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注意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着你走！應當時刻注意：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法律』啊！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裏選出的，是魯迅覆北斗雜誌社討論怎樣寫文章

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肚子裏沒有什麼東西硬要拉屎麼？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封建社會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的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裏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ABC。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却正是違背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的實際需要來談馬克思主義，縱令你把馬克思主義讀一萬本一千遍，也還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還是一個『老鼠上稱鈞，自己稱自己』的假理論家。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這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這裏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却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裏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這裏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總之有許多，把六中全會的決定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同它作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洋八股、黨八股、教條主義等類，實行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加以分析，並要分析各人自己，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你的愛人商量一下，跟你的知心朋友商量一下，跟你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這就是我們的希望。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卽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卽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一爲保存歷史陳跡，一爲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49.

一、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遍

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鄒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裏印的，主要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鄒調查找的是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興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

更、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爲『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言權的。存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

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聯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

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一一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

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会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習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兩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有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關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則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

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的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縣就無法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端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總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明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

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演講，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講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入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宅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实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是不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

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

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懂得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對於在戰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爲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爲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也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

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來，我黨對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的存在着。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一些。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並未澈底消滅。對於二十年來由於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於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尙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澈底認識。到延安來報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數，對於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係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友黨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

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於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了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着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的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 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關於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採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二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着重對於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僱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着重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羣衆、游民羣衆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僞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僞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一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幹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

集縣誌、府誌、省誌、家譜，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着重對於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並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系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幹部與學生關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並實行考績。

(六)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幹部會議作報告，並討論實施辦法。

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

本決定同時亦適用於各抗日根據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目前延安幹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在於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着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這種毛病，主要表現在使學生學習一大堆馬列主義的抽象原則，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領會其實質及如何應用於具體的中國環境。爲了糾正這種毛病，必須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的目的是爲了使學生能够正確的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爲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與背誦。第一，必須使學生學會區別馬列主義的字句與馬列主義的實質；第二，必須使學生領會這種實質（不是望文生義，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須使學

生學會善於應用這種實質於中國的具體環境；而拋開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學習。爲了這個目的，除正確地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之外，同時必須增加中國歷史與中國情況及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使學生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並把二者生動地聯系起來。黨地委以上，軍隊團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在解決了文化問題之後），應以聯共黨史爲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材，特別應注意具體應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觀點（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則）的學習，藉以克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這種極端惡劣的毛病。

（二）各學校沒有明確規定自己的具體目的，亦是缺點之一。爲此特規定：

（甲）中央研究院爲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

（乙）中央黨校爲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幹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幹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

（丙）軍事學院爲培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軍事工作幹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

（丁）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爲培養黨與非黨各種高級與中級的專門的政治、文化、科學及技術人才的學校。

上述各校的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必須與各校具體目的相適合。

(三) 爲加強各校的具體領導及使各校教育與中央各實際工作部門聯系起來，決定中央研究院直屬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軍事學院直屬軍委參謀部，延安、魯藝、自然科學院直屬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機關，應把自己直屬學校的工作，當作該機關業務的重要部分。中央宣傳部對各校課程、教員、教材及經費，應協同各主管機關進行統一的計劃、檢查與督促。

(四) 爲實現各校具體目的，使黨的有限精力財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對招收學生應採取少而精的原則。各校及其主管機關應重新審查學生成分，凡不合各校具體目的的學生，以分配工作或轉學他處爲原則。

(五) 改善教員質量是學校辦好的一個決定條件。凡地委及團級以上幹部的教育，應由中央委員及中央各機關負責同志親身担任指導。對現有各校教員，應根據新的標準分別審查處理之。中宣部應給各校專任教員以實際幫助，提高他們的質量。對教員的政治的與物質的待遇，應改善之。

(六) 沒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與可能學習的縣級營級以上工農出身的老幹部，應先補習文化。這種補習，不應只限於識字之多少，而應包含閱讀寫作能力，歷史、地理常識，社會政治常識與自然科學常識的獲得。文化班編制的標準，應依照學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

照其工作職位。

(七) 凡帶專門性質的學校(例如軍事的、政治法律的、財政經濟的、自然科學的、文藝的、師範教育的、醫學的等等)應以學習有關該項專門工作的理論與實際的課程為主。文化課、政治課與專門課的比例應依各校情況決定之。一般說來，專門課應佔百分之五十(不需補習文化之學校，則專門課應佔百分之八十)，文化課程應佔百分之三十，政治課應佔百分之二十。堅決糾正過去以政治課壓倒其他一切課目的不正常現象。

(八) 凡担任學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應認真的研究教課內容與教學方法，使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原則，在教課內容教學方法中貫徹起來。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採取啓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與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學中，陝甘寧邊區及其鄰近地區的實際材料，應經過各種調查研究的方式充分地利用之。

(九) 關於馬列主義的教授與學習，應堅決糾正過去不注重領會其實質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應用而注重死讀的錯誤方向。學校當局及教員必須全注意使學生由領會馬列主義實質到把這種實質具體地應用於中國環境的學習。學生的是否真正領會(理解、認識、懂得)，以學生的是否善於應用為標準。這裏所說的應

用，是指用馬列主義精神與方法分析中國歷史與當前的具體問題，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使學生養成這種應用的習慣，以便在他們出校之後善於應用馬列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去分析问题與指導實踐。

(十) 在學校政治教材方面，應該充分利用『解放日報』、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書。各種必要的課本及輔助讀物，應該有計劃地編印或翻印。中央宣傳部應協同出版機關及財政機關製定一九四二年有關教育的出版計劃及經費預算，交中央批准實行。

(十一) 各校學生生活及教育設備，應按現有條件作必要的改善。

(十二) 學校行政組織以短小精幹為原則。學校內黨支部的任務，是在保證學校教育計劃的完成，糾正支部與行政並立的不正確現象。支部對學校行政的建議，可經黨的路綫提出，但不能出於干涉。在統一戰綫性質的學校內，應糾正黨員包辦一切的黨化作風。

(十三) 應在學校內養成學生自由思想、實事求是、埋頭苦幹、遵守紀律、自勵自治、團結互助的學風，而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好高騖遠、武斷盲從、誇誇其談、自以為是及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惡習。關於這種學風的養成，教職員應該以身作則。

(十四) 本決定適用於延安。但本決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則，同時亦適用於各抗日根據地。

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在目前條件下，幹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幹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幹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這是因為一切工作，包括國民教育工作在內，都須經過幹部去做，「在政治方針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幹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別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錯誤了。同時，着重的認真的辦理幹部學校，抽調許多幹部，進入各種幹部學校，施以系統的教育，當然是很重要的任務，對此決不應該稍有忽視，但最廣大數量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還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財力與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辦理很多的幹部學校；因此，對在職幹部，就其工作崗位上，施以必需的與可能的教育，實是全部幹

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應該引起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及其宣傳教育部門的充分注意。游擊戰爭的特點，不但允許我們這樣做，而且必須這樣做的。

(二) 在職幹部教育，自六中全會以來，已經引起黨內相當的注意，在許多地方與許多部門的在職幹部中引起了學習的熱潮，這是極好的現象。但忽視的現象還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與有些部門中，甚至還沒有開始。沒有強調業務教育，而大多數在職幹部要求學習業務與精通業務的熱情則是很高的。政治教育雖一般的注意了，但或則不得其法，或則輕重不分，或則沒有經常性。文化教育，是我黨多數工農出身的幹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沒有引起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充分注意。高級幹部的理論教育，或則至今沒有引起注意，或則脫離實用，成了教條主義的東西；而理論教育的成敗則是革命成敗的第一個關鍵。所有這些，都是必須改革，或必須加強的。

(三) 在職幹部教育，應以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四種為範圍。

(甲) 對一切在職幹部，都須給以業務教育，實行「做什麼，學什麼」的口號。不論從事軍事、政治、黨務、文化、教育、宣傳、組織、民運、勤奸、財政、經濟、金融、醫藥、衛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門的工作幹部，必須學會與精通自己的

業務，這是第一個教育任務與學習任務。每一部門的領導機關及其負責人，必須指導所屬幹部有秩序的進行學習；而各級黨委、各級政治部及其宣傳教育部門則負總領導的責任。其學習範圍，包括如下五項：第一是關於與各部門業務密切關聯的周圍情況的調查研究。例如軍事部門精密調查敵友我三方情況，加以分析研究，擇其要點，編成教習，用以教育軍事幹部。其餘類推。第二是關於與各部門業務密切關聯的政策、法令、指示、決定的研究，例如財政工作人員應熟習財政政策與財政法令，鋤奸工作人員應熟習鋤奸政策與鋤奸法令。其餘類推。第三是關於各部門業務具體經驗的研究。例如黨的組織部門研究黨的組織工作與幹部工作的經驗，加以分析與綜合，指出要點，寫成文件，教育所屬幹部。其餘類推。第四是關於各部門業務的歷史知識。例如黨的宣傳部門將我黨二十年宣傳鼓動工作及其政策的變化發展，加以敘述與總結，編成教材，教育宣傳工作幹部。其餘類推。第五是關於各部門業務的科學知識。例如軍事幹部研究軍事學，醫務幹部研究醫學等，每一部門均須研究自己的理論。對於上列各項業務學習，各部門領導機關負有供給教材，指導學習及考查成績的責任，務使所屬幹部從理論與實際兩方面，逐漸達到學會與精通自己職業之目的。輕視學習業務與精通業務的觀點是錯誤的。

(乙)對一切在職幹部，都須給以政治教育。其範圍包括時事教育及一般政

策教育二項。關於進行時事教育的辦法，包括督促所屬幹部看報，對所屬幹部講解時事問題及以地區或部門為單位召集幹部作時事報告等項。關於進行一般政策教育的辦法，或為一切幹部所應普遍學習的，例如將中央對時局宣言，中央關於增強黨性決定，關於調查研究決定及邊區施政綱領等，督促幹部閱讀，加以解釋及討論等；或為雖與本部門業務無直接關係，但有間接關係，有使所屬幹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軍事指揮員解釋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決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於使幹部除精通其專門業務、局部情況與局部政策之外，還能通曉一般情況與一般政策，擴大幹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狹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須指出，好談一般政治而忽視專門業務的傾向，是不對的，但局限於專門業務而忽視一般政治的傾向，也是不對的。又須指出，一般情況與一般政策雖為一切幹部所必習，但其分量應重，應依各部門工作性質而有所不同。例如對於醫生、技術專家、文學家、藝術家等，其分量應該減輕，而對於黨務工作人員，宣傳工作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及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等，則其分量應該加重。關於政治教育缺乏經常性的毛病，黨政軍宣傳教育部門應有計劃地克服之。

(丙)對於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幹部，除業務教育與政治教育外，必須強調文化教育，反對輕視文化教育的錯誤觀點。對於他們，學習文化，提高文化水

平，是他們全部學習的中心一環。其教育與學習範圍，暫定爲國文、歷史、地理、算術、自然、社會、政治等課，宣傳教育部門應負責解決課本問題。其教育學習辦法，在環境許可的地方，必須一律開辦文化補習班或文化補習學校，或一機關獨辦，或數機關合辦；或採取輪訓制，輪流抽調幹部集中一地學習，都是好的。在這些補習班或補習學校中應有專任教職員，輔之以兼任的教職員；在環境不許可的地方，則用小組學習制，以該機關某一文化程度較高的幹部減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員，亦可專用教員。文化班或文化學校，可分爲初級的及中級的兩種。初級班爲不識字及粗識文字的人而設，以學至大體相當於高小程度爲合格。中級班爲已有相當於高小程度的人而設，以學至大體相當於中學程度爲合格。幹部分班應以文化程度爲標準，不以職位爲標準。此外，某些從事宣傳教育工作的幹部，雖屬知識分子，但尙有補習國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則用小組學習制或其他辦法補習之。爲着提高廣大幹部的文化水平，應在黨政軍機關內提高文化教員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員應受到極大的歡迎與優待。對辦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員應受到獎勵。

77

(丁)高級及中級幹部之具有學習理論資格(文化程度、理解力與學習興趣等)者，於業務學習與政治學習之外均須學習理論。其學習範圍分爲政治科學、思想科學、經濟科學、歷史科學等項，依次逐步學習之。其學習方法，以理論與實際

聯系爲原則。例如政治科學以馬列主義論戰略策略等著述爲理論材料，以我黨二十年奮鬥史爲實際材料；思想科學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爲理論材料，以近百年中國的思想發展史爲實際材料；經濟科學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爲理論材料，以近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史爲實際材料；歷史科學則研究外國革命史與中國革命史。其具體進行，應採取高級學習組與中級學習組的辦法，以自學爲主，加以集體的討論與指導。

(四) 四種教育的時間分配及課程分配，使之互相聯系而不互相衝突與脫節，由黨政軍宣傳教育部門負責調理之。

(五) 不論任何工作部門，也不論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須貫徹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須由領導機關加以審查，任何包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毒素的東西，均須嚴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

(六) 在職幹部教育是長期的，以發展其業務而不妨礙其業務並不妨礙幹部健康爲原則，在前方，尤其不應妨礙戰爭。在情況許可的地方或部門，一律堅持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在情況不許可的地方或部門，學習時間可以伸縮。一切爲着在職幹部教育而耗費的時間，均算入正規的工作時間之內，把教育與學習看做工作的一部分。

分。在鑑定幹部的時候，學習情況如何應作爲鑑定標準之一。

(七) 實行對於在職幹部教育的考核、測驗與賞罰制度，其辦法由中央宣傳部訂定之。

(八) 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應以極大的注意力放在幹部教育（在職幹部教育與幹部學校教育）上面。爲着幹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員（教員與職員）應加以嚴格的審查，並應首先調給之。各級領導人員有參加教課的責任。爲着幹部教育而需用經費，應最大量地供給之。

(九) 對於從事幹部教育的人員，尤其是教員，應加以教育。其辦法由中央宣傳部訂定之。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陳雲

一 入黨資格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要成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要保持黨的成分的純潔。所以什麼人有資格可以加入黨的問題，是我黨經常留心的問題。徵收黨員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義務和經常工作之一。所以什麼人有資格加入黨的問題，是我黨每個同志應當通曉的。

第一 什麼人可以加入共產黨？

依照中共黨章第二條對於什麼人有資格可以加入黨的規定是：

『凡承認共產國際及本黨黨綱和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爲本黨黨員。』

員。」

黨的性質與黨員的成分和入黨的條件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在黨的建設中黨員的意義和作用這一問題，是佔有頭等重要的位置。所以毫不希奇的，這個問題遠在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是第一次引起熱烈爭論和嚴重的意見分歧的問題，這就是成爲列寧與孟塞維克基本分歧之點。

列寧的主張是：

『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及親身參加黨的組織之一者，均可成爲黨員。』
而孟塞維克馬爾託夫的條文是：

『只承認黨綱，交納黨費，並在黨的組織領導下經常贊助黨的人，均得成爲黨員。』

根據列寧的主張，則只有真正加入組織，一切服從組織和願意將自己全部貢獻給黨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的人，才能成爲共產黨員。爲了建立黨的組織上的基本原則，列寧曾與馬爾託夫進行了鬥爭，堅決反對馬爾託夫所提出的：以爲一個人不一定甚至不願加入到黨的任何組織，只要能組織外同情和贊助黨，都可算作共產黨員的主張。這種十足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不僅根本抹煞了黨和階級的界限，而且混淆了黨的本質，使黨降爲職工會或學生會，使黨「沉沒在同情者的大海中，而爲

一切游蕩的、動搖的和機會主義的分子開門』（列寧）。所以參加黨的一定組織，為黨積極工作，是每個黨員最低限度的任務。

堅持列寧的原則，布爾塞維克建立了自己的徹底馬克思主義的、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一致的戰鬥的黨。這一事實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給了全世界共產黨一個建設黨的根本原則。而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年來鬥爭中之所以能成為英勇奮鬥的強大的黨，也正因為我黨在開始成立時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便對李漢俊的合法主義的孟塞維克的觀點作了鬥爭，根據列寧的原則，奠定了黨的建設之基礎。

在現在我黨大量發展黨員時，列寧的關於黨員的這個原則，更有着重要的意義。要克服我們黨內還存在着個別黨員不經黨的允許任意離開原來所屬的組織，任意離開工作的傾向。

第二 每個入黨者必須承認黨綱，但這不等於要求精通黨綱

中共現在雖還沒有成文地規定自己的整個黨綱，但是它却有世界共產黨總的綱領（共產國際綱領）和它自己的最低綱領（如歷次大會的政綱和一九三七年之抗戰十大綱領）。承認黨綱是每個入黨者的先決條件，但這並不是說要把精通黨綱作為入黨的條件。因為精通黨綱，是要有理論修養的人才行的。如果要求加入黨的人特

別是工人、農民，必須精通黨章黨綱之後才能入黨，這樣不僅把許多要求入黨的革命的優秀分子，拒之門外，而且也是否認了黨對於黨員的教育責任。

第三 共產黨員不僅積極參加抗日，而且要為共產主義奮鬥

不是每個積極參加抗日戰爭的人都可以成為黨員的。要求加入共產黨為黨員，必須是承認黨綱，並且願意獻身於解放無產階級與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分子。所以，我黨吸收黨員只有依靠經常有系統的在羣衆中宣傳共產主義及黨的綱領，並從民族的、階級的鬥爭中來細心的考察和選擇他們之中的先進分子。

二 黨員的成分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由無產階級中覺悟先進分子所組成的。但是，黨要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必須經常有系統的注意調劑自己黨員的成分。

第一 首先是加強優秀的工人成分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此，首先『它應當吸收工人階級的一切優秀分子』（斯大林），有計劃的加強黨內無產階級的骨幹。這是我黨組織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特別是現階段的我黨，加強與擴大工人成分是有着重大意義的。我黨過去在城市職工運動中工作的比較薄弱和工人階級曾經遭遇到的空前的摧殘，以及抗戰以來我各大工業中心城市的淪陷，更加使中國工人階級受着非常的災難與損害；廣大的工人由在業到失業，由集中到分散，這就使黨更加重了吸收工人入黨的任務。城市中的黨必須首先集中注意力在吸收工人黨員，鄉村中的黨應該特別注意吸收由城市轉入鄉村的工人，吸收農村的僱農和手藝人入黨，以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發揮工人在抗戰中的中堅作用，加強工人對廣大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的領導。

但是，也必須指出共產黨並不是「工黨」，而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先鋒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體工人都可加入黨的，而只是工人階級中最覺悟、積極和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優秀分子。

第二 黨應當注意到貧苦的農民和知識分子成分

中國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存在着廣大的、貧苦的、革命的農民羣衆。他們生活在多重痛苦與壓抑下，因而決定他們願意擁護共產黨，能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爲反帝反封建

作堅決的鬥爭。歷史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農民在革命中的偉大作用；而在今後革命的進程中，貧苦的農民仍然和必然成爲無產階級最有力的聯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們之中的積極分子到黨中來，使自己在農村中的社會基礎放在農村無產者與貧苦農民分子的上面，是完全必需的。

同樣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過去的革命運動中，特別在今日抗日戰爭中，都證明他們之中有許多是能夠爲正確的政治方向而英勇奮鬥的。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與政治覺悟，使他們成爲黨與羣衆之間的必要的橋樑。我們黨應該吸收許多能夠獻身於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的革命知識分子入黨，同時也是經驗告訴我們，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吸收知識分子中間的革命的貧苦的成分入黨。這些革命貧苦的知識分子，是不同於一般的知識分子的。由於他們貧苦的生活決定他們最易接近黨；並且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的下層，思想與生活習慣都和勞苦羣衆有密切的聯系。因此，他們是黨在知識分子中發展組織的最好的對象。

第三 黨應當特別注意到女工與貧苦的革命的

小資產階級婦女——農婦與知識分子的成分

婦女佔人口的一半，沒有婦女參加革命，革命就不能勝利。現在黨內女黨員的數量太少，這首先由於黨內對吸收女黨員的注意不夠。要反對藉口於中國社會男女不能接近而放棄共產黨員介紹女黨員的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首先是女共產黨員應該把發展女黨員當作重要工作之一。黨今日應該強調提出吸收大批革命的婦女——女工與貧苦革命的農婦和知識分子到黨內來。黨應該以此作為有計劃的經常工作之一，並且注意在學習工作中提高她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水平。

第四 一切黨員必須為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

工人成分是黨的基礎，黨特別要注意在自己的組織內加強工人的成分。對於在日當鬥爭中與革命運動中訓練出來的其他階級出身的分子，黨並不拒絕將他們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但是他們必須放棄自己原有的非無產階級的、反共產主義的立場，承認黨綱黨章，才能允許加入黨的組織。因此，黨堅決反對不願保持黨的成分的純潔，不加強無產階級的骨幹，使黨降為各階級的『民族革命聯盟』的任何觀點。

三 入黨手續，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

第一 一定的手續

新黨員入黨時必須經過一定的介紹人（依黨章及目前規定是：工人、僱農一人介紹；小資產階級出身者二人介紹；脫離其他政黨而加入本黨者三人介紹），由黨的小組和支部通過，經上級黨委的批准。參加過其他政治派別分子入黨，必須經過區黨委、中央分局或中央的批准。

第二 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的規定

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的問題，應遵照中央的決定，並按其體情況決定之。其原則有四：

（一）長期脫離黨，但仍在繼續為黨工作，黨內有人證明者，恢復黨籍。

（二）長期脫離黨，自稱仍在繼續為黨工作，但黨內無人證明，而今日已具備入黨條件者，重新入黨，候有證明時，恢復黨籍。

（三）曾經長期參加黨的工作，中有相當時間（一二年）脫離黨的工作，未做違反革命利益的事，而現在已經恢復黨籍者，則脫離黨的工作的這一時期，不算在黨齡之內。

（四）長期脫離黨，未做違反革命利益的事，經過相當長期的考察而今日已具備入黨條件者，重新入黨。

至於政治上變節的分子，則不得重新入黨。

四 候補黨員

第一 候補期的規定

候補期的長短是根據新黨員的階級成分而定。目前黨中央暫定候補期間如下：工人、僱農不要候補期；貧農、手工業工人一個月；革命學生、知識分子、小職員、中農、革命軍人三個月；其他成分六個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長之（見『中央關於發展黨員的決議』，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第二 候補期的作用，介紹人的責任，以及轉黨的手續與標準

凡非工人成分入黨者，必須經過一定的候補期限。候補期的作用是教育與考察。黨應按照各地具體情況給候補黨員以黨的教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到黨員的水平，分配他們一定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他們。同時，在候補期中，黨更應該審查他的個人品質以及歷史的多方面的去考察候補人在政治上、在黨的工作上和對黨忠誠的程度上，是否具備了入黨條件，以作為轉黨的準備工作。

凡新黨員入黨都各有其一定的在政治上負責的介紹人。介紹人對其所介紹的新黨員應當對黨鄭重負責，決不可苟且了事。他不僅需要精細的留意被介紹者的行動與言論的表現，而且特別應該經常在政治上、工作上，積極的、耐心的幫助他，教育他；而黨也可以以此作為測驗該黨員對黨負責、忠實於黨的標準之一。

轉黨標準：黨應當根據在候補期內對於候補人教育工作和考察的結果，來判斷他在思想上對黨的了解程度和對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事業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經常積極，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論行動中觀察其是否忠誠於黨，這樣耐心的去判斷他是否具備為正式黨員的標準。倘認為可以時，則經過轉黨的手續，由小組、支部通過，上級黨委批准。環境允許時各地黨委並得按該地具體情況舉行入黨儀式。

所以，轉黨條件不在於候補期限已滿與否，而決定於他對黨的認識程度如何。如候補期已滿仍不敷轉黨標準，必得延長之，延長期限應等於其原有候補期的期限，必要時可停止其黨籍。但是，延長亦不能視同兒戲，例如延長候補期一二十天用以作為黨內的處罰的方法等。

至於青年黨員，一般的不徵收十六歲以下者入黨，十六歲以上者可以開始被介紹為候補黨員，至十八歲才能成為正式黨員。但已加入黨的十八歲以下的青年黨員應保持原狀，不能因此開除或停止黨籍。

第三 候補黨員的權利義務

候補黨員應執行黨所分配的一定的工作，交納黨費，並得受適當的黨的教育——閱讀一定的黨的文件和受政治的或軍事的訓練。一般的候補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沒有表決權。在介紹黨員時，可以提出其所介紹的對象，再由支部派人談話與考察，作正式介紹。在黨內工作上，候補黨員不得為支部幹事或黨的小組長。但以上規定，在特殊情形下，在新建立的支部或全支部絕對大多數都是候補黨員時，可以有例外。

在黨的某些會議上，候補黨員不能參加，並不給予閱讀黨內秘密文件。

五 共產黨員的標準

第一 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

共產黨是為人類的徹底解放，為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而奮鬥的政黨。因此，一個願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當為共產主義奮鬥，而且應當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但是怎樣才能建立和堅定自己的人生觀呢？首先必須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堅信共產主義社會必

然實現的前途。這就是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從他的階級覺悟，從他的實際革命鍛鍊中，從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素養中，深切了解到無產階級在社會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懂得無產階級利益及其解放事業，洞悉共產黨及其黨員在最近將來的政策和目的。只有這樣，他才能確定自己的人生觀，終其一生，為他的信仰的實現而奮鬥到底。同時，中共每一個黨員應當深刻知道，中國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在彎曲險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須經歷長期的艱苦與波折；並且在每一事變的緊急關頭，還有被犧牲的可能。因此，每個共產黨員不僅要堅信共產主義的必然實現，而且必須對於工人階級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與奮鬥到底的決心。

第二 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

我黨是以徹底解放中國無產階級和全中華民族與全國人民、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職志的政黨，因此，民族的與人民的利益和黨的利益是一致的。共產黨員是在黨的領導下為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奮鬥的戰士，所以黨員的利益同民族的與人民的與黨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個黨員必須對於民族、對於革命、對於本階級、對於黨，表示無限的忠誠，把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革命的、本階級的與黨的利益。

但是在革命工作上，在黨的工作上，可能發生黨員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不一致。在這樣的時候，每個黨員必須依靠他對革命對黨的無限忠誠，堅決的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革命的與黨的整個利益；把革命與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而不能把個人利益超過革命的與黨的利益。

革命的與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不是一句空話。黨不僅要求黨員懂得這一條，特別是要要求每個黨員能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來堅決的毫不疑撼動搖的執行這一條。只有黨內有了這樣為革命為黨的利益而犧牲一切的黨員，才能保證黨勝利的完成革命。

第三 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

十八年來黨的鬥爭經驗，證明了紀律是執行黨的路綫的保證。在過去，由於克服了陳獨秀、李立三路綫、張國燾等反革命的政治路綫和破壞行為，保證了黨在各個時期的革命任務的實行以及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成立與抗日戰爭的進行。在今後，黨仍應堅持這種紀律，「才能團結全黨，克服新的困難，爭取新的勝利」（黨的六中全會決議）。因此，一個共產黨員堅決的自覺的遵守黨的紀律是他的義

務。他不僅應當與一切破壞黨紀的傾向作鬥爭，而且要着重與自己一切破壞紀律的言論行動作鬥爭，使自己成爲遵守黨紀的模範。不要以爲自己能够在會議上或稠人廣衆之前聲明擁護並舉手贊成了黨的路綫，就算遵守了黨的紀律，這是十分不夠的。一個真正能自覺遵守紀律的良好黨員，就在於他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表示出自己是堅決的遵守黨的鐵的紀律的模範。

革命力量的增長，共產黨威信的提高，使敵探、漢奸、反共分子更加倍的進行破壞共產黨的活動。因此，在黨的工作中，不但絲毫沒有減輕秘密工作的重要性，相反的，黨應該特別加緊自己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紀律，與破壞忽視秘密工作的現象作鬥爭。黨應該指出，在今日的某些地方黨部，還竟以爲在現在環境下可以忽視秘密工作，這是十分危險的。每個黨員應該不忘記許多年來由於疏忽秘密工作而受到犧牲的血的經驗教訓。爲了保持抗戰的力量，爲了保證革命和黨的事業的勝利完成，每個黨員必須高度的提高政治警惕性，每個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秘密工作的紀律並且和一切忽視破壞黨的秘密工作的危險傾向作鬥爭。任何黨內的不准對外公開的事件，不准任意向黨外宣佈；任何對其他黨員沒有必要說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黨員中亂說。一切破壞秘密工作的行動，必須受到黨的紀律的制裁，直到開除黨籍。

第四 百折不撓執行決議

一個共產黨員不僅只是口頭上擁護了黨的決議就算完事，他的責任是在於堅決的執行決議，在實際工作中實現這些決議。實現黨的決議時，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會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難，共產黨員必須有大無畏的精神，百折不撓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僱傭勞動的態度來對付黨的工作，是絕對不允許的。中國革命是艱苦的長期奮鬥的事業。中國共產黨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具有不怕困難，犧牲奮鬥的作風。每個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必須具有艱苦奮鬥的精神，承繼與發揚黨的優良傳統。

共產黨員不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實於黨的決議，而且要在困難中，在生死關頭時，忠實於革命，忠實於黨的決議；不僅在有黨監督時，而且要在沒有黨監督時忠實於革命與黨的決議；不僅在勝利時，而且要在失敗時堅持執行黨的決議；只有這樣堅定與頑強的英雄氣概，才配稱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第五 羣衆模範

黨的政治影響越是擴大，黨的威信越是提高，則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對於我們黨員的要求越多越大。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是羣衆所信仰的先進隊伍中的一分子，

所以羣衆對於他就有特別的要求。羣衆常常根據我們黨員的行動來測量我們的黨，所以黨員無論在何時何地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給非黨羣衆一種好的影響，使他們更加信仰我黨，更加敬重我黨。

黨的六中全會號召全黨黨員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應該起先鋒的模範的作用：

『在八路軍與新四軍，應該成爲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與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共產黨員在與友黨友軍發生關係中，應堅持統一團結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綫的綱領，成爲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應該言必行，行必果，不要傲慢態度，誠心誠意的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爲統一戰綫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是民衆的朋友，而不是民衆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的利益應服從於民族的與羣衆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範。』

每個共產黨員應該積極的在實際行動與日常生活中，真正以模範黨員的姿態，

響應這一號召。

共產黨員的模範，還表現在對於革命利益嚴肅的立場上面，對於一切爲國爲民的事業，應該始終不變的堅持自己的立場。任何威脅，任何利誘，都不能動搖自己的立場。誰要是放棄了革命的與黨的立場，誰就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資格。

在中共的歷史上有過無數的模範黨員，他們爲了共產主義的事業鬥爭，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下，百折不撓，在種種威脅利誘下，表示對於黨與革命無比忠誠。成千成萬的優秀黨員及黨的領袖，在火綫上、刑場上和監獄中，英勇犧牲。他們在全世界和全中國勞苦大眾的面前，顯示了中華民族優秀子孫的至高無上的氣節，而他們一生的豐功偉業，更是光輝千古。他們是一切革命者的模範。我們黨的黨員不但要敬仰他們，而且應該學習他們。

第六 學 習

革命事業是一種偉大的艱巨的工作，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環境和革命運動更是萬分複雜，變化多端，而領導革命的共產黨，宅之所以能在變化的、複雜的環境中把握一切偉大的革命運動，並且指導這個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是因爲他有着革命的理論。所以共產黨員要有革命的理論，才能從複雜萬分的事情中弄出一個頭緒，從不

絕變化的運動中，找出一個方向來，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得好。不然，就會在複雜的、不絕變化的革命環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出方向，不能獨立工作，也不能正確的實現黨的任務和決定。所以每個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在工作中心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增進革命的知識，培養政治的遠見。

根據目前的環境，我們應當學習什麼呢？

(一) 我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的黨，首先，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才能培養自己成爲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我們的學習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學習他們觀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而不是教條主義者。

(二) 要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時事政治的情況，不然也就不能規定當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務和方法。

(三) 要學習軍事知識與軍事技術，特別是游擊戰爭。在今日，「黨員軍事化」已成爲全黨的戰鬥口號。

(四) 文化程度低的黨員，首先要長期的進行識字與讀書讀報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進步。

(五) 尤其重要的是，每個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在實際工作中學習，向羣衆學

習。一切實際工作中的羣衆鬥爭中的經驗教訓，是我們最好的學習的課本。

自我批評是共產黨員學習的寶貴的武器，虛心的接受黨的批評是一個黨員進步的必要條件。好的共產黨員，對黨的每個批評都必須以誠懇的態度、愉快的態度去接受與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錯誤。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或者不願學習。我們反對那種『自高自大』『自稱高明』的傾向，反對那種不願學習或者對學習沒有信心的黨員。一個共產黨員是難得機會長時期在課堂上學習的，因此，必須善於在繁忙的實際工作中爭取時間去自己學習，這一點必須有堅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共產黨員的口號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全黨應該熱烈的響應黨六中全會『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的口號！

只有具備以上的六個條件，才不愧稱爲一個良好的共產黨員，才不致沾污了這偉大而光榮的黨員的稱號。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劉少奇

這是劉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在延安馬列學院的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關於『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一章中的四節。全文曾發表於『解放』第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期。

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

共產黨員除開清楚的確定他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之外，還必須清楚確定他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之正確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部分的利益服從整個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服從於世界的利益。

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除開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以外，共產黨沒有它

自己的利益與目的。然而，無產階級的最後解放，必然是全人類的最後解放。因為如果無產階級不能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即解放全人類，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忠誠的協助與指導一切勞動人民、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被壓迫者去爭取自己的解放，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與文化政治水平。因此，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與全人類解放的利益，與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開的。因此，共產黨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就是人類解放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利益，社會進化的利益。因此，黨員個人的利益服從黨的利益，也就是服從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進化的利益。

一個共產黨員，能够使他個人的利益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是考驗這個黨員是否忠於黨、忠於革命與共產主義事業的標誌。因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依靠無產階級與共產黨。損害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利益，就絕對不能實現共產主義。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應估計到黨的整個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的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最高原則。每個黨員在思想意識中應該堅強的建立這個觀念。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應該使自己的思想中，只有黨與黨的利益，而沒有個人的打算。要使自己個人的利益完全與黨的利益一致，以至溶化。而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可以毫不躊躇、毫不勉強的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爲了黨的、階級的、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犧牲個人，以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猶豫，以至感覺愉快，這就是最高的共產主義道德的表現，這就是黨員最高原則性的表現，這就是黨員無產階級意識的純潔與渾厚的表現。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黨員個人的目的，只能夠是黨的部分的目的。如我們的黨員要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要加強自己的能力，要去領導廣大羣衆的勝利的革命鬥爭，建立各種革命的組織等，這些如果是個人的目的，那末，這是爲了黨的利益，也是黨的部分目的，黨正需要這樣的黨員與幹部。但除此以外，黨員就不應該有個人地位、個人英雄、以及其他等等個人的獨立目的。因爲這樣，可以使他離開黨的利益，以至走到在黨內進行投機。

黨員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識中只有黨的共產主義利益和目的，沒有自己離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無私，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產主義道德。因爲他有嚴格的立場，『能愛人，能

『惡人』。他能對一切同志、革命者、勞動人民表示他的忠誠熱愛，無條件的幫助他們，平等的看待他們，不肯爲着自己的利益去危害他們中之任何人。他能待他們『忠恕』，『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爲人家着想；體貼人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能最堅決的對待人類蠱賊，爲保衛黨的、階級的、人類解放的利益而與敵人進行堅持的戰鬥。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在黨內吃苦在前，享福在後，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與別人計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鬥。他能在患難時挺身而出，在困難時表示自己最大的責任心。他能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大的堅定性和氣節。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因爲他沒有任何私心，他沒有作過『虧心事』，他的錯誤缺點能够自己公開，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蝕』。他『理直氣壯』，永遠不怕真理，勇敢的擁護真理，告訴別人以真理，爲真理而戰鬥。即使他這樣作暫時於他不利，爲了擁護真理而要受到各種打擊，甚至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與指責而使他暫時孤立（光榮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夠逆潮流而擁護真理，絕不隨波逐流。因爲對於他個人來說，他無所畏懼。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的學習到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和敏捷的觀察問題，認識現實。因爲他有清楚而堅定的階級立場，他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慾去蒙蔽與

歪曲他對事物的觀察和對於真理的理解。他實事求是，一切理論與是非，他拿在革命實踐中去考驗，而沒有偶像的崇拜。

第四，他也可能最誠懇、坦白與愉快。因為他無私心，在黨內無須隱藏之事，『無事不可對人言』，除開黨與革命的利益外，沒有個人的得失與憂愁之事。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時，他能『慎獨』，不作一切壞事。他的工作不論在多少年之後去檢查，都沒有不合於黨的利益之事，他不怕別人的批評，同時他也能勇敢的誠懇的批評別人，所以他誠懇、坦白與愉快。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愛心，而在爲了黨與革命利益的前提下，也最能寬大、容忍與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時忍受各種屈辱與虐待而無『怨恨之心』。因為他沒有私人的目的與企圖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問題上無求於人，無必要卑躬屈節的去要求人家幫助。他也能夠爲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鍾愛自己，保護自己的生命與健康，增進自己的理論與能力。但在爲了黨與革命的某種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負重作他心所不願的工作之時，他能毫不推辭的担負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一着。他不把困難推給人家。

同志們！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種美德，同時具有嚴格而清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與階級性）。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爲它

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築在退化的、保護個人及少數剝削者的利益之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無產階級與最後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出於水火、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利益之前進的基礎上。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爲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講犧牲，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但是爲黨、爲階級與民族解放，也是爲人類解放與社會進化，爲無數千百萬的最大多數的人類的利益而講犧牲，那就有無數的共產黨員簡直是視死如歸，毫無猶豫的能夠犧牲他的一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必要的時候，對於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爲當然的事情。而且這不是由於他們的空想或沽名釣譽，而是由於他們對於社會進化的科學的了解與自覺。這正是我們的道德之所以最偉大、最科學。除此以外，我們不承認在階級社會中有所謂更偉大、更科學的、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這只是騙人的鬼話，這在事實上只是建築在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之基礎上的所謂『道德』。從來的這種『道德』觀，都是唯心論的；把道德建立在歷史唯物論的科學的基礎之上，公開的建立於在無產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戰鬥的利益之物質的基礎之上，還只有我們共產黨人能夠作到。

共產黨不只是代表各個黨員的利益，而是代表全體工人們與人類解放的長遠利益。黨的利益不只是各個黨員利益的集中表現，而且是全體工人們與人類解放利

益的集中表現，除開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利益外，共產黨就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所以不要把共產黨看作只是圖謀黨員私利的、狹隘的行會主義的小團體。凡是這樣看的人，都不是共產黨員。

黨員是有他個人的利益，個人的發展，而且這種個人利益在某種時候可能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對立，這時候，要求黨員無條件的犧牲個人利益，而不能犧牲黨的利益（不論在任何形式的掩蓋與藉口之下）來服從個人。同時，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發展中包括着黨員個人的利益與發展。黨的階級的成功與勝利，也就是黨員的成功與勝利。黨員只能在爭取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中，來發展自己，不能夠離開黨的發展而去爭取個人的獨立發展。也只有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黨員才能發展自己，否則黨員就不能發展。因此，黨員個人的利益必須而且可能與黨的利益和發展完全取得一致。

我們的黨員，已經不是什麼普通的人，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完全不應該只是代表他個人的利益，他應該表現他為自覺的階級利益、階級意識的具體代表者，他已經是一般化了的階級代表者之一，因此他的個人利益完全不應該在黨與階級利益之外突現出來。黨的幹部與黨的領袖，更應該是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的具體代表者，他個人的利益與目的更應該完全溶化在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

中。在今天中國環境中，只有無產階級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們的黨員也表現他們爲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這是一方面，這是我們黨員個人所應該注意的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

雖然在黨的一般利益中包括着黨員個人利益，但總還不能完全包括，還不能也不應消滅黨員的個性。黨員總還有一部分私人的問題需要自己來處理，並且也還得要根據他的個性與特長來發展他自己。因此，黨是允許黨員在不違背黨的利益之範圍內去建立他個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發展他個人的個性與特長。黨而且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去幫助黨員個性與特長（於黨有利的）的發展，給他以適當的工作與條件，以至加以獎勵等。黨也在可能條件下顧全與保護黨員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給他以教育學習的機會，解決他的疾病與家庭問題，以至在必要時犧牲黨的一些工作保存同志等。然而，這也不是爲了別的，也是爲了黨的整個利益，因爲不保障同志最低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及教育條件，使黨員安心的熱情的的工作，黨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這是黨的負責人在處理黨員問題時所必須注意的。這又是一方面。

總而言之，在黨員個人，應該完全服從黨的利益，克己奉公，不應有個人目的，私人打算；不應什麼都只顧自己，到處向黨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責備黨沒有

抬舉與獎勵他。同時，應該在一切情況下，努力學習，努力前進，勇敢奮鬥，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性及對馬列主義的了解，以便對黨對革命能有更多的幫助與貢獻。而黨及黨的負責人在解決黨員問題時，就須注意到黨員的工作情況、生活情況、教育情況，使黨員能更好的爲黨工作，並使黨員能充分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業中發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別對於那些真正是克己奉公的同志們，要給以更大的注意。只有這樣，只有兩方面的注意與努力，才能配合起來，才能對黨有更大的利益。

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之舉例

同志們！我們如果拿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瞭解，及黨員與黨的利益之正確關係的建立作爲標準，來測量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那我們就可發現：一方面有許多黨員和幹部是合於這些標準的，他們能够作爲黨員的模範；另一方面就還有一些黨員和幹部，還不合於這些標準，還存在着各種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我在這裏不妨公開的大要的指出來，以便我們的同志在修養時注意。

黨內同志中有那些在基本上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呢？不是很有系統的來講，可以列舉如下：

第一，加入我們黨的人，不只是來自社會上的各階層，而且是帶着各種各色的目的與動機而來的。很多的黨員，固然是爲了要實現共產主義，爲了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偉大目的而來加入共產黨；但是還有另外一些黨員，還是爲了其他的原因與目的而來加入黨的。譬如，我們就有某些農民同志，以爲過去『打土豪分田地』就叫『共產主義』，再進一步的真正的共產主義，他們在入黨時是不懂的。在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於共產黨抗日堅決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來加入黨的。另外還有些人，主要是由於在社會上找不到出路——沒有職業、工作和讀書，或者要逃脫家庭與婚姻等，而來共產黨中找出路的。還有些人，是仰慕共產黨的聲望，或者只模糊認識共產黨能救中國而來的。最後，甚至還有個別的人，爲了要依靠共產黨減輕捐稅，爲了將來能『吃得開』，以及被親戚朋友帶進來的等等。這些同志，沒有清楚而確定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與艱苦，沒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某種轉變關頭，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中之某些人要發生一些動搖與變化，也是很自然的。他們是帶了各種各色的思想意識到黨內來。因此，對於他們的教育與鍛鍊及他們自己的修養，乃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否則，他們就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某些人要來依靠共產黨，到共產

黨內來找出路，贊成共產黨的政策，總算還是不錯的，他們並沒有找錯共產黨。除開投機分子、敵探、漢奸外，我們對於這些人是歡迎的。黨綱、黨章必須承認與遵守，至於對共產主義及黨綱、黨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那在他們進了黨之後再來學習，並且根據他們所學習的再去在鬥爭中鍛鍊與修養，這樣，完全可能使他們變為很好的共產黨員。本來，許多人在加入黨之前，要他們深刻理解共產主義及黨綱、黨章，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提出『承認』黨綱、黨章作為入黨條件，而沒有提出『精通』黨綱及共產主義等作為入黨條件，也就是這個原因。這些人雖然還不精通共產主義，但他們在目前共產主義的運動中，在目前的革命運動中，可能成爲一個積極的戰士；而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們加緊學習與修養，可能成爲很好的自覺的共產主義者。此外，在我們黨章上還規定黨員有退出共產黨的自由（加入黨是沒有自由的）。任何黨員，如果他對共產主義不能深信，不能過黨內嚴格的生活，或其他原因，他有向黨聲明出黨的自由。只要他不洩露黨的秘密，不反對共產主義，不作破壞黨的行動，黨是允許黨員出黨，並不作任何追究的。至於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和奸細，那我們當然要清除出黨。這樣，我們黨的純潔仍能保持。

第二，在某些黨員中還帶着比較濃厚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這種個人主義表現在：某些人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時，把個人利益擺在前面，

而把黨的利益擺在後面，或者他對於個人總是患得患失，計較他個人的利益；或者假公營私，藉着黨的工作去達到他私人的某種目的；或者藉口原則問題，藉口黨的利益的「大帽子」，去報復他私人對其他同志的仇恨。講到待遇、享受及其他個人生活問題，他總企圖要超過別人，和最高的人比較、競賽，『孜孜以求之』，並以此誇耀於人。但講到工作，他就要與不如他的人比較。有吃苦的事他設法避開，在危難的時候他企圖逃走，勤務員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風頭他要出，黨的榮譽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圖霸佔，但一切『倒霉』的事情，總是沒有他。同志們！在我們黨內是存在有這種人的。這種人的腦筋，浸透着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他甚至相信這樣的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世界上不會有真正具體的大公無私的人，或者那是蠢才與傻瓜』。他用了這一大套的剝削階級的話，來辯護他的自私自利與個人主義。

這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也常常表現在黨內的無原則糾紛、派別鬥爭及宗派主義與本位主義的錯誤中；表現在對於黨的紀律的不尊重與隨意破壞的行動中。無原則鬥爭，大部分是從私人利益出發，派別鬥爭與宗派主義常把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擺在黨的利益之上。他們常是自覺的在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中破壞黨的組織與紀律，無原則的或是故意的打擊某些人，又無原則的結識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隱

嘴，互相吹噓……。

至於在黨內存在的本位主義，與這種個人主義是不同的。本位主義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同志只看到部分的利益，看到自己部分的工作，而沒有看到全局、看到人家部門的工作，因此，發生只顧本部工作利益以至妨害別人的錯誤；這在政治上說來，是一種與行會主義相似的東西。犯本位主義錯誤的同志，他的動機，他的出發點，不見得一定是怎樣不好的。這固然不能與個人主義來比較，不過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他就常常也犯本位主義的錯誤。

第三，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等，在黨內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識中還是或多或少存在着。

有這種思想的人，他首先計較他個人在黨內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風頭，歡喜別人奉承他，抬舉他，他有個人領袖的慾望，他逞能幹，好居功，好表現自己，好包辦，沒有『涵蓄』，有濃厚的虛榮心，不願埋頭苦幹，不願作技術工作。他驕傲，有了一點成功即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壓倒別人，不能平等的謙遜和氣的待人。他自滿，好爲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而不受別人的指揮，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羣衆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批評。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時』，不能『倒霉』。他受不起打擊和委屈，處理自己沒有伸

縮性，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把自己造成爲『偉大人物』與『英雄』，甚至爲了滿足他這種慾望而不選擇手段。然而，在他這種目的不能達到之時，他受到打整和黨內同志冷淡的待遇之時，他就可能有動搖的危險。在黨的歷史上由於這樣而動搖出黨的人已經不少。在這種人的思想中殘存着剝削階級的意識，不了解共產主義的偉大，沒有共產主義偉大的胸懷。

同志們！共產黨員是不能有個人的自滿與驕傲的。卽算某些同志是能幹，作好了某些工作，獲得了大的成績（如我們的軍官率領萬千隊伍打了勝仗，我們各地黨與羣衆工作的領導者在工作中創造了較大的局面等）吧，這或許是『偉大』的成績，很可以『自驕』一下。然而，如果拿這點成功和整個共產主義事業比較起來，又到底有多大呢？這還只能是『滄海之一粟』呵！這對於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來說，又有什麼真正可以驕傲的呢？

個人地位，對於黨員個人來說，又有什麼得失值得計較的呢？個人地位總莫高過於皇帝了。然而拿這來與共產主義事業來比較，到底又有多大呢？還不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罷了。這又有什麼可以值得計較與誇耀的呢？

不錯，在我們黨內，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是需要無數的共產主義的英雄，需要

很多有威信有地位的黨與羣衆的領袖。目前我們有威信的革命領袖與英雄還真是太少了。還需要鍛鍊與培養很多很好的各方面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領袖與英雄。這對於我們的事業，倒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視的事情。誰若鄙視這一點，誰就不懂得怎樣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前進。所以我們還必須大大提高我們黨員在革命事業中的前進心與朝氣。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發揚還是不夠的。譬如，某些黨員的學習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論上的興趣不高，就表現這一點。所以，我們反對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決不是反對黨員的這種前進心，——這是共產黨員最寶貴的品質。但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前進心，與個人主義的前進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擁護真理，並最有效的爲真理而鬥爭，它有無限的發展前途和進步性；而後者即對於個人來說，它的進步性也極有限度，並且是沒有前途的。因爲後者常爲個人利益而自覺的抹煞、掩蔽與歪曲真理。所以，我們的同志，必須了解：真正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決不是個人主義的領袖與英雄，決不是可以自稱的。凡是自稱領袖或自己個人企圖作領袖的人，他在我們黨內就決不能成爲領袖。不論是全國的或地方的領袖都是大家擁護成功的。我們黨員羣衆不會擁護那種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有個人領袖慾望與虛榮心的人，來作自己的領袖。任何黨員沒有權利要求其他黨員羣衆擁護他作領袖或保持他的領袖地位。只有

毫無個人目的、忠實於黨的黨員，他有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與品質，他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他有相當的工作才能，他能實際指導黨的工作，他不斷的努力學習前進，他才能取得黨與羣衆的信仰和擁護而成爲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

我們的同志還應了解：任何黨員，任何領袖與英雄，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只能作一部分工作，盡一部分責任。共產主義事業是一件無數千萬人長期集體創作的事業，任何個人也不能包辦。即使我們偉大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只能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作好一部分工作。他們的事業還待我們千萬人來繼續努力。我們，普通的黨員，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也是作一部分工作，盡一部分責任。我們的這一部分，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部分，當然是小得多。然而，我們總有一部分。大小雖然不同，但這個「一部分」是相同的。所以，我們只要作了一部分工作，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當然盡可能使我的這一部分大一點，然而，如果不能大，就小一點，對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不值得計較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們最少總求其不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還能大小不一的盡我們一部分責任。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所應懷抱的態度。因此，那些不願意作技術工作的同志，以爲在技術工作中是埋沒了他，使他「不能」（其實也能，如愛迪生、斯達哈諾夫等都是技術工人中出來的）揚名後世，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似乎這對共產

主義事業不知是何等大的損失！因此，就多少喪失他共產黨員所應有的前進心。同志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技術工作在黨的工作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這些同志的工作，也是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盡了一部分責任，和其他工作的同志一樣。共產黨員對於自己的工作，只看什麼工作是當時重要的，他們就去作，不管願意與否，或是能出風頭與否。譬如在俄國革命成功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曾經動員很多擔負重要黨、政工作的幹部去學習作生意，因為，在當時只有共產黨的買賣作得好，才能戰勝私人資本主義。即使沒有黨員願意作買賣的，但由於作買賣重要，大家都去作了。而他們是作得對的，不作的不對！

自然，我在這裏重複一句，黨的負責人分配黨員的工作，是應該注意各個黨員不同的情況，注意分配適合他個性的工作，發揚他的長處，並鼓勵他的前進的熱忱。但被分配的黨員不能拿這一點作為理由，來拒絕接受黨給他的工作。

第四，有少數同志在黨內反映着濃厚的剝削階級的意識，他在黨內常常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黨內的同志，來處理黨內的問題，完全沒有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的偉大而忠誠的互助精神與團結精神。

有這種意識的人，在黨內是想抬高自己、發展自己；但他以打落別人，妨害別人發展的方法來抬高與發展自己。他要出人頭地，他嫉妬強過他的人，別人走在

前而或趕上與超過他，他是不甘心的，總想把別人扯下來，弄得別人落後才甘心。他不甘心居於人下，他只顧自己好，自己發展，不管別人的困難。他看見別的同志遭遇困難，受到失敗、倒霉，或者受到打擊之時，他幸災樂禍，暗中竊喜，完全沒有同情心。他甚至對同志有『害人之心』，『落井下石』；利用同志的弱點和困難去打擊與破壞同志，他在黨內也利用黨的組織上工作上的各種弱點，在黨內『鑽空子』，擴大這些弱點，以取得他個人的某些好處。他在黨內好播弄是非，好在同志的背後說人家的壞話，進行一些陰謀詭計來挑撥同志中的關係。他好參加黨內一切無原則鬥爭，對各個『是非』感到很大的興趣。特別是黨處在困難的時候，他就在黨內引起與擴大這些糾紛。總而言之，他邪氣十足，毫不正派。以這樣的人而說他能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思想，那完全是笑話嗎？很明白，這完全是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之反映。因為一切剝削者要發展自己都必須妨害別人。資本家要發展自己的財產或在恐慌時不破產，他必須擠倒很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必須使無數的工人飢餓。地主要發展自己，它必須剝削農民，必須使許多人失去土地。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要發展自己，它們必須妨害其他國家發展，使奧大利、捷克、阿比西尼亞等亡國，使中國受侵略。剝削者以妨害別人，使別人破產為發展自己的必要條件，是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受苦的基礎上；所以剝削者

不能有真正堅固的團結，不能有真正的互助，不能有真正的人類的同情心，而必須進行陰謀詭計，暗害人家，利於別人倒台破產。然而他們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裝着假聖人與『公道的主持者』在大衆面前出現。這是一切沒落的剝削者的特點。然而這些東西反映到我們黨內一部分人的意識中間來。這些東西對於剝削者來說，也許是他們的『高尚』道德的標準，但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就是大逆不道。

無產階級完全與上述的情形相反。無產階級不剝削別人，而受別人剝削。工人們彼此間沒有基本的利害矛盾，與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羣衆也沒有基本的利害矛盾。工人們要發展自己，求得自己的解放，不獨不需要妨害其他工人與勞動人民的利益和發展，而且必須與其他的工人及勞動人民大衆團結一致，才能發展、抬高與解放自己。無產階級自己要解放，必須同時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與全人類。一個工人或一部分工人的單獨解放，是不可能的。他必須把人類解放事業進行到底，半途而廢，中途妥協，是不可能的，而必須是全人類共同的總的解放。無產階級這種地位的客觀情況反映到覺悟的工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就完全與剝削者的思想意識相反。他們一方面固然要用最無情的手段對付人民公敵，但另一方面決不使用這種手段對待自己的兄弟與同志，而使對待敵人的態度與手段和對待自己同志的態度與手段截然分開。他們對於自己階級中的兄弟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具有偉大

而忠誠的友愛、熱情與同情心，對自己的兄弟有偉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團結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們在自己的兄弟以及人類中根本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特權的思想，認為這種特殊地位，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是一種侮辱。他們想發展自己，抬高自己，但是他們必須同時發展別人，抬高整個勞動階級的地位，才能使自已抬高。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落於人後，而有極高的努力前進的心理，但他們必須尊敬、愛護與幫助在這些方面強過他們的人，而努力向他們學習，絕無嫉妬之心。他們極關心自己階級及世界全體勞動人民的痛苦與困難的境遇，關心每一個地方勞動者的解放鬥爭及其勝利與失敗的消息，認為不論那一個地方勞動者的勝利與失敗，即是他們自己的勝利與失敗，而表示極大的同情心與聯帶關係。他們認為對於任何勞動者及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鬥爭，採取漠不關心或幸災樂禍的態度，是犯罪的。他們愛護自己的同志與兄弟，對於自己同志與兄弟的弱點或錯誤，是公開、坦白而誠懇的指示出來（這正是真正的愛護的表示），絕不在原則上敷衍、將就或甚至助長（這不是愛護的表示），並用一切方法幫助同志去克服與改正這些弱點和錯誤，而不利用與廣大同志的弱點和錯誤去弄得同志『倒霉』，以至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們對於自己的同志與兄弟能夠『以德報怨』，只要同志改過，即毫無報復之心，他們能夠『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對自己嚴格，對同志寬大；但是他們有堅定的嚴格的原則立場，光明、正直而嚴肅的態度，不能在原則上有任何讓步，不能容許別人對黨的利益有任何損害，也不能容許別人對自己的無禮侮辱，尤其鄙視別人對自己無原則的過度的奉承、阿諛和諂媚。他們反對自己兄弟中一切無原則的鬥爭，同時不使自己被牽扯到無原則的鬥爭中去，不被那些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後的批評所牽動與刺激，而喪失自己原則的立場、冷靜的思考與鎮定的態度。這一些代表共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我們每一個黨員所應該反映、發揚與學習的。而我們偉大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一生，就是這種思想意識最高的、模範的具體代表者。這一些是現今社會中人類的正氣，共產黨就是表示人類正氣的。我們要發揚與提高這種正氣去克服一切的邪氣。

第五，在我們黨內及各種組織中，還存在着官僚主義（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講）。在某些個別同志中，還存在着『小氣』，計較小事，不識大體等毛病。他們沒有共產主義的偉大氣魄與遠大眼光，看不到大的方面，而對於他們鼻子下面的小事物却是津津有味。他們對於黨內與革命中的大問題、大事變不大感覺興趣；而常常計較那一針一線，一言一語的小事，爲了這些小事，他們可鄭重其事的和別人爭論不休，傷感備至。他們也容易被別人的小恩小惠所籠絡。他們具有農村社會中

小生產者那種狹窄性的特點。另外，還有個別的人，似乎就是一些不清楚不確定的人物，對於他，可以這樣也是，那樣也是，雙方討好，到處逢迎。他可以對他心恨的人在面子上敷衍得很好。他可以當你的面說你好，背地裏又說你壞；可以在這個人面前說某人好，在那個人面前又說某人壞。『看人看勢說話』，『順風轉舵』，偏向有勢力的方面，毫無原則，是他的特點。有時候他簡直如蝙蝠一樣，看那一方面勝利，他就投到那一方面。這種『非驢非馬』，『兩面三刀』的人，在我們隊伍中並不是完全沒有的。這種人表示他們有小商人的特性。此外，還有個別的人受不起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引誘，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金錢美色，他們就動搖起來，以至因此可以犯罪，直至叛變黨與革命。

此外，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動搖性、流氓無產階級與破產農民的破壞性等，也常反映到黨內一些同志的意識中來，我們不必再往下面列舉了。總而言之，在我們黨內，除開代表着偉大的、堅強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而外，還有一些同志中或多或少的反映着社會中各種非無產階級的以至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這些思想意識，有的時候潛伏着，只在一些個別的日常的小問題上暴露出來；有的時候就發展起來，系統的暴露。在黨內各種原則問題上，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和黨內鬥爭中。黨的組織的個別部分，個別環節，也可能被這些錯誤的思想所統治

所腐蝕。在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如在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等人的時代，這種錯誤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暫時的支配着黨的主要領導部分或重要領導部分。但在平常的時候，它又被正確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壓服着。這樣就表現為黨內的思想意識的鬥爭。對於某些黨員個人來說也是這樣，有的時候他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潛伏着，被克服着；但在另外的時候又可能發展起來，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動；這樣也就表現為個人的兩種不同思想的矛盾和鬥爭。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我們自覺的要以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及我們對於個人發展與階級的、民族的和人類的解放利益的正確關係之了解與反映，去克服和肅清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

同志們！共產黨是代表着現今人類社會中最光明的最進步的一方面。是人類最高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寄託與發育之所。世界上最覺悟、最進步、最健全、最有道德與正義感的人士，集中在共產黨中，而堅持不屈的與一切黑暗勢力搏鬥着，為人類社會的光明與最後解放而奮鬥着。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黨最好的支部之一。它有強固的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同時繼承着中華民族歷代進步思想家、

事業家的優良傳統。它是代表中國社會中最進步最光明的一方面，在它的組織內集中着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男女。它與中國社會中舊的黑暗勢力和傳統作過了長期的鬥爭，有着長期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和鍛鍊，這一切，是我們共產黨人足以自豪的。而且我們完全自信並有一切的根據說：我們一定要取得最後的勝利與最後的成功。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們的組織中還不是盡善盡美的，還不是沒有缺點與錯誤的，在我們的隊伍中，還不是沒有不健全的人以至壞蛋的，這些不健全的人和壞蛋，他們還不是不能幹出一些污七八糟的壞事來；這就是說，在我們光明的黨內，也還有宅黑暗的東西，黑暗的一面，這就是我在前項中所列舉的那些東西。

同志們！家裏既已招來了醜女婿或者娶來了壞媳婦，總不好完全不讓他們見客的。我們對於這些黑暗東西縱想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也是不可能的。廣大的人民經常與我們黨接觸聯系；同情我們的人要來參觀；廣大的仰慕我們的人士及青年男女要來我們這裏學習或加入我們黨，這些人來到我們這裏，除開看到了我們一切進步的、光明的、美麗的東西和『家人』之外，就還碰到了我們的醜女婿和壞媳婦，在稠人廣眾之中說了些醜話，演了些醜態，如是就引起了一些客人及新黨員的疑問和奇怪。他們這樣問：共產黨不是最公平的嗎？共產黨人不是最優秀的男女嗎？爲什麼在共產黨內還有這種醜人壞事呢？這難道不奇怪嗎？有一些青年同

志，當他們未入黨前，他們對現社會有極大的不滿，覺得一切都不是出路，只有共產黨最光明。他想了，他入黨以後一定一切都會滿意，都會有辦法的。但當他們入黨以後，他們開始感到了黨內還存在着某些錯誤缺點及黑暗的東西，而且實際上也不能使他們一切都滿意（因為他們所滿意的事，有多少是不合於黨與革命的利益）的，他們今天實際上感到的與他們原來的理想並不完全相合。如是他們開始懷疑，覺得奇怪。『爲什麼黨內也有這些事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有些人在沒有來延安和進抗大以前，以爲延安和抗大是合於他們理想的那樣好，及至到延安進了抗大以後，也不能處處都使他們滿意，於是他們也覺得奇怪，『爲什麼延安與抗大也有這些不能令人滿意的事呢？』某些人因爲對於這些問題不能解答，以至在悲觀失望着。

對於這些問題，除開引起我們的警惕，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幹部嚴重注意——要好好對待與帶領我們的新黨員及一切傾向我們的人，不能給他們以壞的影響而外，還少不了要向我們黨內黨外的同志們解釋一番。

爲什麼在我們光明的黨的組織內還有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黨不是空想的從天上掉下來的黨，而是現實的從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黨，我們的黨員雖是一般比較最優秀的中國男女，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但

他們來自中國社會的各部分，而且現今還生活在社會中。但今天中國這個社會是充滿了剝削者的影響——自私自利，陰謀詭計，官僚主義等各種惡濁的東西。我們有很多最好的黨員不易受這些東西的影響，但還有某些黨員多少帶來一些或者反映一些社會中的惡濁東西到我們黨內來，這有什麼奇怪呢？正如一個人從污泥中爬出來，而且經常要在污泥中去混，他的身上帶有污泥，這有什麼奇怪呢？這完全不奇怪！這是一定有的。共產黨內如果完全沒有這些惡濁的東西，倒是奇怪。爲什麼在這樣惡濁的社會中能够產生毫無惡濁東西的共產黨呢？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我們可以說：只要社會中還有這些惡濁東西，社會中還存在着階級，存在着剝削階級的影響，那末，在共產黨內一定也多少還會存在有這些惡濁東西。因此，共產黨就有革命的任務，黨員就有修養和鍛鍊的必要。因此，我們除開進行社會鬥爭，反對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勢力和東西以外，還必須進行黨內鬥爭，反對黨內某些不堅定的分子反映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到黨內來。這就形成爲我們黨內矛盾與黨內鬥爭的根源。我們也就在黨內黨外各種鬥爭中，去改造社會，去逐漸清除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與黨員，解決黨內的矛盾，使我們的黨與黨員達到健康與堅固的地步。

斯大林同志說：

『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底矛盾是在下列兩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 是在階級鬥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散佈其影響，無產階級中那部分最不堅定的階層（也就是指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常受此影響而向其投降。絕不能以為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孤立而逍遙於社會以外的東西。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分，有千索萬緒將它和社會上許多不同的階層來聯系着。而黨又是無產階級底一部分。因此之故，黨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脫離它和資產階級社會許多不同階層間的連系而不受其影響。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往往深入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資產階級的意識、道德、習慣和情緒，往往經過那部分與資產階級社會這樣或那樣聯系着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深入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是因為工人階級成份之複雜，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層。……

第一個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它的核心及經常幹部，這就是『血統的』無產階級羣衆而早與資產階級破壞了一切聯系了的。這一個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個階層，這就是，不久從非無產階級中出身，由農民、小資產階級隊

伍及知識分子中出身的。這種階層，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無產階級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好、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階層是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

第三個階層，這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之上層分子，是無產階級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結世界上的權貴人物而『自謀其位』。這個階層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當的基礎。』（『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二四頁）。

同志們！這就是爲什麼在我們光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內部還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各種錯誤缺點及惡濁東西的根源。這就是黨內還存在着各種矛盾的根源。

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及黨內鬥爭

由於剝削階級的影響，由於工人階級成份的複雜，還由於今天我們黨內成份的複雜，所以就產生我們黨內各個黨員間思想意識的差別，觀點、習慣、嗜好和情緒的差別；產生各個黨員間在某種程度上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道德觀；而且也產生各個黨員間對於事物、對於革命中的各種問題之不同的認識方法與思想方

法。——有一些人，是正確的、客觀的從事物之發展的、聯系的狀態上去看事物；而另外一些人，就是不正確的、主觀的從事物之靜止的、孤立的狀態上去看事物，或者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這一方面，或者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那一方面。總之，這另外一些人都不是符合客觀事物之發展與聯系的規律去全面的看問題，而是片面的主觀的去看問題。——因此，就產生各個黨員間不同的活動方法，就引起黨內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同的主張與爭論等，就引起黨內的鬥爭。特別在革命的轉變關頭，在革命鬥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增加的情況之下，在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和推動之下，這種分歧與爭論也就必然要更加激烈起來。

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黨內有無不同的思想意識，有無意見上的分歧，這是一定有的。問題的中心，是在於如何解決黨內的矛盾，如何跑出這種分歧；如何克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當然，這只有黨內鬥爭，才能解決這種矛盾，征服這種分歧和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正如恩格斯所說：『在任何時候，沒有誰可以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

對於我們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在黨內外有幾種不同的人，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和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人，他們不看見或者不願看見黨內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自

目的樂觀着，自以爲我們黨內什麼都好；因此，也就鬆懈他們的警覺性，放鬆他們對於這些缺點、錯誤及一切不好的東西的鬥爭。第二種人，就只看見或差不多只看見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不見黨的光明，以爲黨內什麼都不好；因此，而悲觀失望，喪失他們對於黨的前途的信心，或者在看見這些東西之後，大驚小怪，以爲這將『了不起』，而使自己慌亂起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片面的。至於我們的看法，與前兩種人都不同，我們一方面看到我們的黨是中國最前進、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另一方面，又清楚看到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各種大小不一的缺點與錯誤及不好的東西；同時，我們還清楚了解這些東西的來源及糾正與逐漸肅清它們的方法，而加強自己的努力與工作，進行必要的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和革命前進。

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與看法不同，對於我們黨內這些不好的東西，也就有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態度，這就是高興我們黨內有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幸災樂禍，並想一切方法利用與擴大這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有時是採取反對某種錯誤擁護黨的路綫的形式，而把錯誤弄到另一方面去），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托派分子所採取的。

第二種態度，這就是同情、接受並學習黨內某些錯誤的思想及壞的樣子，以滿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圖與慾望。他認為黨內某些缺點、錯誤的存在對於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覺與不自覺的助長某些缺點、錯誤的發展而加以利用。這是黨內的投機分子及品質極不好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三種態度，這就是自由放任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各種壞的現象不管，而任其自流的發展，他得過且過，而不願和這些東西進行鬥爭。或者他懼怕黨內鬥爭和自我批評，認為這是對黨有害無益的，或者是麻木不仁的不願看見這些現象，或者是對這種現象敷衍了事，採取調和的折中的態度。這是對黨責任心薄弱的黨員及有濃厚自由主義思想與犯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四種態度；這就是對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某些思想不很正確的人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隨便的宣告和他們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他們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但如果一下不能把他們肅清，或者還碰了釘子的時候，就表示沒有了辦法，悲觀失望，傷感起來；或者『潔身自好』，不管他們，或者自己遠遠的離開了黨。這個絕對的態度，還表現在對於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的機械的了解，他們以為在黨內同志中鬥爭愈兇就愈好，把什麼小事都提到所謂『原則的高度』，對什麼小缺點也加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的鬥爭手段來懲罰

同志；他們不按客觀需要及客觀事務發展的規律來適當的具體的進行黨內鬥爭，而機械的、主觀的、極其橫暴的、不顧一切的來『鬥爭』。他們認為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開展黨內鬥爭，而且鬥爭得愈多愈兇就愈好，以至發展到故意在黨內搜索『鬥爭的對象』，故意製造黨內鬥爭，並使黨的工作的推進依靠在這種機械的所謂『鬥爭』上面。這是不了解黨內矛盾的根源的黨員，缺少辦法對付黨內分歧的黨員和機械了解黨內鬥爭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五種態度，這就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和上述四種態度相反。（一）我們首先認識與辨別黨內各種現象、各種思想意識、各種分歧的意見與主張，那些是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益的，而那些又是不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害的；或者在爭論的兩方都是不對的。對的應該是第三種意見與主張。經過冷靜的辨識與思考之後，決定自己明確的態度，而站在正確的方面。不盲從，不崇拜任何偶像。（二）學習、提倡並發揚黨內一切好的模範和正氣，贊成一切正確的主張與意見，不學一切壞樣子；不受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三）不採取自由主義，而與黨內各種原則錯誤的思想和主張，與黨內一切壞的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去不斷克服這些錯誤與現象，不敷衍不放任這些錯誤與現象的發展，使之損害黨的利益，也不畏懼這種黨內鬥爭。（四）但是不抱機械的絕對的態度，

在原則上的不調和與明確性和鬥爭方法 方式上的靈活性與忍耐 說服的精神聯合起來，在長期鬥爭中去教育、批評、鍛鍊與改造那些有錯誤思想，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是具體的、適當的去進行黨內在各個時期各種原則問題上所必要的思想鬥爭，而不是主觀的、機械的、神經病似的在黨內亂鬥一陣，也不是有鬥爭的嗜好。

(五) 在黨內鬥爭中團結黨，提高黨的紀律和威信，對於黨內某些已經不可救藥的分子，給以組織上的制裁，直至驅逐出黨，這樣來達到黨的健康與鞏固。這是黨內一切好的前進的黨員所採取的態度。在上述五種態度中，只有這第五種態度是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

上述第一、第二種態度之不對，是很明白的。我們的敵人要利用每一個我們的缺點與錯誤來進行破壞我們黨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們除經常提高警覺性之外，應該在黨內每一次缺點與錯誤發生之時，盡可能減少給敵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機會。這是每一個愛護我們黨的同志所應有的職責。如果我們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顧及這一點，如果他只圖當時鬥爭的勝利，一時的痛快，甚至不拒絕壞分子的援助，而與壞分子結合，或者還假借黨外的某種力量與援助來達到黨內鬥爭的某種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黨的紀律上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應該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不正確的和

壞的樣子就不應該學習，而且應該反對。但是在黨內竟還有某些同志除反映些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外，多少還要反映些不正確的思想與學些壞樣子。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似乎是學壞容易而學好難，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這些同志當黨內有某種錯誤發生時，常有意無意的要助長擴大這些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則常常站在錯誤的一方面，或者由於某種立場而站在優勢的一方面。對於這些同志如果不給以嚴重的刺激和鍛鍊，是很難有進步的。

至於第三種對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抱自由主義、官僚主義態度的同志，當然也是極錯誤的，是完全非布爾塞維克的態度，我想，這對於你們馬列學院的學生是很明白的，因為在你們學過的『黨的建設』內有整個一章論到黨內自我批評與思想鬥爭的必要，列寧、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解釋得很清楚、很深刻，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論政黨』一書第四章第五章講得很多，你們可以去參考，所以我在這裏用不着多講。現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們黨內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的確還是不少，真正負責的、正式的、誠懇的進行自我批評，揭發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一切壞的現象，而加以改正與清除，常常是表現得不够，特別由下而上的這種自我批評不够，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大大加以發揚。然而，在黨內那種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怯懦的、對於這個人或那個人、對於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批評與不

滿，背地裏的議論與閑話，却是不少。這是黨內自由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這是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發展、革命鬥爭中的勇氣還不够，黨內民主的正確發揚還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別人，怕引起別人的抱怨和對於自己的反批評，而寧願放任各種錯誤、缺點在黨內存在，採取『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态度，然而却又在背地裏去議論人家，這對於黨是無益而有害的。因為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議論，可以引起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不團結的現象，可以給黨內暗藏的好細分子、壞分子以機會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而黨內的錯誤與缺點也絕不會因為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而得到改正。所以，在六中全會通過的黨規上就禁止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議論，而提倡黨內負責的、正式的、對黨有益的自我批評。

133
黨內既有各種缺點和錯誤存在，既有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存在，而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中之每一種都可以在某種時期發展成爲黨內某種傾向，產生黨內某些原則上的分歧，影響到黨的行動之一致。這種情形，如果不正確的發展的黨內的自我批評，經常揭發與糾正各種錯誤和缺點，不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進行黨內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而採取折衷的態度與『中間』路線，而得過且過，敷衍了事，那末，『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

斯大林)。「我們就不能前進，就不能發展」；「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列寧)。「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日趨於腐化的政黨底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一九頁)

所以，「以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我們黨發展的規律」。『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二二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態度，是不對的，而必須發展自我批評，進行黨內鬥爭，來反對黨內一切壞的現象，征服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鞏固、發展和前進。

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還表現在另外一種現象上。就是常着黨內某種爭論已經發生的時候，許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整天整月的進行空洞的爭辯，或者任意的放縱起來，咒罵黨內一切，並且在這種爭辯中使黨內團結鬆懈，使我們的幹部解體，使黨的紀律削弱，使領導變爲無能，使黨的威信破壞，把我們的戰鬥的

黨的組織與黨的機關變為爭辯的俱樂部。這種現象在過去我們黨的某些組織中是不只一次發生過的。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鬪事』，『而是污衊工人階級』。這是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這與我們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我們的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不是爲的破壞黨的威信，破壞黨的紀律，滅弱黨的領導，而是爲的提高黨的威信，鞏固黨的紀律，加強黨的領導。

至於第四種抱着絕對態度的同志，也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上述第三種自由主義態度之反面。因爲他們不了解黨內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有深厚的社會根源，絕不是一下子可以肅清的。黨內的同志在各種不同的時候，都可能多少不一的反映社會上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只有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的純潔堅定，那樣正確、敏感而深刻的去認識事物，才可以完全不受這些思想意識的影響。所以孫中山先生稱列寧爲『革命的聖人』，也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要在工作中犯一些錯誤，也是每個同志不能免的。如果說，所有多少反映社會上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同志，所有犯錯誤的、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壞分子，都不要，都不能容納，都絕對的拒絕他們，或者肅清他們，那末，我們黨就不能建設。這樣拒絕肅清的極端結果，可能使這種抱絕對態度的同志自己，也

不能不從黨內肅清出去。因為他也不是「革命的聖人」，他也不能不犯錯誤。如過去某些在「肅反」中犯錯誤的同志，就抱有這種絕對的態度。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特別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路程中極大的艱苦工作，是要把人類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共產社會的公民。如果他們了解了這一點的話，了解帶有各種弱點的人類都要使他們在長期鬥爭中鍛鍊、教育、改造成為高等文明的共產主義者，那末，今天爲什麼他們不能夠教育與改造已經加入黨的帶有多少舊社會思想殘餘的黨員呢？自然改造與教育這些黨員，需要長期的、耐煩的教育與鍛鍊工作，是很艱苦的工作。但是，如果這點小的艱苦工作都不願意做，都畏難，那又還說什麼改造世界與人類呢？改造世界與人類的空前艱巨的工作，我們都下決心做，都不畏難，那末，現今世界上還有什麼艱苦工作可以使我們畏難的呢？具有共產主義人生觀、世界觀的黨員，是大無畏的，是不怕一切艱難與困苦的，同時了解世界事物的進程是曲折的。所以，那些抱絕對態度的同志是還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艱巨性與曲折性，他畏難，想走直路，想一下就肅清一切不痛快的東西，一下就跳到他理想的世界去，那末，他要碰壁，是一定的。但及至他在壁上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就悲觀失望，喪失他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前途與信心，這就暴露了他自己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的本質。可惜多少抱這種態度的同志在我們黨內還是不少！

黨內鬥爭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在黨的發展過程中及無產階級鬥爭過程中產生了黨內原則上的分歧；這時候，『只有爲了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斯大林選集』卷二，二一九頁），才能征服這種分歧，解決這種矛盾，任何妥協都無濟於事。黨內鬥爭是必要的，並不是由於我們嗜好鬥爭，歡喜爭辯。這就是說，當着問題已經發展到原則的高度，非用鬥爭來解決不可的時候，我們應毫不躲避的進行黨內鬥爭，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並不是說我們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所有一切不同的意見，均非小題大作、絕不妥協、板着面孔來進行黨內鬥爭不可。斯大林同志說：『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同上）

當着黨內發生機會主義思想、存在原則上的分歧，那我們必須進行反對各種錯誤原則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來加以克服；而不是說在黨內並無原則上的分歧與機會主義發生之時，主觀的硬要擴大同志間在某些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之不同的意見，並把這當作『原則分歧』，硬要『搜捕』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來作爲黨內鬥爭之射擊的『草人』，並且以爲黨的工作，黨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鬥爭

之勝利，就靠對於這種『草人』的射擊之火力的強度，而得靈驗如神的開展。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真正要鄭重其事的進行黨內鬥爭，而是對黨開着玩笑，把帶着極嚴重性質的黨內鬥爭當作兒戲來進行。

對於黨內某些犯了原則錯誤與機會主義思想的同志，當着他不聽說服，不願黨的批評，而堅持錯誤，剛愎自用，頑固不化，抵抗黨的方針，或者採取兩面派態度的時候，應該給以刺激，公開批評，以至給以組織上的打擊和處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並不堅持錯誤，經過討論說服之後，願意改正錯誤，放棄他原來的觀點，或者正在冷靜考慮他的錯誤，而與其他同志進行平心靜氣的討論之時，並不是也要給以打擊與處分。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並不以面孔板得愈兇就愈好，也不以處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以真能教育黨，教育犯錯誤的同志，糾正錯誤，鞏固黨，為自己的最高目的。如果在和平的討論、說服與批評的方式之下，能夠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需要板着面孔爭得面紅耳赤，而不需要處分同志與打擊同志，如果這是可能的話，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然而，我們在以前某種時期內，常常很難聽到黨內的一種公開的公論，說這種並沒有原則分歧的黨內和平與黨內團結是很好的，必要的。照某些似乎瘋癲的人來說，任何黨內和平，即使是在原則路綫上完全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而必須『平地風波』的來製造黨內鬥

爭，才能算得『布爾塞維克』。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布爾塞維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藥的人和以『布爾塞維克』來投機的人才這樣。

同志們！這就是說，爲什麼上述四種態度都是不對的緣故。這就是說，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和壞的現象的解答。本來，我們就是在反對黨內黨外各種黑暗東西的鬥爭中來改造世界與人類，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和我們自己。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黨是在黨外階級鬥爭中——在廣大羣衆革命鬥爭中來鍛鍊、發展與鞏固自己，同時，黨又在黨內鬥爭中達到自己的鞏固與統一，而更有計劃的、正確的、有力的去領導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所以，對於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企圖抹煞黨內原則的分歧，躲避黨內鬥爭，掩蔽黨內矛盾，敷衍了事，是根本上不對的，是對敵人有利的；因爲它與階級鬥爭發展的規律相反，與我們在鬥爭中改造世界與人類的本觀點相反。所以使黨內鬥爭脫離黨外的階級鬥爭——脫離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而變爲空洞的清談，也是不對的；因爲，離開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就不能鍛鍊、發展與鞏固黨。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個極端去，對於一切有錯誤、缺點、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抱着絕對的態度，機械的去進行黨內鬥爭，主觀的去製造黨內鬥爭，也是不對的。因爲，這也要毀損黨，給敵人以乘機攻擊我黨的機會。這也是完全違

背黨的發展之規律的。對於黨內犯錯誤的忠實的同志，不是一開始就和他們決絕，而應該抱着愛護與同情的態度去說服、教育與鍛鍊他們，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不公開打擊他們，驅逐他們。當然，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來損害黨的利益，我們也必須預防投機分子、奸細、托派分子、兩面派分子，利用一切機會來損害黨的利益。

雖然在我們的黨內還存在着某些錯誤與缺點，還有某些個別的部分的壞的現象，但是，我們完全相信，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在偉大的羣衆革命鬥爭中是能夠而且一定要肅清這一切東西的。中國共產黨以往十餘年來鬥爭的歷史及他在各方面的偉大的進步，和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發展的歷史，都使我們對於這一點完全的深信無疑。

黨內鬥爭，是整個革命鬥爭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的同志，不獨是應有黨外鬥爭的鍛鍊與修養，而且應有黨內兩條戰綫鬥爭的鍛鍊與修養。但是，這一點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還沒有真正深刻的體會到，還缺乏這一方面的鍛鍊與修養。這表現在黨內許多無原則的鬥爭中，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即我們有些同志，特別在軍隊中工作較久的某些同志，當他們與黨外反革命鬥爭時，不論是如何的殘酷，如何的艱難困苦，受打擊，委屈與冤枉，他們是絕對不動搖、抱怨、傷心的。但是，當他們在黨內鬥爭中，他們就絲毫也受不起批評、打擊、委屈。

與冤枉，甚至連一句話也受不起。或者他多疑，以為別人的某些話是暗示着他的，爲了這些話，他可以抱怨、傷心至於極點。同志們！這種現象，是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

一方面，我們應該說，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為他堅決的和反革命鬥爭，他把自己的黨當作溫情滿懷的母親。當他在和反革命進行了各種艱難困苦的战斗之後，回到自己偉大母親的懷抱中，是應該受到各種鼓勵、安慰與愛撫的，而不應該受到任何打擊、批評與委屈。他們的這種希望，也是應該有的。然而，有一點他們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這就是我們黨內還有各種錯誤、缺點，還有黨內鬥爭；每一個同志也必須經過這種鬥爭，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各種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批評、打擊，以至委屈和冤枉，是不可避免的，每一個黨員都是要經過的，這並不是黨的無情，而是黨在階級鬥爭中不能避免的現象。但是，這些同志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一遇到這種現象，就覺得奇怪，就出乎意外的難過與傷心。

在這裏，我覺得一方面，我們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的同志團結，要用誠懇明白的態度對待同志，不要隨便的用言語去傷害其他的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別人的背後不負責任的去批評同志。除開十分頑固、堅持錯誤、在黨內作各種壞事的人以外，對一般同志的錯誤，應該清楚的、誠意的站在幫助與愛護同志的立

場，當面的勸告與批評。這是我們尤其是比較負責的同志應該注意的。應該記着中國一句古話：『利刀割體創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的同志自己就應該經常有黨內鬥爭的準備，應該受得起打擊、批評以至冤枉、誤會。尤其不要為別人一些不負責任的、甚至不正確的批評與流言所刺激而衝動起來。除開同志間組織上正式的相互批評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行為正大，對於別人不負責任的誤會與批評，必要時可以申明與解釋一下，如果解釋不了，只好讓別人去說。也應該記着中國兩句古話：『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因為世界上完全不被別人誤會的人是沒有的。我們一方面應受得起誤會，不牽入無原則的鬥爭，另一方面自己應經常警惕，檢點自己的思想行動。

這就是說，我們自己不要用言語隨便去傷害別同志，但當別人用言語來傷害自己的時候，應該受得起。

黨內無原則的糾紛，我們是在根本上反對的，黨也是根本上禁止的。因為它『無原則』，對黨有害無益。因為它『無原則』，所以沒有多大『是、非、善、惡』可分，所以我們不要在無原則鬥爭中去評判誰是誰非，去計較誰好誰歹，這是弄不清楚的。我們只有在根本上反對與禁止這種鬥爭，要求進行這種鬥爭的同志，

無條件的停止這種鬥爭，回到原則問題上來。這是我們對無原則糾紛所採取的方針。但是，不管黨的禁止和我們的反對，黨內某些無原則糾紛仍然要發生，或者在某些原則鬥爭中夾雜着許多無原則的問題，又怎樣呢？或者這些無原則的糾紛特別要來光顧我，把我牽扯在內，又怎樣辦呢？那末，我們還只有着重原則問題，而不要去着重無原則問題，還只有根據上述的方針嚴正對待這些無原則糾紛，始終站穩自己的原則立場，不被牽扯到無原則糾紛中去。不要人家來一個『不對』，我也還他一個『不對』。我應該始終站在『對』的方面，去反對人家的『不對』。這件事對於我們某些同志來說，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所以，也必須有鍛鍊和修養。

總而言之，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要我們在基本上鍛鍊成爲一個忠實而純潔的前進的模範黨員和幹部。我們要：（一）從馬列主義的學習與革命的實踐中來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建立自己的黨與階級的堅定立場；（二）根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堅定的黨的立場，去檢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動，糾正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同時，以此去觀察問題，觀察其他同志；（三）經常採用適當的方式與態度和黨內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鬥爭，特別是影響到當時革命鬥爭的各種思想；（四）在思想、言論、行動上嚴格的約束自己，主要是對於當時革命鬥爭有關的政治思想、言論和行動上嚴格的立場與原則來約束；除此以外，

最好連許多『小節』（個人生活與態度等）地方也注意到；但對其他同志的約束，除開原則問題與重大的政治問題外，就不要過分嚴格，不要在『小節』地方去『吹毛求疵』。

同志們！黨員基本的思想意識的修養，簡單講來，就是這樣。

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中共二十週年紀念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甲)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年的革命鍛鍊，現在已經成爲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這樣，就要求我們的黨更進一步的成爲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爲有組織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的統一的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複雜的鬥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擔負的偉大歷史任務。因此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全黨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够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乙)我們的黨，雖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奮鬥的歷史，雖然已經是和廣大羣衆密切聯系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的環境，是廣大農村的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佔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這些傾向，譬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鬥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亦會身敗名裂，叛徒張國燾的結局，便是明顯的歷史教訓。這些缺乏黨性的傾向，今天在黨內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在某些個別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是確實存在着的。上述的這些傾向，具體的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1) 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脫，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2) 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不動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可以

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在幹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

(3) 在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於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誇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羣衆真正密切聯系。

(丙) 爲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採取以下辦法：

(1) 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要求各個獨立工作區域領導人員，特別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時候更需要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應當在黨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鬥爭。

(2) 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

(3) 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才更能挽救幹部和不使工

作受到損失。反對當面客氣，背後指斥，一切批評應當是正面坦白誠懇的提出，目的是爲了挽救，而不是爲了打擊。應當強調黨內的團結互助，愛護幹部，幫助幹部在政治上的進步。但對於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時預防、加以紀律制裁。

(4) 要在全黨加強紀律教育，因爲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都必須如此。

(5) 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求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負責的領導的幹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把黨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任何人都不應有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觀念，要提倡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幹，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膚淺的作風。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

(6) 最後決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羣衆對於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

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 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

抗戰以來，各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一般的是統一的，黨政軍民（民衆團體）各組織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團結的，因而支持了幾年來艱苦鬥爭的局面，配合了全國的抗戰。然而由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由於對某些政治觀點與組織關係還缺乏明確的瞭解與恰當的解決，黨政軍民關係中（實際上是黨政軍民系統中黨員幹部的關係），在某些地區，還存在着一些不協調的現象。例如：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齊，各自爲政，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黨政不分，政權中黨員幹部對於黨的領導鬧獨立性，黨員包辦民衆團體，本位主義，門戶之見等等。

這些不協調的現象，妨害抗日根據地的堅持與建設，妨害我黨進一步的布爾塞維克化。根據地的建設與民主制度的實行，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加以日寇「掃蕩」的殘酷，封鎖線與據點的增強，上下級聯系的困難，抗戰的地區性與游擊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統上下級隸屬關係更加靈活，每一地區（軍區、分區）活動的獨立性以及活動各方面的領導統一性更加擴大與增強，要求各地區各種組織，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給敵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間隙。爲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決定：

（一）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衆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爲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取消過去各地黨政軍委員會（黨政軍委員會）的設立，在根據地創立時期是必要的（正確的）。各級黨委的性質與成份必須改變，各級黨委不應僅僅是領導地方工作的黨委，而應當是該地區的黨政軍民的統一的領導機關（但不是聯席會議），因此它的成份，必須包括黨務、政府、軍隊中主要負責的黨員幹部（黨委之常委亦應包括黨務、政府及軍隊三方面的負責幹部），而不應全部或絕大多數委員都是黨務工作者。各級黨委的工作應當是

照顧各方面，討論與檢查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應僅僅局限於地方工作。

(二) 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的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團、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衆團體黨團及黨員，均須無條件的執行。政府、軍隊、民衆團體的系統與上下級隸屬關係仍舊存在。上級政府的決定、命令、法令，上級軍事領導機關的命令、訓令，上級民衆團體的決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須經過各該機關黨員負責人交同級黨委批准，或事先商得黨委負責人同意，然後頒發，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僅下級政府、軍隊、民衆團體必須無條件執行，下級黨委也必須無條件執行，不得假借無上級黨委指示而違抗或擱置。下級黨委對上級政府、軍隊、民衆團體之決定如有不同意見，可報告上級黨委。在遵照各組織上級的決議解決具體問題而黨委內部發生爭論時，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解決之。政府、軍隊、民衆團體負責人即使不同意多數意見，亦必須執行同級黨委的決定，但可將自己的意見報告上級有關機關。

(三) 中央局與中央分局爲中央代表機關，由中央指定之。區黨委、地委，由軍隊與地方的黨組織的統一的代表大會選出，經上級批准之。區黨委、地委，應包含地方黨的組織，軍隊黨的幹部與政府黨團的負責人。主力軍是否參加縣委，由各地按具體情況決定之。縣委（無主力軍參加之縣委）及區委，只包含地方黨、地方

軍及政府的黨的負責人。各級黨委書記，應選擇能掌握黨政軍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擔任之。因此，黨委書記不僅須懂得黨務，還必須懂得戰爭和政權工作。區黨委書記人選，由中央局分局議定，經中央批准之。地委書記人選，由區黨委議定，經分局中央局批准之。為統一地方黨與軍隊黨的領導，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兼任軍區、分區（師或旅）政委，另設副書記，管理黨務工作。如軍區、分區政委被選為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則可設副政委，專管軍隊工作。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應照顧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體工作。如有個別特殊情況黨委書記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黨委書記時，須得上級黨委或中央批准。軍隊中軍政委員會及政治部，成為同級黨委（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的一個部門，與其他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等）有平等權利和義務，不隸屬其他部門或委員會，但與其他委員會和其他部門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級直接領導和隸屬關係。軍事政策（如擴兵建軍原則，政治工作等等）與軍事行動的大政方針（如反掃蕩的戰略戰役計劃及總結等），須交黨委會討論，但具體軍事行動由司令員政治委員（即黨委書記）決定之（司令員與政委對軍事行動之最後決定權依照政治工作條例），無限制的民主討論只會引導軍事行動的失敗。軍隊主要人員的任免，仍須經過軍事機關依照已定規則進行之。

(四) 主力軍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是建設根據地與支持鬥爭的有柱石。主力軍應以鞏固和堅持各所在根據地爲其第一等任務。主力軍固有全國性，但同時具有地方性。過去有些根據地領導不統一，主要的是由於該地主力軍某些領導同志對於該根據地之建立與堅持缺乏正確的統一的認識，因而其所實行的某些政策（如軍事建設中之地方武裝問題，擴兵問題，財政經濟政策問題中之統籌統支等）只注意了主力軍，而忽視了根據地整個工作的配合，因而與地方政府發生爭執。同時有些地區，黨政領導機關對於一切服從戰爭的認識不深刻，對主力軍之人員補充，糧食及物質保證，優抗及反逃亡鬥爭，未能盡到應有的責任，因而使軍隊與地方黨政間的關係不協調。今後爲了實現根據地領導一元化，除實現以黨委爲各地統一的黨的領導機關外，還必須糾正某些地方主力軍，某些地方黨政機關領導人思想上政策上的一些錯誤。實行中央關於根據地的各種政策，實行軍委關於軍事建設的幾號指示。今後主力軍必須執行各級黨委的決議、決定與各級政府的法令。主力軍對於駐紮所在地的下級黨委與下級政府（如縣區、鄉）的決定，亦必須執行。如有不同意處，可報告上級黨委與上級政府。並應當經常的彼此聯系，彼此幫助。主力軍的軍事措施，如軍事行動，佈置及戒嚴令等等，地方黨政機關必須遵照實行。主力軍應當負有保護黨政機關的責任，凡因軍隊之疏忽與漠不關心因而使黨政民

機關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時，軍隊負責人應當受到處分。今後，如有爭執，首先應當就地協同解決，並將爭論及解決經過報告上級，反對各個組織只是向上告狀，而不本地當面商談解決問題的辦法。

(五)政權系統(參議會及政府)是權力機關，他們的法令帶有強制的性質。黨委與政權系統的關係，必須明確規定。黨委包辦政權系統工作、黨政不分的現象與政權系統中黨員幹部不遵守黨委決定、違反黨紀的行爲，都必須糾正。爲了實行三三制，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辦。下級黨委無權改變或不執行上級參議會及政府的決定與法令，黨的機關及黨員應該成爲執行參議會及政府法令的模範。黨應進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參議會及政府的威信，黨的幹部與黨員違反參議會及政府法令時，黨的組織應給以嚴厲的處分。黨對參議會及政府工作的領導，只能經過自己的黨員和黨團，黨委及黨的機關無權直接命令參議會及政府機關。黨團必須服從同級黨委；但黨團的工作作風必須刷新，不是強制黨外人士服從，而是經過自己的說服與政治工作。在黨團萬一沒有說服參議會及政府的大多數因而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是假如黨團同志因爲自己的意見與同級黨委有分歧因而不堅決執行黨委的決定，這是黨團同志違反黨紀行爲，應

當受到指斥與處分。黨必須派遣得力的幹部到參議會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視政權工作，把幹部堆在黨的機關中的現象，必須糾正。在實行三三制時，黨員在政權系統中的數量減少，但在政權系統中工作的黨員質量必須大大提高。在政權系統中工作的黨員和幹部，必須服從黨委與黨團的決議、決定與紀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動。在這裏，應特別提出，黨對三三制政權之領導的實現，有賴於政權系統中黨員幹部之言論行動的一致及其對黨的決定的絕對服從，所以嚴整政權系統中黨員及黨員幹部的黨紀是有嚴重意義的。黨委在調動政權系統中的黨員時要慎重，還必須經過黨員實行向政權機關辭職的手續。政府軍隊的關係必須改善；軍隊中應進行擁護政府的教育；政府應保障軍隊的給養及運輸；軍隊的首長應被選為政府委員及參議員。軍隊應成為尊重政權執行法令的模範，軍人的違法行動，軍事機關必須嚴格處分。軍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員、參議員資格對參議會及政府發表意見外，一切軍人及軍事機關無權干涉參議會及政府的內部工作。但軍隊政治機關，必須盡可能的幫助政府工作。

(六) 民衆團體是民衆自己的自願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干涉民衆團體內部的生活。黨對民衆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但黨民不分、包辦、清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衆團體的各級委員會委員須儘可能有半數

以上的非黨員。民衆團體中的黨團問題與政府中黨團同。政府應尊重民衆團體的獨立性，給民衆團體以必要的幫助，要求民衆團體執行政府的法令。民衆團體應依法向政府請求登記，取得合法地位。如民衆團體違反政府法令時，政府可加以處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衆團體的生活與工作。民衆團體應號召民衆，擁護政府和軍隊、幫助抗戰動員工作。但民衆團體並非政權機關，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對人民執行逮捕、審訊、判決等事宜。軍隊與民衆團體應相互幫助，但不應相互干涉。

(七) 在游擊區因爲它的特殊性，領導的一元化不僅是在相互關係上應有所確定，而且在黨政軍民的機構上在必要時亦須一元化。黨委、政府、民衆團體的機關，可與軍隊指揮機關政治機關合併，黨政民幹部在軍隊或游擊隊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如正副軍事指揮員、政委及政治部各種工作），戰時參加軍隊與游擊隊工作，戰鬥空隙時則仍執行其原來的黨政民的職務（如黨委書記、縣長、工會主席）。

(八) 黨的領導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係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係上。在這裏，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於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在實行政策及編

度時，必須依照中央的指示。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標新立異，自作決定危害全黨領導的統一（凡帶地方性質的不違反上級及中央決定的不在此例）。下級黨政軍民組織對上級及中央之決議、決定、命令、指示，不堅決執行，陽奉陰違，或在解決新的原則問題及按其性質不應獨斷的問題時，不向上級和中央請示，都是黨性不純與破壞統一的表现。

在這裏，應當再一次的提醒各根據地黨政軍民領導同志的注意，各級黨委及政軍軍隊民衆團體中的黨員負責同志，不得中央許可，不得發表帶有全國意義和全黨全軍意義的宣言、談話及廣播，各級領導同志的文章應經過同級黨委或黨團適當人員的審閱。分局委員以上、師以上負責人的文章，凡帶有全國及全黨意義的，應事先將主要內容報告或電告中央。各地不應再直接對外廣播，應統一於延安新華社。應當深刻認識，一個黨的負責高級幹部，不經過同級或上級一定組織的同意，而擅自發表政見，是何等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何等妨礙黨的統一的惡劣行爲！

（九）爲統一根據地的領導，爲改進黨政軍民關係，必須在黨政軍民各系統黨員幹部中進行思想教育，整頓三風，肅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在幹部會議上，根據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教育幹部識大體，顧全局，號召幹部實行批評、自我批評，使幹部懂得全局，不陷於局部和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體與局部、

上級與下級、這一局部與那一局部間的正確關係。要加強黨政軍民各組織中的教育工作，使全體同志認識領導一元化及根據地革命秩序與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這裏，應特別警惕軍隊幹部：黨政軍民關係不協調，在一般情況之下，軍隊幹部應負較大的責任，軍隊手中有槍，容易獨斷獨行，輕視黨政，不守紀律，自由行動，破壞羣衆利益。因此，軍隊中軍政幹部必須特別約束部下，檢點自己。必須號召自己的部下，擁護黨的領導，擁護政府，堅決執行黨的決定與政府的法令。同時，又應糾正某些黨員和幹部中的不合事實的觀點，認為只有在黨委及黨的機關中工作才叫黨的工作，其實一切黨員和黨的幹部不管其執行的是政治工作、軍事工作、羣衆工作、經濟工作、技術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黨的工作，在黨的機關中的工作，只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黨務工作）。黨員服從黨的領導，是服從黨的路線、政策、決議、決定、指示與紀律，某些黨員空喊或曲解服從黨的領導，而對於黨的路線、政策、決議、決定、指示與紀律，則不認真研究，不認真執行，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十）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是爲了更順利的進行反對日寇的戰爭，『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要在全黨中說明，假若軍隊削弱，假若戰爭失敗，則根據地無法存在，黨政軍民都會場台。因此，黨委、政府、民衆團體

以及全體人民，都有鞏固軍隊、加強其戰鬥力的義務。軍隊的人員補充，糧食、服裝、彈藥的供給與運輸，營舍的讓予，傷病殘廢人員的輸送、看護與保養，抗日軍人家屬的優待等等，黨委及政府、民衆團體，都有隨時加以解決的責任，一切漠不關心的現象，都是極端錯誤的有害的。在軍隊本身，則應深深了解：沒有黨、政府、民衆團體的配合，光桿軍隊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戰的。因此，必須加強部隊中的教育，做到能愛惜根據地，愛惜人力物力，尊重黨政，加強軍紀，給黨政民以必要的幫助。軍隊的人員與物資補充、運輸、優抗等等，必須依照政府法令、規章去做；亂來一頓，只會損害抗戰，於軍隊本身也是不利的。

(十一) 各根據地領導機關根據本決定的原則，根據各地具體情況，製定與此有關的各種細則，以政府法令、軍隊條例、黨團規則、民衆團體章程等等方式規定之，以解決統一領導的許多具體問題。製定後須報告中央。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列寧曾教訓我們，不僅要教育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我們，領導者，不應當驕傲，而應當了解，我們雖然是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已具有爲實行正確領導所必要的一切知識。職位本身並不能給予知識和經驗，稱號就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說，只靠我們自己的經驗，只靠領導者的經驗，還不足以實行正確的領導。因此，還必須用羣衆的經驗，用黨員羣衆的經驗，用工人階級的經驗，用人民的經驗，來補充自己的經驗，領導者的經驗。

這就是說，一刻也不可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系，更不必說隔斷我們與羣衆的聯系了。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仔細傾聽羣衆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平常黨員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所謂『小人物』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人民的意見。

什麼叫做正確的領導呢？

這絕對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

正確領導，——這就是說：

第一、必須正確決定問題，而爲要正確決定問題，就非估計到羣衆所有的經驗不可，羣衆是親身經受到我們的領導的結果的。

第二、必須組織正確決定的執行。而爲要組織這種執行，也是非有羣衆的直接幫助不可。

第三、必須組織對於這種決定的執行情形之審查。而爲要組織這個審查，也是非有羣衆的直接幫助不可。

我們，領導者，只有從一方面，我可以說，只是從上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因此我們的視野，是有多少是受限制的。反之，羣衆却是從另一方面，我可以說，是從下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因此他們的視野，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制的。爲要得到問題的正确解決，就必須把這兩方面的經驗結合起來。只有在這種情形下領導才會是正確的。

……在什麼時候才能做到這一步呢？

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就是要領導者與羣衆有極密切的聯

系，要領導者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知識分子有極密切的聯系。

與羣衆發生聯系，鞏固這種聯系，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的意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力量所在及其必勝不敗的原因。

只要布爾塞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羣衆的聯系，那他們將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系，——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論黨工作的缺點和消滅兩面分子的辦法』）

中央委員會在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是以列寧天才的思想爲領導的：即在組織工作中主要的是挑選人員和審查執行情形。

關於挑選人員和調換那些不勝任的人員這一部分事情，我要說幾句話。

除了撤銷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交際主義者，對於這件事情我們沒有任何分歧的意見之外，我們還有兩類工作人員，這兩類工作人員阻礙我們的工作，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第一類工作人員，這種人過去有相當的功績，這種人已成爲功臣，他們以爲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並不是爲他們而寫的，而是爲那些壞子們而寫的。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並不認爲執行黨和政府決議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樣，他們就破壞黨

和國家的紀律基礎。他們敢於破壞了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他們所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希望着，以爲蘇維埃政權，因他們過去的功績而不敢去驚動他們。這些自負的功臣們，認爲他們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們是可以不受處分地破壞領導機關的決定。對於這種工作人員怎麼辦呢？應當毫不猶豫地從領導位置撤掉他們，不顧他們過去的功績。（喊聲：『對呀！』）。應當調動他們，降低他們的職位，並把這件事情在報紙上公佈。（喊聲：『對呀！』）。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打下這些自負的功臣官僚底傲慢習氣，並把他們安頓在應得的位置上。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在我們整個工作中鞏固黨和蘇維埃的紀律。（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講到第二類工作人員。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些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這些人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是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什麼事情。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是很可尊敬的一個同志，但是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他能够把任何一件生動活潑的事情，淹沒在空談中去。請看這篇談話：

我問：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呢？

他答：關於播種的事情嗎？斯大林同志，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又怎麼辦呢？

他答：我們曾經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笑聲）

我問：那末，後來又怎麼樣呢？

他答：我們的工作有轉變，斯大林同志，很快就會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答：在我們那裏有着進步。（笑聲）。

我問：可是，究竟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

他答：我們那裏的播種事情，暫時毫無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大笑）。這就是說空話的人底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步，而事情終究還是停頓着。

不久以前，一個烏克蘭的工人所說過的那個組織底狀況，也與上面的情形一模一樣，有人問這個工人在這個組織中是否有路線，他回答說：『怎麼，路線……：路線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全場大笑）。很明顯的，這個組織也有自己的誠懇的說空話的人。

當撤換這種說空話人底職位，派他們遠離指揮工作的時候，他們便擺開兩手而帶着驚奇的神氣說道：『爲什麼撤銷我們？難道我們沒有做了對於事情所必須的一

即事情，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底集會，難道我們在突擊隊員底代表會議上沒有宣佈黨和政府底口號，難道我們沒有選舉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斯大林同志送祝詞，——你們還要我們做什麼事情呢？」（全場大笑）。

怎樣對付這些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呢？如果把他們留在指揮工作上面，他們能够把任何一件生動活潑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的說話底洪水裏面。很明顯的，應當把他們從領導的地位上撤銷，叫他們去做其他的不是指揮的工作，說空話的人是沒有做指揮工作的資格的。（喊聲：「對呀！」鼓掌）。

……說到加緊審查執行情形方面的將來的的工作，那末，關於這一點我要說幾句話。

正確組織執行情形底審查這件事情，在與官僚主義及文牘主義作鬥爭的事業上，具有決定的意義。領導機關底決議是否執行，或者被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置諸高閣？這些決議是否正確執行或者被人曲解？機關是否誠懇地並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工作，或者是在那裏空轉？——關於這一切，只有好好地審查了執行情形以後，才能及時知道。好好地審查執行情形——這是這樣的探照燈，它幫助我們隨時查明機關工作底狀況並揭露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底原形。可以確信地說：十

分之九的失敗和破綻，是由於沒有正確組織執行情形底審查工作。無疑義的，如果有了這樣一種執行情形底審查，那末，失敗和破綻就一定事先被防止了。

但是，要使執行情形底審查達到目的，至少必須兩個條件：第一，要使執行情形底審查是有系統的，而不是偶然的；第二，要使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各組織底一切環節中領導審查執行情形的人，不是次要的人物，而是十分有威信的人，——本組織裏的領導者自己。（在『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審查工作人員，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是什麼意思呢？

審查工作人員，這就是說，不是以工作人員的允諾和豪言爲標準，而是以他們的工作結果爲標準來審查他們。

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就是說，不僅是在辦公室，不僅是按形式上的工作報告來審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地方，按執行的實際結果來審查。

一般地，是否需要這樣的審查呢？無條件地，是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爲只有這樣的審查，才可以透澈無遺地認識工作人員，查明他們的真正品質。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爲只有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執行機關的優點和缺點。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爲只有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的優點和缺點。

有些同志認為，對於工作人員的審查，只可以從上而下來實行，就是領導者根據被領導者的工作結果來審查被領導者。這是不對的。從上而下來審查，當然是需要的，因為這是審查工作人員及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的有效辦法之一。可是，從上而下的審查，還不能包括整個審查工作。還有另外一種審查方法，即從下而上的審查，就是說，由羣衆，由被領導者來審查領導者，指出他們的錯誤，並指明改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這種審查，乃是審查人員的最有效辦法之一。

黨員羣衆，在積極分子會上，在代表會議上，在代表大會上，審查自己的領導者，其方法就是聽他們的工作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最後，選舉或不選舉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爲領導機關的人員。我們黨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之在黨內確切執行；黨機關之無條件地以選舉手續產生；提出候選人以及取消候選人資格的權利；不公開的投票法；批評和自我批評之自由，——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必須確切實行，其目的之一就是使黨員羣衆易於審查和監督黨領導者。

非黨員的羣衆，在非黨員的積極分子會上，在各種各樣的羣衆會議上，審查自己的經濟工作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的領導者，這些羣衆；在這些會議上聽自己的這些領導者之工作報告，批評缺點，並指出改正這些缺點之辦法。

最後，人民，在選舉蘇聯的政權機關的時候，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

公開的選舉辦法，來審查自己的國家領導者。

任務就在於從上而下的審查和從下而上的審查結合起來。（『論黨工作缺點和消滅兩面分子的辦法』）

季米特洛夫論

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同志們！如果沒有善於執行決議的人們，那末，我們的最好的決議都會成爲紙空文。然而我不得不指出，可惜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幹部問題，在我們的大會上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討論了七天；各國許多代表，都講了話，但是只有幾個人才順便講到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底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黨在自己的實踐中還遠沒有體會到：人——幹部決定事業。他們不會像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那樣，培養幹部『如同園丁培植心愛的菓樹一樣』，不會『器重人，器重幹部，器重每一個有益於我們的共同事業的工作者』。

在鬥爭中我們不斷地損失一部分最寶貴的幹部，所以，對幹部問題的輕視態度尤其是不可容許的。因為我們不是一個科學研究會，而是一種戰鬥運動，這個運動是經常在火線上。我們的最精幹的，最英勇的和最覺悟的分子總是站在第一線上。敵人所摧殘的，正是他們，正是這些先進分子。敵人殘殺他們，把他們囚在監獄裏、集中營裏、嚴刑拷打他們，尤其是在法西斯國家裏。因此，這就有特別必要經常補充、培植與教育新的幹部和盡力保存現有的幹部。

幹部問題之所以具有特別尖銳性，還因為在我們影響之下，發展着統一戰線的羣衆運動，這個運動產生出成千累萬的新的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在這種情形下加入我們黨底隊伍的，不僅有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運動的、青年的革命分子、正在革命化的工人，而且常有過去的社會民主黨員和積極分子，也走到我們這裏來。這些新幹部要求對他們特別注意，尤其在秘密黨裏，特別是這些理論修養差的幹部，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已經常常遇到他們自己應當解決的、極嚴重的政治問題。

正確的幹部政策問題，對於我們黨，同樣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對於一切羣衆組織，對於整個革命工人運動，都是最迫切的問題。

什麼是正確的幹部政策呢？

第一，必須熟悉人。在我們黨裏，照例是沒有有系統的研究幹部，只是近來，

法國共產黨和波蘭共產黨，以及在東方——中國共產黨，才在這方面達到某些成績。德國共產黨，在轉入秘密狀況以前，也曾着手研究自己的幹部。這些黨的經驗告訴我們：一開始研究人，就會發現以前所沒有看出來的工作人員，而在另一方面，黨就開始清除異己分子與思想上和政治上有害的分子。只要指出法國謝勞拉和巴爾伯兩人的例子就夠了，這兩個人一放在布爾塞維克的顯微鏡下，就發現了是階級敵人的奸細，並且被驅逐出黨了。在波蘭及匈牙利，審查幹部幫助了發現奸細的巢穴——竭力隱藏的敵人奸細。

第二，必須正確地提拔幹部。提拔幹部，不應當是偶然的事情，而應當成爲黨的經常職務之一。如果提拔幹部僅僅只從狹隘的黨的考慮上來進行，而不顧到之被提拔的共產黨員與羣衆有沒有聯系，這是不好的。提拔幹部應當顧到被提拔的人對於執行黨的某種職務是否適當，被提拔的幹部在羣衆中是否有聲望。在我們黨裏，有過成致卓著的提拔的例子。例如，在我們大會的主席團裏坐着西班牙的女共產黨員多洛列斯同志。兩年以前她還在下層工作。在與階級敵人初次搏鬥中，她就表現自己是一個很好的鼓動家和戰士。後來她被提拔到黨的領導機關中去，這便表現了自己是一個最稱職的領導人。（鼓掌）

在其他幾個國家中，我也能夠指出這一類的例子。

但是，在多數的場合中，提拔是無組織的，偶然的，因此也不是時常都是成功的。有時候，甚至於提拔清談家、牛皮家、空談家，簡直害事的人，去做領導者。

第三，必須善於使用幹部。要善於找到和使用每個積極分子底寶貴的長處。理想的人，是沒有的；應當使用現有的人，在使用中改正他們的弱點和缺點。理道——在我們黨裏，有許多不正確地使用優秀的、忠實的共產黨員的顯著例子；如果使用這些人去做更適宜於他們的工作，那末，他們是能夠貢獻很大的益處。

第四，必須正確地配置幹部。首先應當使得在運動底基本環節裏有堅強的、與羣衆聯系着的、由羣衆內部產生出來的、有創造精神的和意志堅定的人；應當使得在最大的中心地區，有相當數量的這類積極分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把幹部由一個地方調到別一個地方，是很不容易的事。在這裏這一任務遇到許多阻礙和困難，如經濟困難，家庭關係等等——這些困難是應該顧到和設法克服的，可是，我們却常常完全沒有管它們。

第五，必須有系統地幫助幹部。這個幫助應當是對幹部的細密教導、同志態度的監督，糾正缺點和錯誤，以及具體的日常的領導。

第六，必須關心保存幹部。如果情況需要時，必須善於及時地把幹部調到後方去，以新幹部去代替他們。我們應當要求領導機關極端負責地保存幹部，尤其是在

秘密黨裏（鼓掌）。正確地保存幹部，還要求最嚴格地建立黨的秘密工作。在某些我們的黨裏，許多同志以為黨既然已經按照死板公式，在形式上改造了，就算是已經準備好轉入秘密狀態了。由於真正的改造，只是在轉入秘密狀態以後，在敵人的直接嚴重打擊之下，才開始進行，因此我們不得不付出高的代價。請你們回憶，德國共產黨之轉入秘密狀態，是支付了怎樣高的代價！對於今天還是合法存在，而明天也許會喪失合法性的我們的黨，這個經驗應當是最嚴重的殷鑑。

只有正確的幹部政策，才給予我們黨以可能最大限度地開展和利用現有幹部的力量，並由羣衆運動底廣大後備軍中，吸取經常是新穎的和優秀的積極分子。

我們應當根據什麼基本標誌來挑選幹部呢？

第一，對工人階級事業底無限的忠心，對黨的忠誠，這忠誠是在戰鬥中、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在階級敵人面前考驗過的。

第二，與羣衆有最密切的聯系——要以羣衆底利益爲生活，要深知羣衆生活的脈搏，他們的情緒和需求。我們黨的組織底領導者之威信，首先就應當建築在這樣的基礎上，就是羣衆把他們當作自己的領袖，羣衆在自己的經驗中深信他們有充當領導者的能力，深信他們在鬥爭中有無限決心和自我犧牲精神。

第三，善於獨立地在環境中識別方向，並不怕爲決定而負責。誰要是怕負責

任，誰就不是領導者。誰不善於表現創造精神，誰設想——「我只執行別人告訴我做的事情」，誰就不是布爾塞維克。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這種人在失敗的時候，不張皇失措，在勝利的時候，不驕傲自誇，在實行決議的時候，表現百折不回的堅決性。當幹部臨到必須獨立解決鬥爭底具體任務時，並且覺着自己對這件事情負完全責任時，他就最容易發展，最容易長進。

第四，在反對黨級敵人的鬥爭中，同樣在不可調和地對待一切離開布爾塞維克主義路線的傾向上的紀律性和布爾塞維克的鍛鍊。

同志們！我們之所以特別着重指出正確挑選幹部底這些條件之必要，因為在我們的實踐中，往往在黨報中，譬如，寫得好，說得漂亮，而不會做事情，不適合於鬥爭的人，却不願意對這件一些同志，這些同志也許不大會寫，不大會說，可是，却有堅定的意志，倒置的精神，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系，善於進行鬥爭，而且還善於引導別人去鬥爭。（鼓掌）。黨門主義者，教條主義者，清談主義者，把忠實的羣衆首領、真正工人的領袖，排擠掉的事實難道還少嗎？

我們的領導幹部，應當把他們所應該做什麼的知識，與布爾塞維克的沉着性，革命的品質及實施這種工作的意志相結合起來。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是做事業的人。在我們面前擺着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實際鬥爭任務。正是這個實際鬥爭任務向共產黨的幹部提出要求：必須用革命理論武裝起來，因為正好像斯大林同志——這位革命事業底最偉大的技師，教導我們的一樣，理論給實際工作者以識別方向的力量，明顯的前途，工作中的信心，對我們事業勝利的信念。

但是真正的革命理論，對於一切空洞的玩弄理論，華而不實的玩弄抽象定義的遊戲，是水火不相容的。列寧屢次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領導。我們的幹部之需要這種理論，正好像需要每天的糧食、空氣和水一樣。

誰願意真正消滅工作中的死板的公式主義、有害的咬文嚼字，他便應該以燒紅的鐵來燒盡這些東西——他便應該，既要與羣衆一起和站在羣衆面前來進行實際的行動的鬥爭，又要以不知倦怠的工作去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底强有力的、效用無窮的、萬能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理論。（鼓掌）

說到這裏，我認爲必須特別使你們注意我們的黨校工作。我們的學校所應培養的，並不是書獃子、清談家和引證專家。不是的！由黨校出來的，應當是爲無產階級事業而鬥爭的實際的先進戰士。先進戰士之所以先進，不僅是由於他們勇敢和有

自我犧牲的決心，而且是由於他們比普通工人看得更遠，比普通工人更清楚勞動者的解放道路。共產國際一切支部，不應當遷延耽擱，而應該立刻認真辦理黨校，以便把黨校變為鍛鍊這種幹部——這種戰士的熔爐。

我以為我們黨校的基本任務就在於：教導在校的黨員和青年團員，使他們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應用到該國的具體環境中去，應用到當前條件中去，應用到反對當前具體敵人而不是反對「一般的」敵人的鬥爭上去。爲着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須研究的，並不是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列寧主義的生動的革命的清神。

在我們黨校中，可能有兩種方法來培養幹部。

第一種方法，用抽象的理論來培養人，盡力給他們灌輸一大堆乾燥知識，教他們用美麗詞藻起草提綱和決議，而對該國的問題，該國工人運動，工人運動的歷史等問題，以及該國共產黨的傳統與經驗，僅僅只是順便涉及，僅僅只是順便涉及！

第二種方法，是這樣的一種理論學習，即使學生們在實際研究本國無產階級鬥爭底根本問題的基礎上，去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以便他們重新回到實際工作中去的時候，能夠獨立地識別環境，能夠成爲獨立的實際組織者，領導

者，有能力引導羣衆去作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

並不是所有從我們黨校裏出來的學生都是有用的。很多空洞詞句，抽象觀念，書本氣味，皮毛知識。而我們所需要的，却是實在的、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組織者和領導者。我們今天最迫切須要這一種人材，就算這種學生不能起草好的提綱（雖然我們也很需要能起草好的提綱的人），但是他應當會組織和領導，不怕困難，會克服困難。

革命的理論，這就是革命運動之綜合的、總結起來的經驗；共產黨員在自己的國家中更應當仔細運用的，不僅是國際工人運動其他隊伍之以往的經驗，而且是目前鬥爭的經驗。然而正確地運用經驗，這絕不是說機械地把現成的鬥爭形式和方法從一種條件中搬到別一種條件中去，由一個國家裏搬到別一個國家中去，但這種機械搬運，在我們黨裏是常有的事。在資本主義統治着的國家裏，甚至就是機械模仿，簡單抄襲蘇聯共產黨底工作形式和方法，也會違背一切善良的願望無益而有害於事，這在實際中已經數見不鮮的了。正是根據俄國布爾塞維克的經驗，我們應學習在反對資本的鬥爭中來把統一的國際路線生動地與具體地適應於每個國家的特點中去，我們應當學習毫不留情地排斥、鄙棄和普遍的譏笑那說空話，拘守成規，咬文嚼字以及教條主義。

同志們！應當學習，應當經常學習，在每一步上，在鬥爭過程中，在自由時和在監獄裏，都要學習。學習和鬥爭——鬥爭和學習。應該善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偉大學說和在工作與鬥爭中的斯大林底堅定性結合起來，與對階級敵人和對離開布爾塞維克主義路線的分子的斯大林底原則的不可調和性結合起來，與在困難面前的斯大林底大無畏精神與斯大林底革命現實主義結合起來。（大鼓掌）（在共產黨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上的結論，見『季米特洛夫文選』第一三三——一四五頁）。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寫的文章，登在邊區「黨的工作」報上。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與革命團體的團結使之利於作戰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與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與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及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發生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與親熱，或輕描淡寫的說一頓，不作澈底解決，保存一團和氣。結果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積極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主義。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藉口幹部政策，不願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爲了團結，爲了進步，爲了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洩私憤，圍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若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六種。

見羣衆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羣衆利益的行爲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

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第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他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羣衆發生隔離，是一種嚴格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自己是自由主義，二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論。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

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為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胸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犧牲個人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與羣衆的聯系，關心黨與羣衆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傾向，把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向。這是思想戰綫的任務之一。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

這是劉少奇同志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爲每個同志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時期，特爲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讀。

一 引言

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黨內提出了加強黨員黨性鍛鍊的問題。聽說中央也通過了加強黨性鍛鍊的決定，不久我們就可以收到。爲了加強我們黨員的黨性鍛鍊，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鬥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來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就算正確，又怎樣開展就算不正確呢？這便是現在我所要講

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個領導廣大羣衆戰鬥的黨。黨爲了要實現自己所負擔的歷史任務，便要和各種時期的革命的敵人鬥爭，便要和各種不同的革命的階層與階級聯合。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沒有一刻鐘不是處在嚴重的戰鬥環境中。黨與無產階級是經常處在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封建殘餘勢力的包圍之中。這些其他各種階級，便在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或在同無產階級的聯合中，經過黨與無產階級內部不穩定的成份，侵入到黨與無產階級的內心來，在思想意識上，在生活習慣上，在理論上，在行動上，經常影響黨與無產階級。這就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這就是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這也就是黨內鬥爭的來源。

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

我們的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黨外的敵人進行鬥爭，並且也同黨內的各種敵人的及非無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鬥爭。這兩種鬥爭是有區別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階級實質上是共同的。如果我們黨不進行這後一種鬥爭，不經常在黨內進行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鬥爭，不經常在黨內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克服「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那末，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

就會在黨內發展，就要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就要使黨不能鞏固發展，就要使黨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就要危害黨，使黨腐敗下去。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可能腐蝕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使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分起質的變化，變為非無產階級的組織。比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因為這樣而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所腐化，就是因為這樣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式的政黨，成為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支柱。所以這種黨內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也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圖避免黨內鬥爭的想法，那些不願批評別人錯誤以便換得別人也不批評自己錯誤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這種黨內鬥爭，主要的是思想鬥爭，它的內容是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在黨內，由於同志間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雖然可以發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種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的發展到黨內組織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一種思想鬥爭。所以沒有思想原則分歧的黨內鬥爭，同志間沒有原則分歧的相互傾軋，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無內容的鬥爭。這種無原則無內容的鬥爭，在黨內是完全不必要的，對黨是有害無益的，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切實避免的。

黨內鬥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經常在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路線上進行，保持黨之無產階級的實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爲了這個目的，黨內

鬥爭還必須在兩方面來進行，必須是在兩條戰綫上來進行。因為敵人的思想是從兩方面來影響黨的，是從右面或者從『左』面來進攻黨的，是在黨內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的。因此，我們的黨內鬥爭，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必須向這兩方面鬥爭，才能保持我黨的無產階級的一定的實質。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只進行單方面的鬥爭，如果我們疏忽對任何一方面的警戒與鬥爭，那敵人就可以、而且一定從我們疏忽的一方面來進攻黨，那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不能鞏固黨。所以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綫的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說：

『只有為擁護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為了確立這一個或那一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為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綫，都是無濟於事的。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綫，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為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提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

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且日趨於腐化的政黨之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成爲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又說：

『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這就是黨內鬥爭的必要性。

關於黨內鬥爭的這種必要性，關於黨內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寧、斯大林著作中說得很多，同志們可以去看，我在這裏不多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問題，是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新的問題。現在大家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不想全盤的來說明這個問題，而只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就我個人所觀察到的，來提出我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還請同志們大家來討論。

二 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中的偏向

同志們！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無產階級做好了什麼工作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替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理論上準備好了鞏固的完整無缺的體系。不僅如此，他們還替無產階級建立了獨立的組織，領導了無產階級的羣衆鬥爭，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在以後又組織了第二國際及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他們教育了並且指導了工人階級怎樣組織起來，怎樣進行鬥爭……。

在第二國際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代），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是進行了廣大的組織工作，廣泛的開展了組織工人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是獲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當時是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組織也是在這種和平時期建立起來的，黨與工會之間的區別還不很明確。特別從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後，第二國際在考茨基輩領導之下，對黨內機會主義採取不可允許的調和路線，以致機會主義腐蝕了第二國際各國黨。這種黨與工會，一到帝國主義時代，一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顯出它不能負擔無產階級在新時期中所應該擔負的革命的任務，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不能不走到破產與沒落。

列寧的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快要

死亡的時代，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時代要求無產階級建立堅強的、戰鬥的政黨，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完全鞏固和統一的，並和無產階級羣衆有密切聯系的政黨，依靠這樣的黨，才能勝利的去進行極端嚴重的革命鬥爭。因此，列寧除在各方面恢復與發展了馬、恩的學說而外，還特別創立了一個完備的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學說。關於我們黨的建設的學說體系，基本上是列寧創立的。這個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策略完全不可分離的。

列寧創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時期的條件是怎樣呢？

在當時，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大戰的迫近，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擁有廣大組織的第二國際下的各國社會民主黨，還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還不願意也不敢去準備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因此，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別分歧的，不能進行稍爲嚴重的戰鬥，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適合當時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要求。當時各國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理論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如勞資合作的理論，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可以經過議會鬥爭掌握政權、不必經過革命，因而不能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策略等等），而

且在黨的組織問題上，也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及俄國的少數黨，主張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的水平，主張黨內不要嚴密的組織與嚴格的紀律，主張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容許黨內的派別（具有不同思想和組織系統的派別）存在等，對於第二國際各國黨來說，黨的統一與紀律，黨內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這便是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些主要的具體表現。

當在時，還有俄國的經濟主義派，歐洲（如法國）的工團主義派等，他們主張工人階級不要有政黨的組織，拒絕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或把工人階級的政黨附屬在職工會之下，主張『工會獨立』，否認黨對於工會的領導作用……

在當時，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任務擺在面前，要求有一個堅強的戰鬥的黨去領導廣大羣衆，執行這種任務；另一方面，擁有數百萬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又是那樣的不成，那樣的不能戰鬥，而且有組織上的各種機會主義思想支持着這種組織上的落後與散漫。這便是列寧建設布爾塞維克黨的時期之具體的重要條件。

列寧在上述這種條件下，爲了建設一個能够勝任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與鞏固的政黨，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對第二國

際各國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尤其不能不反對他們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初與孟塞維克的分歧，就是在組織問題——入黨條件問題上的分歧。列寧的布爾塞維克的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是在反對經濟主義派、工團主義派不要工人政黨的理論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所以在列寧的黨的建設的學說上，就充滿了反對各種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充滿了反對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的理論，反對把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理論，反對黨內的無原則的和平，反對黨內的派別組織與派別活動等。列寧並在反對這些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確定了：黨是無產階級中最覺悟、最勇敢、最進步的分子組織起來的最先進的部隊，最有組織的部隊，最有紀律的部隊，而且是最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為無產階級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有職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團體以至政府、軍隊等等的組織，然而黨是無產階級這一切組織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導其他一切的組織。因此，列寧就把黨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明確的區別開來了。列寧並且確定了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有統一的組織的紀律。這些黨的組織原則，是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這些，就是列寧關於黨的建設學說之主要內容。

列寧主要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的。而主要不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這種情況，在十月革命以前，確是如此。當時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或者還沒有發展成爲系統的機會主義，所以在列寧關於黨的建設的學說中，充滿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即是充滿了反對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反對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反對不要黨內的思想鬥爭及害怕自我批評，反對黨內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反對工會獨立主義等。這是由於列寧建設黨的時期之具體條件中產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具體條件，那就和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時候的條件完全不相同。

第一、中國黨的建設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是在俄國布爾塞維克已經取得勝利，有了活的榜樣以後，所以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照着列寧的原則去進行建設。

第二、中國黨從開始到現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影響。

第三、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容許工人階級和平的議會鬥爭，也沒有歐洲那樣的工人貴族階層。

第四、在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成份佔着相當大的比重，並有若干游民成份，這是中國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由於前面四個條件，就使我們中國黨的建設，一開始在主觀上就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和道路進行的。布爾塞維克黨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多數的黨員中就能背誦出來。而社會民主黨的那些傳統與習慣，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因此，就使我們走了許多直路。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鬥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的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認為不要自我批評，不要黨內鬥爭，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不要工人政黨及工會獨立等等主張，在黨內是不能公開發展的。雖則我們黨內的思想鬥爭是還有不夠的地方，但那還是由於理論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則上的分歧，或者是被黨內個別負責人採用非常辦法壓制自我批評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黨內有什麼系統的反對黨內鬥爭的理論。

但是建立我們中國黨的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况，是發生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在主觀上嚴格的遵循着列寧的原則，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伴隨着，因

此使我黨進步得很快，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的鬥下去，走到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

許多同志是機械的錯誤的了解列寧的原則，把列寧的原則絕對化。他們認為：黨在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黨內的民主；黨內鬥爭的必要，就否定了黨內和平；黨為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領導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就否定了工會及其他工人的與勞苦羣衆的組織之獨立性；統一的鐵的紀律，就消滅了黨員個人的個性及黨員的自動性與創造性……。

許多同志是死記着列寧的原則，認為黨內鬥爭是必要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是要不得的。但他們是機械的死板的運用這些原則，他們以為在黨內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不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應該而且必須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而且是鬥爭得愈兇愈好。黨內鬥爭的方式，黨內批評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間在黨內的對抗，愈尖銳就愈好。不然，就會要犯自由主義、調和主義的錯誤。爲了要證明自己沒有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並證明自己是一個一十足的布爾塞維克』起見，他們就離開時間空間的具體條件，在黨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如

是，這些人也就成爲黨內鬥爭中沒有立場的「打手」，無原則的「鬥爭家」，嗜好鬥爭的「鬥毆家」，爲鬥爭而鬥爭。這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的醜事，這當然不能證明他們是「十足的布爾塞維克」，而只能證明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侮辱，並把布爾塞維克的名詞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

許多同志不了解：黨內鬥爭是原則的鬥爭，是爲擁護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確立這一個或那一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他們不懂得：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他們不懂得與不了解：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確立鬥爭目標的問題上，在選擇達此目標的鬥爭方式的問題上，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而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只要這些問題不涉及原則上的分歧，就不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實行不調和的鬥爭，而應該做一切的妥協。這些正是列寧、斯大林的黨所固有的作風，但是沒有被我們許多同志學到。他們在這些應做一切妥協的問題上，也實行不妥協的鬥爭，於是他們就沒有不對抗的問題，沒有不對抗的時候，沒有不對抗的人。一切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他們都要實行對抗，強使其絕對的相同，他們是一切都不妥協，絕對不妥協。他們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對抗，

對抗是一切，這就是他們的絕對主義。

許多同志不了解，什麼是原則，什麼是屬於原則的問題，什麼是黨的策略計劃與策略路線，並抓住這些原則問題，這些關於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問題上的分歧，來進行鬥爭。他們的理論水平與政治經驗，還是格外的低下，他們還抓不到這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並爲了這些問題來進行爭論。然而他們又死死記得在黨內是要鬥爭的，不鬥爭是不對的。他們雖抓不到這些重大問題，不能從原則上去提出問題，可是他們還是要鬥爭的。於是他們就只能抓住個別的現象，個別的問題，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來實行無內容、無原則的鬥爭與爭論了，並因此而造成同志間的不團結，互相對抗，及組織上的分歧。這種黨內鬥爭中的惡劣現象，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

上述這些，是中國黨內鬥爭中的一種偏向，是在中國黨內特別嚴重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偏向，是黨內鬥爭進行得過火、進行得毫無限制，走到另一個極端——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定原則上一致的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的相對的獨立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其自動性、創造性等）。這是由於中國黨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產生的。

在這裏，還要說到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鬥爭沒有被中國黨的許多同志所注意這一種事實。十月革命後，俄國黨內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的一派，他們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在以後又有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十月革命以前，在布爾塞維克內部雖也有過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召回派一派，但不久即被克服，不如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左』派共產主義的嚴重。俄國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寧克服了。但在西歐各國又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他們提出『不做任何妥協』的口號，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合法鬥爭，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左翼進行必要的聯合。在這種情形下，列寧就在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寫了『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一書，以糾正這種傾向。因為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從前不相信無產階級可以奪取政權的，現在有了活的事實，給了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就在這種情形下產生了『左』傾機會主義，以為革命可以不經過任何迂迴道路，一個早晨就可以勝利。這種情緒，中國黨內正是發生過，在某些時期內並且佔了統治的地位。犯這種錯誤的人們完全不注意列寧論左派幼稚病一書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對迂迴，反對等待，提倡少數先鋒隊可以不顧廣大羣衆還沒有跟得上來的事實，就實行冒險的進攻，反而罵其他的人爲『右傾機會主義』。一切組織上右傾或『左』傾的機會主義，都是從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而來的。中國黨內既在某些時期犯過政治上右

傾或「左」傾的錯誤，於是也就在組織上犯了這種錯誤。而特別是在內戰時期犯過冒險的「左」傾錯誤，於是在組織上的過火的黨內鬥爭就產生了。

因此，在中國黨內鬥爭問題上，如果可以這樣來分的話，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種傾向：第一是黨內的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第二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黨的組織上及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第三是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鬥爭。

以上三種偏向，在本質上說來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因為黨內無原則的糾紛和鬥爭及黨內的過火鬥爭與自由主義都不是馬列主義，都是反馬列主義的表現形態，上述三種傾向是僅就其形式來分的。

這就是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中的偏向。

三 機械過火的黨內鬥爭之表現

同志們！在上述三種黨內鬥爭的偏向中，第一種自由主義的偏向，我今天不準備來講。雖然我並不是認為目前黨內自由主義的偏向不嚴重，目前反對自由主義不重要，我也還不能相信同志們對於自由主義這一種傾向及其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表現，是已經澈底弄清楚了。我想許多同志是還沒有澈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準備講它，下次有機會時再講。我只提出黨內自由主義傾向在最近是有些發展，在許

多地方已經成爲黨內鬥爭中一種主要的傾向，黨內思想鬥爭是開展得不够。因此，就使得黨內許多錯誤的傾向，不良的現象，不能及時得到有力的糾正，黨的紀律也逐漸的鬆懈起來，還是很不好的。這是由於最近有大批的知識分子及新黨員加入到黨內來，他們是帶有濃厚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到黨內來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還沒有受到無產階級紀律的鍛鍊；同時，過去犯過「左」傾錯誤及黨內過火鬥爭錯誤的許多同志，在今天他們又反轉過來犯右傾錯誤，犯自由主義錯誤。長期統一戰綫的環境，資產階級影響黨內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則用一切方法發展與擁護黨內的自由主義。因此，就使得黨內自由主義的傾向發展起來。這是我們在加強黨性鍛鍊的鬥爭中必須嚴格反對的一種傾向。比如有些同志看見別人犯錯誤不說，怕人報復；好朋友犯錯誤不說，相互隱瞞；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隨便批評、發牢騷、小廣播等……這些現象，在黨內是相當普遍存在的。還有特別嚴重的一種現象，最近也在黨內產生，就是有一種人，生怕別人向黨內上級報告他們的缺點與錯誤，怕人告狀。一方面，他們不能禁止自己不犯已經知道的錯誤，他們要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禁止別的黨員向黨向上級報告及在會議上批評他們。他們做了一些錯誤的不正當的事情，犯了錯誤，但他們不肯將錯誤揭露，以便改正他們的錯誤及缺點。他們諱病忌醫，他們不知道只有

將錯誤揭露才能改正錯誤的真理，他們要隱蔽錯誤，把錯誤當作比什麼寶貝還要珍貴的隱藏起來，於是他們就不只是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眼睛不敢正視他們的錯誤，他們還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嘴巴不敢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錯誤，取消別人以完全正當的組織方式在黨內說話與批評的權利。他們恐嚇其他的同志說：『你敢於向上面報告，那我就會對你不起的！我要揍你的！揍你這個喜歡向上面拍馬屁溜句子的東西！』痛恨那些向上面報告及講過他們錯誤的同志，而永記在心，並要想辦法報復。這種現象是完全失了黨員氣味的惡劣表現。他們要隔離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員羣衆的聯系，以便他們能够在黨內爲非作惡。這種現象是應嚴格禁止的。

任何黨員看見其他黨員犯錯誤或其他一切不利於黨的事情，必須向黨向上級報告，不報告是不對的，報告是完全對的。禁止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自己的缺點錯誤，是完全非法的，黨內是絕不容許的。當然黨的領導機關在得到這種報告後，應調查清楚事實，審慎處理，而不能單憑一而之辭，輕率的隨便的處理。

目前黨內的思想鬥爭應該適當的開展，這是我們已經決定了的。因此，應該反對自由主義。在某些黨的環節，犯自由主義錯誤特別嚴重的地方，應該根據事實，開展反對自由主義的具體鬥爭，克服這種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幾年前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舉出了黨內十一種自由主義的現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你們應

細心研究，並遵從這篇文章來糾正與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同時，在我們黨的建設的課程上，也會要詳細講到自由主義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它。我現在只來講第二第三種偏向；因為這兩種偏向是從來沒有人在黨內系統講過的。

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鬥爭，表現在一些什麼地方呢？表現在以下的一些事實上：

第一，在地方黨及部隊黨內，經常舉行所謂『鬥爭會』，甚至在政府機關及羣衆團體等非黨組織中也經常舉行這種『鬥爭會』。這種『鬥爭會』是預先佈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爲了檢討工作，而是要打整某某人，不是首先『對事』而是首先『對人』鬥爭，主要的不是向某種不正確的思想 and 原則進行鬥爭，而是向某人鬥爭。所謂『鬥爭張三或李四』，目的就是要打整某某犯了錯誤的同志。『鬥爭會』的實質，是一種同志的審判會，主要的不是從思想上去解決什麼問題，而是要從組織上去解決問題，去壓服某些敢於堅持自己不同意見（這種意見不一定是真正不對的）的同志，或跳皮搗蛋的同志。而且在每一次『鬥爭會』對被鬥爭的人，大多數必須有組織結論。很明白的，這種鬥爭方式是不對的！

爲什麼不對呢？

首先，『鬥爭會』這個名詞就不對，就不通。既有所謂『鬥爭的會』，那末是不是還有所謂完全『無鬥爭的會』呢？如果我們把某些『會』認爲是專門進行鬥爭

的會，又把另一些『會』認為是完全不進行鬥爭的會，那就是一種極大觀念上的糊塗！在這裏，證明許多同志是不懂得鬥爭的絕對性及普遍性的。是把鬥爭與教育機械的分開的。

黨內鬥爭的目的，是爲了教育黨與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所以黨內鬭爭本身就是一種黨內不可缺少的教育；而黨內的教育也是一種黨內鬭爭，一種比較溫和的鬭爭。因此教育與鬭爭是不能分開看的，鬭爭即是一種教育，教育即是一種鬭爭，機械的分開是不對的。

其次，這種鬭爭會，是黨內宗派主義及對幹部對同志實行錯誤的打擊政策之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是爲了要打擊被鬭爭的同志，而不是爲了要幫助、教育或挽救犯錯誤的同志。主要的是對人鬭爭，而思想上的分歧與對抗，反而被忽略了。因此這種『鬭爭會』常常不能真正加強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分歧，加深黨內不團結的現象，無原則的糾紛，及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

至於在非黨的機關團體中舉行這種『鬭爭會』，那更是不對的。

第二，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鬥爭形式，還表現在：有些同志以爲黨內鬥爭是鬥爭得愈兇就愈好，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名詞用得愈多愈

好，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和態度愈嚴峻愈粗暴就愈好——講話的聲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兇、牙齒露出來愈長……就以爲是愈好，就以爲是「最革命不過」的了。他們在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中不講求適當，不講求分寸，不講求適可而止，毫無限制的鬥下去。很明白，這也是完全不對的！

第三，有些同志還不了解：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鬥爭，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與加強黨內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解決問題之後，才能在組織上、行動上解決問題。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求得一致與解決問題，要去克服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糾正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轉變別人的思想，要去糾正別人久已相信的原則、觀點和成見，就不是那樣容易的事，就不是採用那樣簡單的辦法，三言兩語，或一場鬥爭會所能做到的，不是採用單純的壓迫手段與強迫辦法所能做到的。而是須要經過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與各種複雜的鬥爭，經過相當長期的教育與鬥爭及革命的實踐，才能够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這樣來認識黨內鬥爭的實質，而是把黨內鬥爭簡單化、機械化、庸俗化，認爲黨內鬥爭只是一種組織上的形式上的對抗，只是一種簡單的打架或者罵人，只是一種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求得真正的一致與解決問題。或

者認為黨內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是可以用這種簡單機械庸俗的辦法來解決的。很明白，這是完全錯誤的！

由於這些同志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克服黨內的分歧，去糾正某些不正確的傾向與現象，來保持或達到黨內的統一，而是企圖用一種簡單的組織上的辦法，用一種對黨員的壓迫手段、打擊政策與懲辦制度來達到或保持黨內的統一，所以他們就產生各種錯誤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方式，所以他們就不是細心的，周到的，從原則上、思想上去說服同志，而是採用一種單純的組織上的辦法，敵對的方式，甚至行政上的辦法去壓服同志，嚇住同志。他們隨便對同志作組織結論，在組織上去處罰同志，而且用資產階級的平均的法律觀點，慘痛的處罰黨內的同志——即是不論何種黨員犯了多大的錯誤，不管其承認及改正與否，按照黨法均須給以多火的處罰。這就形成黨內的懲辦制度。他們常用開展鬭爭的辦法，去開展工作，推動工作；故意去尋找『鬭爭對象』（黨內的同志）作為機會主義的代表者來開展鬭爭，犧牲與打擊這一個或這幾個同志，『殺雞給狗看』，以推動其他的幹部黨員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務。他們故意搜集鬭爭對象的缺點錯誤，形式的、片斷的摘錄他不大妥當的言論行動，把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大妥當的言論行動又孤立起來看，當作就是這個同志的全部。把這個同志個別的缺點錯誤誇大起來，替他構成爲機會主義的系

統，在黨內同志中造成對這個同志極不好的印象，激動起黨內一切仇恨機會主義的心理，向着這個同志來鬭爭。於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報復心理也發展起來，揭發他一切的錯誤缺點，任意提到原則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實，憑着主觀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謠言，亂加這個同志以各種罪狀等等，結果是非把這個同志弄得昏頭昏腦不可。這樣做了之後，他們還不大允許這個被打擊的同志起來做任何的辯護。如果他有辯護的話，那末又說他故意辯護錯誤，承認錯誤不徹底等等，再加以打擊。不允許被打擊的同志在服從組織的條件下，保留意見，不允許向上級控訴，一定要被打擊的同志當時認錯。如果被打擊的同志一切都承認了的話，那末思想上、原則上的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又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在黨內也發生過這種事實：即某些同志在鬥爭中承認錯誤過多。爲了免遭打擊起見，不如一切都承認好些。錯誤雖承認了，實際上他自己也還是不懂得的。在這裏也就證明這種鬥爭方法不能培養共產黨員堅持真理的頑強性。

第四、是將黨內鬥爭方法與黨外鬥爭方法不加區別的混淆起來。有些同志，將黨內鬥爭的方法機械的搬到黨外的非黨的羣衆團體及機關中去使用，用黨內鬥爭方法，去向非黨幹部和羣衆鬥爭；另外有些同志，用黨外鬥爭方法，對敵人對異己分子鬥爭的方法，來向黨內的同志鬥爭，用對付敵人與異己分子的辦法，來對付黨內

的同志。一切挑撥離間，陰謀詭計都使用上來。行政上的辦法——例如監視、逮捕、監禁、審判等也運用到黨內鬥爭中來。如有些同志在鋤奸工作中所犯的過「左」錯誤，大半就是沒有將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嚴格區別開來的結果，是把黨內思想鬥爭與鋤奸工作混淆起來的結果。黨內也往往有敵人的奸細暗藏着，對於這種暗藏的敵人是必須根據事實進行鬥爭，把他們揭露出來與驅逐出黨的；但這與共產黨員犯錯誤需要進行教育性的鬥爭完全是兩件事，必須把二者區別清楚。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是有密切聯系的，但鬥爭的方法和鬥爭的形式必須區別開來。

還有些同志（其實這已經不能稱為同志）則公然依靠與假借黨外的力量來進行黨內鬥爭，向黨要挾和恐嚇。如有些人，依仗他們一部分的工作成績，依仗他們的部隊和槍桿子，依仗他們在羣衆中的信仰或某一部分的統一戰綫關係等，而向黨向上級機關進行鬥爭，要挾上級機關及黨接受他們的要求與意見，向黨鬧獨立性，向黨宣告獨立。或者利用黨外的、甚至資產階級的、敵人的報紙雜誌及各種會議，來批評黨，向黨的上級機關，及向某些同志和幹部進行鬥爭。很明顯的，這是與另外一些人依仗黨的勢力去強迫、命令、壓迫黨外的羣衆，去向黨外人進行敲詐勒索，是一樣嚴重的錯誤。這些人是站在黨外來向黨鬪爭，因此他們雖尙拚着共產黨員的名，却已經完全離開黨的立場，成爲黨的敵對者。

第五、我們黨內的許多問題都是在會議上解決，或經過會議解決，這是好的。但各個組織中，有許多會議是沒有經過準備與預先調查研究的工作的，常常在會議上發生許多不同的意見與爭論，而一切會議又必由最負責的參加者來做結論，一切會議的結論又等於決議，在這裏也常發生許多毛病。我看見有些會議上的爭論，最後逼到指導員或支部書記或其他負責同志來做結論。但這個負責同志自己是完全無把握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的，然而事情是逼來了，非做結論不可，否則不能做負責同志。這個負責同志只得來做結論，有的則表現非常狼狽與汗流浹背，粗率的把結論做下來，而這個結論也即等於決議，事情就照這個結論決定下來，這當然是要發生許多錯誤的。有些同志，當着他們對問題還沒有把握決定的時候，他們不肯說明自己還沒有把握，還要求一個考慮與研究的時間，或向上級請示的時期，而要顧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說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隨便決定下來，結果常常不是正確的。這種情形，也應該糾正。

我們一切同志對一切的問題，應該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要「強不知以為知」。黨內的問題，不是依靠蠻橫所能解決的。一切會議應該有結論，但不能決定的事情，或尚有疑問、尚未弄清的問題，就不應隨便決定。決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信的，如果自己還無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來再加以研究或請

示。會議的結論，不一定要參加會議最負責的同志來做，誰報告，在討論之後，即由誰做結論。但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定等於決議，會議的決定可以和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樣。在蘇聯共產黨內的作風也是如此。

以上這些，就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一些重要的表現。

我在以上所說的，當然是一些最壞的典型，不能說我們過去的和現在的黨內鬥爭普遍都是如此的。但這種黨內鬥爭的方式確實是存在的，且曾經在一個時期是佔着統治地位的，成爲主要的黨內鬥爭方式。

在這種不正確不恰當的黨內鬥爭之下，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什麼結果呢？是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以下一些惡果的：

第一，助長了黨內的家長制。個別的領導者及領導機關，在這種黨內鬥爭方式之下，壓迫着許多黨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在黨內形成個人或少數人的獨斷。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長了黨內極端民主的傾向及自由主義的發展。許多黨員平時不敢說話，不敢批評，表現黨內一種形式上的和平與統一。但是一到矛盾無法繼續隱蔽下去的時候，一到情況嚴重與錯誤暴露出來以後，即又亂批評亂鬥爭一場，形成爲黨內的對抗與分裂及組織上的紛擾，很難收拾。這也就是黨內家長制的反面表現。

第三，影響黨內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確的建立，黨內民主生活的不經常，不正規或極端的缺乏。

第四，阻止黨員同志們積極性、自動性及創造性的發揚，削弱黨員對黨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影響同志們不敢積極負責，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創造，不細心去考慮研究問題與情況，養成他們照辦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風。

第五，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無原則派別鬥爭的發展，造成黨內苦惱批評與鬥爭的心理，養成某些同志『獨善其身』的保守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六，給托派奸細反革命分子以破壞黨的更多機會，給反革命進攻我黨以更多的口實。托派奸細分子特別利用黨內的矛盾，不大正確的黨內鬥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來爭取那些受打擊的對黨不滿的分子。而反革命則利用黨內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來進行宣傳煽動，影響黨外的同情者及黨內不穩定的成份來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黨內的團結與統一。

上述這些惡果，在黨內是曾經造成過的。並且還有一部分遺留到現在尚未把我們消除。

這種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方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曾經造成黨內生活不

正常的現象，給黨的損失很大。現在我黨高級領導機關中，雖是已經糾正過來了，在全黨現在也不是一種統治的鬥爭方式，但在某些中下級組織中，在某些個別組織中，這種鬥爭方式則至今還未完全糾正，還相當普遍的或多或少存在着、繼續着。因此，這個組織中的生活仍然是不經常的。因此，我們必須嚴格指出這種偏向，以便在我們的組織中澈底肅清它。以便我們的同志不要重複這種錯誤，以便正確的切實的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前進。

四 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

同志們！我現在來講黨內鬥爭中另一種偏向——黨內無原則的鬥爭。這種現象在中國黨內，是特別普遍與嚴重存在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所謂「閒談運動」，但我想還沒有中國黨內這樣嚴重吧。所以我們對這種現象，必須使同志們認識清楚，並採取必要的辦法來對付，否則對黨內的團結和工作上的妨礙是太大了。

什麼是黨內的無原則糾紛與無原則鬥爭呢？

我認為黨內的以下幾種糾紛和鬥爭是屬於無原則的，即是離開我們黨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利益之共同立場和原則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整個黨的利益上來提出問題，來和其他

同志進行鬥爭，而是站在個人利益或派別利益的立場上來提出問題，來和黨內其他同志進行鬥爭。就是說，他們在進行黨內鬥爭中的立場是不正確的。因此他們對於問題的觀點、處理方針和辦法，也是不正確的。一切事情的處理，只要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有利，他們就贊成就主張，如果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不利，他們就反對，就不贊成。至於是否對黨對革命有利？他們是不管的，或擺在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因此，這種人主張什麼或反對什麼，都是沒有原則的，離開黨與革命的原則的。或者說：他們的原則不是黨的原則與革命的原則，只是他們個人利益的原則。如果每個人都是以自己個人利益為原則的話，那末，各個人的利益與原則必然矛盾，必然相互鬥爭。

比如在你們中間就有人爲了伙子的問題，馬匹的問題，吃飯穿衣及生病打針的問題，沒有提升自己職位的問題等，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和鬥爭，就是屬於這種個人的無原則的問題。同志們不是一般提出伙子、馬匹、吃飯、穿衣及打針應該怎樣支配的原則才對黨對大家有利，要黨及學校採取；而是這樣提出問題：爲什麼不給我伙子、馬匹？爲什麼不給我打針？爲什麼不提升我的職位？爲什麼不給我好的飯吃？好的衣穿？一切以「我」個人爲中心，從「我」個人的立場出發，在黨內造成糾紛，進行鬥爭。那末只要給他個人滿足了，即使支配得再不合理一點，他也可以

不等的。這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

又比如同志們反對浪費吧！有些同志是站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立場上來反對浪費的。因此他們提出各種違反節約原則的浪費現象來加以批評反對，並提出節約的意見要黨採取。這是很對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黨的利益與站在黨的立場上來反對浪費，因此他們就這樣提出問題：某人浪費了多少，某人某人又吃了什麼，穿了什麼，用了什麼……，爲什麼我就不能這樣吃，這樣穿，這樣用呢？難道我的資格不老嗎？對黨無功嗎？因此他在反對浪費的口號之下，起來鬥爭了。原因就是別人浪費了，而他自己還沒有浪費到。這也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

比如在皖東，曾經規定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員有少數的薪水，於是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政府機關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得到這一點薪水，不允許他們去的時候，他們就在反對政府機關人員有薪水的口號之下起來鬥爭了。他們也並不是在原則上提出應如何來規定政府機關人員的生活，來加以商討，這也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爲了把黨的事情弄好，甚至是爲了把黨的事情弄壞，或其他目的，來在黨內起糾紛，進行鬥爭。目的是不正確的。這也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比如有些同志爲了個人愛出風頭，爲了個人地位及個人面子，甚至爲了報復別

人以洩恨，在黨內鬧上紛，和其他同志鬥爭，以搗亂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計劃，破壞黨內的秩序與團結，而不顧及當時的情況與條件等，就是屬於這種無原則鬥爭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要黨採納，或要黨放棄，而只是憑自己的感情與喜怒來提出問題與進行鬥爭，爲了一時的痛快，爲了發脾氣舒感慨，而要罵人和氣憤，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另外有些同志由於他們的經驗與理論水平低，不能從原則上提出問題來爭論，而只是在一些個別的零碎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不涉及原則的日常工作問題上，來和其他的同志作絕不妥協的爭論，但並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則問題，因此這也是一種不應堅持的無原則鬥爭。比如，有些同志對於某一次的戰鬥，某一次的行動，某一個鬥爭形式，某一個組織方式等發生相互對立的意見，而不涉及到一般的戰術原則與戰略計劃及一般的行動方針與一般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各持己見的不停止的爭論下去。他們的問題提得不正確，因此常不能有正確的結論，或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爲一種無結論的清談。

第四，是不擇手段，不依照正當的組織手續來進行黨內鬥爭。在黨內無原則的拉攏或打擊同志；在同志間進行挑撥離間，陰謀詭計及陷害同志等；或者當面不說，背後亂說，對黨不負責任的亂批評、亂廣播及造謠、撒謊、誣譏同志等。

以上這些，都是無原則鬥爭。其次，還有一些同志，在原則鬥爭中夾雜無原則鬥爭的若干成份，或者在原則鬥爭的大旗掩護下進行着無原則的鬥爭。另有些同志特別善重的注意某人與某人爭吵，某人與某人的關係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們爭論的實質。

黨內這一切的無原則鬥爭，都是不好的，對黨有害無益的。

同志們！問什麼是原則？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什麼是日常政務問題？以及爲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不應堅持己見，而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

同志們！這些問題確是應該弄清楚的問題。

什麼是原則呢？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來講，所謂原則就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發展法則。相同的事物有大體上相同的發展法則。我們所謂原則問題，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法則作爲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問題。如果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法則有錯，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有錯，那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如果我們認識某一類問題的發展法則有錯，那末我們處理這一類問題的方法也必然要發生錯誤。所以我們對原則問題是不能馬虎的。如

果在原則上發生錯誤，那就不只是要發生個別的錯誤，而會發生系統的、一貫的、一系列實際問題上的錯誤。

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政務問題及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呢？

這大半是一些個別的問題，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比如我們說要發動與組織羣衆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而發動與組織羣衆又須集中由羣衆團體來領導，部隊也應該協助與參加羣衆工作，這些都是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即我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有的同志主張將部隊的民運隊及民運部暫時取消，將這些工作人員派到羣衆團體中去工作，另有同志則主張部隊民運隊，不應取消。有些同志主張羣衆團體應分爲四部辦事，另有同志主張分五部辦事，這些就都是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都不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我們敵後抗戰，今天的一般戰術原則是分散的游擊戰爭。如果大家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分歧的話，那末就是我們沒有戰術原則問題上的分歧。但有一次由於各種情況的逼迫或者由於對他們特別有利的情況發生，我們某個指揮員打了一次勝利的或失敗的運動戰，那末，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個別的實際問題。只要這個指揮員沒有存在敵後運動戰的原則的觀點，那末即使這一次二次戰鬥是錯誤的，也只是個別的錯誤，或者是由於特殊情況的發生，這個指揮員打得並不錯，

所以我們就不要在這些個別的純粹實際的問題上來堅持己見，爭個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軍裝備條件下，原則上是不應強攻敵人的堅固工事與中心城市。如對於這一個原則我們沒有分歧的話，那末某一個工事，某一個城市，因為有特殊的條件，或有特殊的必要，我們又去打下來了。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個別實際問題。但如果因為打下了這一個工事，這一個城市，就說一切敵人工事與敵佔城市今天我們都可以去打，這就是成為原則問題了。在內戰時期，曾有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指揮紅軍向某些大城市進攻，這就是涉及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因為他們去打這些大城市是在原則上主張紅軍應該向大城市進攻。在這種涉及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上，我們即不應該在原則上妥協，而仍應在原則上主張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體的實際的問題，常有幾個解決的辦法。由這裏到那裏，常有幾條實際的可走的路。這些辦法，這些道路，對我們當時情況又各有利弊，有的辦法和道路對我們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險性，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又不如採取次好的辦法和道路。所以在這些具體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如果我們發生有不同的意見，只要不涉及到原則上成為問題，我們就要善於妥協，善於讓步，善於接受與同意別人的意見，『善與人同』，然後事情才能暢快的辦理，問題才能爽快的決定；而不應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要別人放棄意見，總是要別人來將就自己，總是

要別人照自己的意見辦理，這樣反而要延緩問題的解決，妨害工作的進行，增加黨內糾紛與清談的傾向，妨害同志間的相互團結。這就是爲什麼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雖與黨內也有別種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緣故。

由此可知，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常政務問題、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呢？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鬥爭目標及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的問題，就是那些不關涉到我們的戰略及策略的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一般立場與具體立場的問題，上面舉過的各種例子，就都是這樣的問題。

總之，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總原則，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一切要服從這個總原則。一切違反這個總原則的主張、意見和行動都是要反對的。各種原則之中，又有大原則與小原則之分，我們的規律，是部分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小原則服從大原則。在一切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是不能調和妥協的，必須澈底爭論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就不應死不妥協，就不應過分着重鬥爭與爭論，否則也要妨碍工作與妨害團結的。

我曾經聽見一個同志說，在黨內鬥爭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在組織上即使錯誤一點是不要緊的，是次要問題，因此他認爲在黨內鬥爭中可以採取各種不合組織規律的手段向反對者鬥爭。這種說法，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他把

正確的政治路線與正確的組織路線對抗起來看，他不知道搞亂黨內的秩序與組織，就是犯了一個最嚴重的原則的錯誤；特別在今天妨害與破壞黨內的團結和統一，就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最大的妨害了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他原則錯誤更加嚴重的錯誤。在這裏，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我們的同志都要善於比較、善於區別各種原則問題在當時對黨的利害的輕重關係，根據小原則服從大原則、部分服從整體的法則，來決定在什麼原則問題上應暫時讓步不堅持，在什麼原則問題上則堅持不讓步。爲了保持黨內團結和統一，有時對於某些關係不大重要不大緊急的原則問題，我們也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暫時妥協的，暫時不提出這些問題，不在這些問題上堅持爭論，而着重在當時關係重大的緊急問題上。這當然不是原則上的調和與中間路線，而是實際行動上的妥協及服從多數決定。

以上就是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問題。

黨內無原則鬥爭以及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呢？它們的根源是什麼呢？這是由以下一些根源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黨內同志的理論水平一般還很低，許多方面的經驗還不够，全黨的領袖與中心很久沒有實際的形成，黨在各地方的領袖與中心則至今還很少實際的形成。

第二，黨內小資產階級成份多，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瘋狂性，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報復性，經常影響到黨內鬥爭。

第三，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間客觀的相互商討問題的作風未形成，粗糙的主觀的判斷與處理問題的作風仍然嚴重存在着。

第四，投機分子混入到黨內來，以及某種投機心理在黨內一部分同志中的存在。他們常常爲了證明自己的「布爾塞維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爲「左」要比右好點，或者爲了打擊別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細反革命分子混入到黨內來，利用黨內鬥爭來破壞黨。內奸托派常常在黨的旗幟掩蓋之下故意打擊某些同志，在打擊之後，又要月一個內奸托派分子去吸收這些被打擊的同志作內奸加入托派。

以上這些就是產生黨內鬥爭中上述各種偏向的根源。

我們的黨從最初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做得對的，恰當的。因此我們的黨在許多次的黨內鬥爭中都有成績，都使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有些提高。不可否認的，這些批評與黨內鬥爭是推動我們黨進步的原動力，如果沒有它，是不行的。然而我們同樣的不可否認，在我們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是存在着上述各種典型的偏向和錯

誤、在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進行得不正確的。因此，就使我們在過去黨內鬥爭中費去了很大的代價。因此，我們在今天就應該如何的來懲前毖後，如何使過去所費去的很大的代價使宅不是虛費的，如何從研究過去黨內鬥爭的歷史教訓中來求得黨的大的進步。

以更少的代價和痛苦換得黨內更大的成績和黨的更大的進步，這就是我們今天從研究中國黨內鬥爭的歷史教訓中所應確定的今後黨內鬥爭的方針。但這就需要我們徹底糾正過去黨內鬥爭中各種偏向和錯誤，需要我們切實的適當的去進行黨內鬥爭。

五 怎樣進行黨內鬥爭

同志們！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就是要怎樣來正確的進行黨內鬥爭呢？

關於這個問題，聯共黨及各國黨均有很多經驗，中國黨也有很多經驗。列寧、斯大林有很多指示，黨的中央也有很多指示。關於這些，同志們應該去細心的研究，將來在黨的建設上也要講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那些。我只就中國黨內鬥爭的經驗提出以下一些意見來，作為同志們的參考。

第一，首先，同志們要了解：黨內鬥爭是一件最嚴重、最負責的事。我們必須以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來進行，而絕不可以草率從事。必須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確的黨的立場上，完全是爲黨的利益，工作的進步，及幫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與理解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來進行。必須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問題弄清楚，實行系統的調查並研究，同時還必須是有組織的、有領導的、有準備的去進行。

同志們應該知道：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才能糾正人家不正確的立場；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後才能矯正別人的不正派。所謂『必先正己，然後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動搖，然後才能幫助動搖的人，克服人家的動搖。

只有自己有正確的原則，正確的理论，然後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原則與不正確的理论。

只有自己對於原則問題的明確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確。只有自己了解問題的實際材料更多，更有系統的研究了問題，然後才能給其他的同志並給黨以更多的幫助。

如果有同志不是這樣，如果自己首先就不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沒有把握到正確

的原則，沒有按照原則去觀察客觀情況與系統的研究問題，甚至只要有個別的缺點與在某些地方的不够明確，那在黨內鬥爭中都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東西。如果還要魯莽的去鬥爭，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確的路上去。

只有客觀的鐵的事實，只有在實踐中已證明了的經驗，只有真理，能够戰勝一切。

我們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不是爲了要削弱黨的組織與團結，削弱黨的紀律與黨的威信，妨害黨的工作的進行；相反的，是爲了加強黨的組織與團結，提高黨的紀律與威信，推動黨的工作的進行；因此黨內鬥爭不能任其自流的發展，形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在黨內既不能容許家長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許極端民主現象的產生。這是黨內生活不經常的兩個極端的表現。

黨內鬥爭，是要用對黨對革命最高的負責態度來進行的。

第二，同志們要了解黨內鬥爭基本上是黨內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鬥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對抗。思想原則上界限的明確劃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在鬥爭的方式上，在說話與批評的態度上，應該儘可能的不對抗，儘可能的採取溫和的方式來商討或爭論。儘可能不採取組織手段及做組織結論。儘可能完全採用誠懇、坦白、正面的教育的態度去進行，去求得思想上、原則上的一致。只有

在必不得已的時候，在十分必要的時候，才可以採取對抗的鬥爭方式與組織手段。黨的一切組織，在適當的限度內，都有完全的權力對任何堅持錯誤的黨員做組織上的結論，黨的紀律的執行與組織手段的採用，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種手段不可輕易採用，不可濫用。單是在組織上處罰同志多，並不能提高黨的紀律。黨的紀律，黨的統一，主要的也不是靠處罰同志來維持（如果要這樣才能維持，那就是黨的一種危機了），而主要的是依靠黨在思想上、原則上的真正一致，依靠大多數黨員的自覺性來維持的。我們只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最後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組織結論是最容易做出來的。我們不要一分鐘可以決定開除某些同志的黨籍，或宣佈自己脫黨。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堅持、對抗與爭論，和同志們對於黨的組織上的服從，對於多數與上級的服從，是不可分離的；否則就沒有黨的統一與行動上的一致。同志們決不可以因為在原則上堅持己見，就在組織上與黨對抗，就不服從多數與上級，就去自由行動。這是違反黨的基本紀律的。

原則上、思想上的對抗，與組織上方式上儘可能的不對抗，是我們應該採取的黨內鬥爭的正確方法。許多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一方面沒有思想上與原則上明確的對抗與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組織上及鬥爭方式上又對抗得一塌糊塗，鬥爭得一

場糊塗，爭得面紅耳赤，罵得狗血淋頭，鬥得兩方面不見面，仇恨種下很深，然而在他們之間竟找不出原則上、思想上的明確分歧來。

第三，對黨的組織、對同志、對工作的批評要適當，要有分寸。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有布爾塞維克的尺度。一切過分的批評，擴大人家的錯誤，濫給別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對的。黨內鬥爭不是鬥得愈厲害愈好，而應有適當限度，應講求適當，『過』與『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與批評別人的錯誤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問題，給以系統的明確的解釋，才能解決問題。而不要枝枝節節的搜集人家許多錯誤的現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實，簡單給以暴露了事。這會使人感覺你故意找他的錯誤，攻擊與打擊他。

當你們估計或批評某個同志時，你們不應僅僅指出他的缺點錯誤當做他的全部，你們還應指出他的成績、功勞、長處及他正確的主張，即使他的主張只有一點或一部分是正確的，你們也必須替他指出，不可抹煞。這樣才能給這個同志以全盤的估計與批評，才能幫助他進步，使他服氣。

適當的批評，適當的態度和適當的方式反對『過』與『不及』，這就是我們在黨內鬥爭中所應採取的方法。

第四，在黨內外一般的停止鬥爭會的舉行。應從總結工作、檢查工作中來指出

各種缺點錯誤。應該首先「對事」，然後「對人」。應該首先把事實弄清楚，把問題弄明白，把錯誤與缺點的性質、嚴重程度、產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後再指出對這些缺點錯誤的負責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誰負責，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錯誤的負責人。只要犯錯誤的同志不是有意的，並且真正在了解錯誤，改正錯誤，那我們就應該歡迎，就不應再事斤斤計較。在黨內鬥爭中，對幹部與同志的打擊政策，攻擊別人與打擊別人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與剝削階級對勞動者的鞭子政策、壓迫政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我們的政策是同志間的互相幫助與互相檢討。

對於某些特別跳皮搗蛋、經常違反決定、違反紀律、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同志，對於他們，原則問題還說不上，也說不通的時候，那末，個別的舉行一些同志審判會，也並不是不可以的，有時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普遍化就是不對的。

第五，必須給被批評被處罰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訴的機會。在鑑定同志及對同志做組織結論的時候，通常均應通知本人，當面做結論。如果他不服，在經過辯論之後，應向上級申訴（一切在處罰後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願上訴，黨的組織亦應代他上訴）。任何黨的組織，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處罰後向上級申訴。黨員的上訴權不能剝奪。一切的上訴書，任何黨的組織不能加壓。關於思想原則問題，黨員並可越級直接向中央或高級黨委上訴。不過上訴的同志應該在下面充分說

明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分歧的意見何在？弄清楚之後，才去上訴，不能在下面不說，到上面又亂說，蒙混上級，企圖取巧。一切案件上訴之後，決定權即在上級，上級黨委可取消、或減輕、或加重下級黨委對同志的處罰。

在思想原則上，經過爭論之後，如果還未在黨內最後的取得一致，是可以通過多數決定的。在多數決定之後，少數同志如果還有不同的意見，在組織上行動上絕對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是有權利保留自己意見的。

一定數量的下級黨委或同志要求上級黨委及領導機關召集適當的會議檢查工作的時候，只要有可能，上級黨委應該召集會議來檢查。

第六，應使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有明確的界限，同時建立適當的聯繫。不要將黨內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外去使用，也不要將黨外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內來使用，更不要利用黨外的力量和條件來向黨進行鬥爭與恐嚇。一切黨員要嚴重的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暗藏的托派奸細和反革命分子利用黨內的矛盾和鬥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一切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要被這些分子所利用。這只有嚴格的遵守黨內紀律及正確的進行黨內鬥爭，才能做到。

在黨內，只能允許合法的鬥爭，只能允許思想鬥爭，一切違犯黨章黨紀的鬥爭方式，都是不能允許的。

第七，禁止黨內的無原則糾紛。這須規定以下的一些辦法：

(一) 一切黨員對黨的領導機關及各個黨的組織，如有意見，只能向相當的黨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在羣衆中亂說。

(二) 一切黨員對其他黨員及黨的負責人如有意見，只能當面批評，或在一定的組織中批評，不允許亂談。

(三) 一切黨員或下級黨委對上級黨委如有意見，只能向上級黨委提出，或要求召集會議檢查，或向上級的黨委控告，不允許亂說，或向下級傳達。

(四) 一切黨員如果發現其他黨員有不正當的行爲及危害黨的利益的行爲時，必須向相當的黨的組織報告，不得隱瞞或互相包庇。

(五) 一切黨員應大家提倡正氣，提倡正派，反對邪氣，反對一切不正派的言論與行爲，給那些喜說閒話、喜歡廣播、喜打聽人家的秘密、喜造謠言的黨員以嚴重的斥責。黨的領導機關應該隨時通令：禁止黨員相互談論某些一定的問題。

(六) 各級領導機關應該隨時找那些喜歡說人閒話、喜鬧無原則糾紛的同志來談話，給以糾正及警告或其他處分。

(七) 各級黨委應尊重每個黨員提出的意見，應經常召集會議，討論問題，檢討工作，給黨員以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

對於無原則糾紛，應該一般的禁止，不應去判斷是非，因為是無原則糾紛，所以是無是非可以判斷的。

當着我們去解決同志間無原則糾紛的時候，決不要單從糾紛的本身去解決，而應該去檢討與總結那裏的工作，正面的原則的去提出那裏今後的任務、工作方針、路綫和計劃等。在這種總結、任務、方針、路綫和計劃中，批評到某些同志不正確的意見，然後徵求同志們的意見，是否還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同志們還有不同的意見，那就變為原則的爭論，把同志間的無原則爭論提到原則爭論的高度。如果同志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了，就要求同志們大家在這種總結任務和方針之下，團結起來，一致為完成這種任務與計劃而鬥爭。其他一切的無原則問題，要求同志們拋棄。應該從總結過去的工作，解決當前的任務，推動當前的工作中去解決無原則的糾紛，否則，無原則糾紛是不能得到解決的。我們決不要用審判官的態度去解決無原則的糾紛，這是無法判斷，無法解決的。如果你判斷不當，雙方都是會不滿意的，糾紛會繼續存在的。

至如某人對某人信任不够，某人對某人尚有若干懷疑等等，這些問題一般不應提出來討論，因為討論是無益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只有在工作中、鬥爭中、實踐中，才能解決，才能證明某人是可信任的，某人是無可懷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鬥爭中夾雜着若干無原則成份，那末我們只着重和他討論原則問題，無原則問題不應着重去討論，否則就會淹沒原則問題。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鬥爭的掩蓋之下去進行無原則鬥爭，那我們一方面應指出他在原則上對的方面，不要「以人廢言」；同時也應適當的指出他的立場與手段的不正確，以免將原則鬥爭引上無原則鬥爭。

總而言之，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與鬥爭。在黨內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否則不行。道理講清楚了，一切都好辦，都容易辦。我們要在黨內養成講道理的作風。判別各種道理是否正確的尺度，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從整個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張，對於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有利的，對整個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長遠有利的，都是對的。不利的，都是不對的。無道理可講的鬥爭，講不出道理的鬥爭，就是無原則的鬥爭。不講道理或講不清楚道理，都是不對的，都不能得到正確結論的，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道理講清楚了，最後還不能得到一致的話，那麼誰個是違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對於堅持錯誤的同志，採取組織結論就有必要了，問題就好解決了。爲了要講清楚道理，要論講清楚道理，黨內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靜氣互相商討的作風就是必要的。虛心學習，提

高同志們的理論水準，弄清楚情況，調查清楚事實，細心研究問題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意，主觀主義，人云亦云，脫離實際，不查清楚事實……是絕不能講清楚道理的。既不講道理，或講不清楚道理，結果就只有依靠蠻橫，依靠手段，依靠組織上所付予的權力，甚至依靠欺騙，來解決問題了。黨內民主就更無必要了；因為黨內民主，就是爲了大家來把道理講清楚之後，以便一致行動的。

我在這裏所謂之『道理』，當然不是那些空洞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實際事實與被實踐所證明了的真正的道理。某些知識分子是好講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們不要事實也可以講一大篇，從地下可以講到天上，這是一種空談、黨八股，對黨對革命是只有害處毫無益處的。所以在提倡講道理的作風中，又必須反對空談與黨八股，提倡那些從實際出發的又是爲了實踐的客觀的唯物的道理。就是說，『我們的理論是唯物的』。

一切要講道理！不講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講錯了也是不行的！空談更是不行的！這當然有些爲難，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布爾塞維克。

布爾塞維克是講道理的，是真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並且好好的和別人講道理的一個人，而不是蠻不講理的無理性的鬥爭家。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們同志應該依照這些方法去進行黨內鬥爭，去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去檢查每一個黨員特別是幹部的黨性。使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進一步的鞏固起來，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附註：這篇文章因由電報發到延安，所以錯字很多，今特校正，並稍加修改付印，望讀者注意。

劉少奇註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

清算黨內的王德塞維主義思想

劉少奇

中國共產黨，中國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進步的政黨，從產生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二個週年了。這是偉大的二十二年。在世界上，在中國，無數的偉大事變，是在這二十二年中經過的。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已經進行了三次偉大的革命，三次偉大的革命戰爭。第一次大革命與北伐戰爭及現在還在進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是與中國國民黨共同進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戰爭，則是在我黨單獨領導之下進行的。這三次革命戰爭對於我黨來說是沒有間斷的一直連續進行到現在。許多共產黨員十多年來就一直沒有放下過武器。在這一點上也就說明白：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發展是與武裝鬥爭分離不開的。

我們的黨，在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連續不斷的全國性的革命戰爭中，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的，它經過了多次的勝利，也經過了多次的挫敗。它是走着非常迂迴曲折的道路，以至於今日。但它還能够屹立於偉大中華民國的國土上，並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成爲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唯其因爲它是走過了各種迂迴曲折的道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鍛煉得特別堅強，它也就具有各方面的特別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可以說，它在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經歷了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不論是武裝的與羣衆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公開的與秘密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鬥爭，我們的黨都經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而特別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的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

我們的黨有各方面的極端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很好把它總結起來。以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來很好的總結我們黨在各方面的鬥爭經驗，

還是今天我們全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因為這些經驗的馬列主義的總結，是團結全黨、教育全黨、提高全黨以至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一環。只要我們的黨員能够真正懂得我們黨的歷史經驗，那他們就會要增加無限的信心與勇氣，他們就會把自己的工作大大的推向前進，把我們的黨大大的推向前進。他們就能够避免許多在歷史上已經犯過的錯誤，把他們的工作過程與革命過程縮短許多倍。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實際的效果。如果拋開如此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如果輕視我們黨二十二年來在偉大歷史事變中的鬥爭經驗，不用心研究這些經驗，不用心向這些經驗學習，而只去學習離開我們較遠的外國革命經驗，那就是輕重倒置，那就要使我們再走許多彎路，再受許多挫折。

二十二年來我們黨的鬥爭經驗是極豐富的，是各方面的。現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說明。但是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什麼呢？我認爲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麼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這個問題。大家知道，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國人也有許多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何者又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與假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是在中國革命羣衆中，並在中國共產黨

內多年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是有真假之分的。這種真假之分，並不以各人的主觀自命為標準，而是有其客觀標準的。如果我們的黨員不了解這種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客觀標準，而不自覺的盲從在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去進行革命，那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的事。這種經驗應該是我們黨的各種痛苦經驗中最痛苦的一個經驗。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黨內存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的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以至使這些人佔駐了某些組織某種運動的指導地位，甚至在某種時候佔駐了全黨的指導地位，因而把革命運動引上痛苦的困難的道路。這是我們全體黨員必須引為深戒的一個痛苦經驗。

中國共產黨員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以及宣傳組織工作的能力，並不弱於任何一國的共產黨。我們對於各種工作，歷來就是作得很好的，可以幾十萬幾百萬的組織羣衆，可以二萬五千里長征，也可以在敵後那種艱苦與沒有任何援助的條件下組織根據地堅持抗戰六七年……。中國共產黨員的革命精神與艱苦的工作精神，是很可欽佩的。然而我們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關於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思想上的準備，是很不夠的。在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就是在革命運動的指導上還不免發生錯誤，因而就使運動遭到部分的有時甚至是嚴重的不應有的損失。這一個

歷史教訓，我們必須記取，並且必須在今後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只要我們能够保證對於革命運動的指導在各方面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那就等於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指導，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的走向勝利。

然而，要怎樣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各方面對於革命運動的指導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呢？這就須要我們的黨員首先是我們的幹部能够辨別馬列主義和各種馬列主義者的真偽，就須要在革命的隊伍中，在黨內，粉碎各種假馬列主義的體系及其派別，就須要很好總結我黨二十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就須要很好的進行學習，提高我們的嗅覺，就須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的環節和部門中去。

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就有真假兩派馬克思主義者。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鬥爭的歷史，那末在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也同樣的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的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這是我們一切黨員必須澈底認識明白的。

還在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就很恰切的描寫過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這對於中國也是很恰切的，現把他的全文引在下面：

「現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派。可是，這兩派人究竟還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兩派中間，還橫着一條鴻溝，因為，兩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照例只是在口頭上得意的宣揚馬克思主義，他們不會或者不願意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或者不願意實行馬克思主義，他們總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活潑的革命的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們不經驗，不拿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工作的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做工作的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史上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符——這就是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意於那個常常欺騙他們的「厄運」。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塞維主義（在俄國），就是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西里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給了這派人一個很中肯的估計，他說：這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問題的重心，由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

而移到實行馬克思主義，移到將馬克思主義化爲實際。規定適合於環境的方法和手段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因環境發生變更而變更這些方法和手段，這就是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週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是拿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是拿實際經驗來做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的。馬克思的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當僅限於說明世界，而且應當更進一步去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遵守這幾句話的。馬克思的這幾句話，完全和這一派人相符合。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爾塞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人的組織者和領袖，便是列寧。」（『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解放社版，一九一一二頁）。

斯大林在這裏說得很清楚，這兩派人雖然都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做工作，都把自己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兩派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一派人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孟塞維主義與機會主義者，他們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宣揚馬克思主義，而不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實行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公式教條。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不拿經驗與對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根據，而拿書本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從分析具體實際生活中去求得，而是從書本上、從歷史上相像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裏面去求得。他們言行不符，口講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作的就完全是非馬克思主義。客觀事實的發展常常是欺騙他們的，他們總是灰心失望，死氣沉沉。

另一派人，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列寧主義者，布爾塞維主義者。他們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將馬克思主義化為實際。他們特別注意規定適合環境的實行馬克思主義方法和手段以及這些方法和手段的變更。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而是由調查研究周圍的情況中去求得。在工作時，他們不拿書本上的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拿實踐的經驗來做根據，並拿經驗來審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和教訓別人來推動工作前進。這派人言行一致，口講馬克思主義，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僅說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們經常保證馬克思主義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

這兩種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歷來也就是存在的。前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陳獨秀、彭述之和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就是李立三路線，就是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就是教條主義。這些東西，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孟什維主義，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後一種真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同志以及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週圍的其他許多同志，他們歷年來所堅持、所奮鬥的路線，他們的工作方法，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

我們的同志和幹部必須明白，必須提高警惕性，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着一條孟什維主義的路線及其思想體系的。從陳獨秀、彭述之、李立三以及後來的各種機會主義與教條主義，他們在各個時期中的各種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在組織上他們也不見得有什麼聯系，然而他們的實質，他們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貫系統的，他們給予黨的損害，給予中國革命的損害，是十分嚴重的。中國的孟塞維主義，除托陳派有共歐洲托派的衣鉢真傳外，其他形態的孟塞維主義，是並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及俄國孟塞維克的衣鉢真傳的；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中，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自己生長出來的。所以這些人與歐洲社會民主黨及俄國孟塞維克比較起來，在形式上有許多特點。這

就是中國的孟塞維主義在形式上是以「反孟塞維主義」出現的，是以「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國際路線」等等形式和詞句出現的。他們在這些美麗的形式和革命的詞句掩蓋下，來進行實際的反對列寧主義的反布爾塞維主義的鬥爭，來宣傳與實行實質上的孟塞維主義。再由於我們許多黨員和幹部的理論水平低下，嗅覺不高，不能在實質上辨別其為孟塞維主義，就常常為他們那些美麗的形式與革命的詞句所蒙蔽。他們就常常能夠一時的取得許多黨員和幹部的贊成，而攫取到黨的或某些部分的領導地位。他們還特別發展半封建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宗派主義、個人主義，並與中國社會中的流氓手段相結合，如是他們在黨內的為害就特別嚴重，就特別表現其庸淺庸俗，表現其兩極性與兩面性。這就是中國孟塞維主義的主要特點。

中國黨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傳統，但存在着中國的孟塞維主義體系的傳統。要識別這種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假布爾塞維克，是不能僅僅從他們的詞句，從他們表現的形式，去識別的。他們可以在言語上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更多馬列主義，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更革命更艱苦，殷勤和滿。然而他們最怕實踐的考驗，最怕用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因此，必須從他們的實踐中，從他們的工作中，從他們認識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中，從他們工作結果的檢查

中，去識別這種人，去暴露這種人的真相。因為他們是口講的馬列主義者，而不是實際行動的馬列主義者，他們的實際行動照例是不受馬列主義原理的嚴格指導的，他們在做工作的時候，總是拿書本子做根據，拿馬、恩、列、斯的成語，拿什麼決議上的條文來做根據，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論來做根據，而不拿實踐中的經驗和對於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問題、決定方針的時候，總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調查研究週圍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是從書本上的公式出發，從歷史上的類比出發，或者從蘇聯、從西歐各國、從其他什麼相像事情出發。他們在實踐中是唯心論者。因此，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錯誤的，他們是不能最後把工作做好的，他們在實踐中的結果，是必然要與他們最初的願望、最初在口頭上的宣言相違反的，如果你注意到他們的工作方法，用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及其結果時，就要暴露他們的本質。毛澤東同志在整頓三風報告中，對於這種人是有過嚴格批評的。

然而，這種人的危險性，就在於他們那大堆的馬列主義的詞句，布爾塞維克的外表及其先天的兩面性，他們可以嚇唬及蒙騙許多工農同志及幼稚的青年同志，甚至就是很老練、很有工作經驗、但理論上的識別能力還很差的同志，也常常被他們所欺騙所俘虜，因而他們就可以把黨的事業弄到很危險的地步。

黨的過去的歷史，是充滿着布爾塞維克路線與孟什維克路線鬥爭的歷史。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着這樣兩條路線和兩種傳統的。一個是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另一個是孟塞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前一個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後一個是以黨內各派機會主義者為代表。這兩條路線，兩個傳統，是經過了長期的激烈的鬥爭，內容是極端豐富的。在這種鬥爭中，黨內的錯誤路線，孟塞維克的路線，雖然也曾經在幾個短的時期內佔了上風，得到過暫時的勝利，但大多數的情形總還是把錯誤路線克服下去。我們的黨雖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錯誤路線，但是思想上的孟塞維主義的體系，總是沒有澈底被克服過，沒有澈底被清算過，沒有給它以致命的粉碎的打擊，因此，這種思想，這種傳統，總還是在黨內殘存着，到了某種時期某種條件之下，它又發展猖獗起來，又危害我們的黨。

現在應該是時候了。應該從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澈底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的殘餘，應該很好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並把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和黨員。只有這樣，才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才能實現我們黨的隊伍的統一和紀律，才能保證我們全黨經常的正確的領導，才能在今後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否則，我們就不能在今後艱苦複雜偉大的時代中，很好實現我們先進政黨的歷史使命。

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黨內的反映，是它的一種高級表現形態，是成了某種體系的。要清除黨內的孟塞維主義的思想及其體系，就要在黨內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去清除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要使我們的黨員能夠在一切形態上區別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這種工作，我們已經作了，有些地方還正在作。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去年以來所號召的整頓三風的運動。這種整風運動，是黨在二十二年的歷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批評運動。它把我們的黨向布爾塞維克的道路上空前的推進了，我們應該在整風的這種基礎上，進而總結我們二十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在思想體系上澈底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殘餘，把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化提到更高的階段。這就是我們在黨的建設上今天的中心任務。

中國黨的歷史，應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和各派機會主義者鬥爭的歷史，這種歷史，在客觀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構成的。黨內各派機會主義的歷史，決不能成為黨的歷史。黨內孟塞維主義的體系及其傳統，決不能成為黨在思想上的體系及其傳統。黨內歷史，是與這種體系傳統鬥爭並將其克服粉碎的歷史，為了肅清這種傳統的殘餘，給這種傳統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沒有必要替它掩蔽，替他否認。這對於黨是有害無益的。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

但是，我們的黨員和幹部應該更加提高警惕性的，就是年來我們的敵人派遣了他們一些特務分子混進到我們黨內來。這些人也是以馬列主義偽裝起來在黨內出現的。他們與前一種假馬列主義者是有區別的。他們是反革命分子。對於這種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必須把他們清查出來。這就是在黨內分清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而在黨內肅清孟塞維主義的殘餘，則是在黨內分清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界限。這兩種界限，都應該分清楚，但分清的方法和手段應該不同。前一種是用審查幹部和黨員的方法來分清楚，而後一種則是用整風與總結經驗的方法來分清楚。

用馬列主義來清算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及其體系，清查內奸，這是我們目前鞏固黨提高黨的兩大工作。這兩大工作的勝利完成，我們就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我們就能以完全鞏固、完全準備好了的姿態，迎接偉大光明的時期的到來。

掌握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武器，肅清內部的機會主義的殘餘，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

（爲黨的二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日號，並不是一種一時的和偶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底幹部以及一般地工人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到，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塞維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塞維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了。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塞維主義還未成爲獨立政黨，還同孟塞維克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這樣說：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

已久歷戰鬥，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短處（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這些短處，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生長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把他們「黨」內的真實情況的畫圖，給我們看看吧，那怕就是稍微近似我黨第二次大會記錄那樣所給予的畫圖也罷！」（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那些以爲自我批評是一個一時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會過時的同志們，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塞維主義武庫中絕不可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塞維主義底本性、同布爾塞維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離的聯結着的一種武器。

有時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尙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的受敵對力量包圍的黨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爲敵人可以利用該黨本身缺點的揭露來攻擊它。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爲布爾塞維主義已經取得政權，正因爲布爾塞維克也許會因我們建設底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爲布爾塞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爲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重要。自我批評之目的，是揭露與消除我們

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只會使布爾塞維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敵人作鬥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估計到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底這種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政黨底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

『……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它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却沒有做成功。在今天以前已經滅亡了的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和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而我們卻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

且學習怎樣克服這些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地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不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沒有布爾塞維主義。

但是，爲要開展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克服黨面前的許多障礙。這裏包括羣衆底文化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底缺乏，我們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是最嚴重的障礙，也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這裏說的是在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分子。這裏說的是這些官僚主義分子專門藉我們的弱點和錯誤爲生，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好像害怕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僚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應該使我們懂得，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鬥爭，這個鬥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鬥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官僚主義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已經成了病，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的毛病了，這是因爲官僚主義是

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聯結着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如果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消除我們建設底毛病，那就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進行反對我們各種組織中的官僚主義的鬥爭。

因此，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下起來批評，自下起來監督，這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主要解毒劑。

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

『……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種鬥爭，……』因爲，『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辦法消滅官僚主義呢？』（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四九六頁）。

但是爲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之中，首先是在我黨內部，展開無產階級的民主。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等於空話。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無論什麼的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自我批評，它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發展工人階級底戰鬥精神，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

念，擴大它的力量和幫助它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以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對於一切東西說長道短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了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外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恥辱。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減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信心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信心的有生命的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類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引導到破壞黨性，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瓦解我們的經濟幹部，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空談變化。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是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的。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是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黨將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來反對這種『自我批評』的。

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培植黨性、鞏固蘇維

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鞏固我們的經濟幹部、武裝工人階級爲目的的。（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同志们，這並不是說，我們黨裏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的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吧。

例如，就拿黨的組織對經濟的和其他的各種機關的領導來說吧。這裏是否一切都很順利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不僅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比如某組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爲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爲那裏能担保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恕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们，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的普遍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只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

喊聲：「對呀！」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是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並把毒藥驅進我黨機體的內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清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它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的浪潮中前進。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鬥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當階級還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謝天謝地，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下

去，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簡單地就死亡的，而是拚命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些新的東西在生長出來。而這些正在生長的新東西，決不是簡單地就生長的，而是大喚大叫地爭取他那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呀！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鬥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塞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掉，反而怡然自得，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大成功，就洋洋得意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却依然存在，瘡毒還在侵入到我們黨的機體內部去。（斯大林：『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列寧、斯大林等

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除組織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被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制底統治所分散，被替資本所作的強迫勞動所壓倒，經常被拋到完全貧困、粗野、退化的「深淵裏」，無產階級之能夠成爲而且必然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爲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爲組織底物質統一所鞏固，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爲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是俄國沙皇專制制度底已經衰老的政權，無論是國際資本底正在衰老的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這支大軍將日益更加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而不顧任何迂迴和後退，不顧現代社會民主黨中的基朗特派底機會主義辭藻，不顧那對於落後小組習氣的自滿自足的讚美，不顧知識分子無政府主義底自炫和喧鬧。（列寧：「進

一步退兩步』第十八章)。

的確，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羣衆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擁護，即是說，如果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正派的、自我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羣衆的人們底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它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國國內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系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與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小生產留存在世界的，可惜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經過長期的、頑強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戰爭，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這一戰爭要求堅忍、紀律、堅定、不屈不撓和意志底統一。

我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了那些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無產階級底無條件的集中制與最嚴格的紀律，乃是戰勝

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列寧：「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慢、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要是有人滅弱——即使滅弱一點——無產階級政黨底級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他就在事實上幫助着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同上，第五章)。

說到這裏，不可不記起卡爾·考茨基在不久以前對於最後這個品質（指知識分子的無紀律性——輯者）所給予的燦爛的社會心理的特徵描寫。現在，各國社會民主黨都往往患着相同的病症，而向更有經驗的同志們學習正確的診斷和正確的醫治方法，這對於我們是非常有益的。因此，引證卡爾·考茨基對於某些知識分子的特徵描寫，只是表面上的脫離我們的本題。

「……現時關於知識界與無產階級間的對抗問題又是我們所非常注意的問題了。我的同僚們（考茨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著作家和編輯——列寧）將往往因我承認這個對抗而表示憤慨。然而，須知道這個對抗是確實存在的事實，而企圖以否認事實來堵塞這個對抗，那就會是最不適當的策略。這個對抗乃是

社會的對抗，這個社會對抗是表現在階級上，而不是表現在個別人物上。無論個別的資本家，或個別的知識分子，都是完全能夠加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當有這樣的事實時，知識分子也就改變着自己的性質。而在往後的敘述中所說到的，主要不是這種知識分子，因為這種知識分子迄今還是自己階級中的例外。在往後的敘述中，如果沒有特別的附帶說明，那我就僅僅把知識分子一字了解為普通的知識分子，這知識分子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的，是知識分子階級底標本代表。這個階級是與無產階級有相當對抗的。

這個對抗，是異於勞資對抗的另一種對抗。知識分子不是資本家。固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資產階級的，而當他還沒有變成爲流浪者時，他是不得不維持這種水平的，但同時，他又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的生產品，而且還時常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往往遭受着資本家方面的剝削以及一定的社會的賤視。所以，知識分子是與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經濟對抗的。但是，他的生活狀況，他的勞動條件，是非無產階級的，而由此也就有在情緒中以及在思惟中的一部分對抗。無產者在他還是孤立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自己的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自己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他從組織中，他從與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動中汲取的。當他是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底一

部分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對於他，這個機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若與這個機體比較起來，則很少意義。無產者以最大的奮不顧身的精神，以無名大眾底細胞資格——毫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圖謀個人榮譽——而進行着自己的鬥爭。他在自己所被指定的任何一個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職責，自願服從着那浸透其全部感覺，浸透其全部思惟的紀律。

而知識分子則完全不是如此。他不是這樣或那樣運用力量來進行鬥爭，而是運用論據來進行鬥爭。他的武器——這就是他個人的知識，他個人的能力，他個人的信念。他只憑靠自己個人的品質，才可獲得相當的意義。因此，在他看來，自己個性表現底完全自由，是順利工作的第一個條件。他只能勉強強強以某個整體底附屬部分資格服從這個整體。是迫於必要而服從，而不是出於本人意願而服從。他承認必須要有紀律，是僅僅對於羣衆，而不是對於上等人。而至於他自己，那他當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

……尼采底哲學，及其對於超人的崇拜——這個超人認為全部問題都在於保證其自己個性底完滿發展，這個超人覺得，使他個人在任何程度內服從任何偉大的社會目的，都是下賤可恥的事情，——這個哲學是十足的知識分子的宇宙觀，這個哲學使知識分子完全不中用於參加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

除尼采而外，易卜生也是適合於知識分子情緒的知識分子宇宙觀底出色代表。易卜生底醫生司托克曼（在『人民公敵』戲劇內）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而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底典型，他必然會與無產階級運動，一般就是與任何人民運動，——如果他竟企圖在這個運動中有所動作的話，——發生衝突的。這是因為尊重多數同志的態度是無產階級運動——如任何民主運動一樣——底基礎。司托克曼一類的典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緊密團結的多數」看作應被推翻的猙獰怪物的。

……李卜克內西是社會主義運動所需要的知識分子的理想模範，他週身都浸透了無產階級情緒。他雖是燦爛的作家，但他已把知識分子特有的心理特點喪失無餘。他曾毫無怨言地在行列中行進，他曾在他所被指定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他把自己完全服從我們的偉大事業，並鄙棄那些按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們在落到少數地位時！就往往發出的說什麼自己個性受到壓抑的頹唐的啜泣。在這裏還可舉出馬克思，他是從來也沒有想出風頭，而曾模範式地服從着他在那裏不只一次處於少數地位的「國際」中的黨的紀律。」（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十三章）。

集中制（由統一的黨的中央來領導），無論何時，都是我們黨最重要的組織原則。這個集中，在我們黨內是同民主聯結在一起的。就是說，同全體黨員積極地參加黨的工作、黨機關的選舉、地方組織的自由（有地方意義的事務之獨立性——原註）打成一片。（卡圖諾維契：『聯共黨是怎樣組織的』）。

……人們高談民主。但什麼是黨內民主呢？是對於什麼人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理解為對一兩個脫離了革命的知識分子有無限制地空談的自由，有自己的機關報的自由等等，那末這一種『民主』我們是不要的，因為這是對於極少數人的民主，是破壞極大多數人意志的民主。如果把民主理解為黨員羣衆有解決我們建設底各種問題的自由，理解為提高黨員積極性，吸收他們去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及發展他們在黨內的主人翁的感覺，那末，這一種民主我們是有的，我們是需要的，而且我們將百折不回地，不顧一切地發展它。（斯大林：『在聯共中央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真正的民主主義是在於使黨的羣衆在黨的組織內活動起來，使黨的羣衆解決黨的以及一般實際的問題，使黨的羣衆製定自己的決議並督責自己的組織把這決議付諸實行。

民主主義不只是民主的選舉。選舉的民主主義還不能稱為真正的民主主義。：

：我們所說的是行動的民主主義，這時黨的羣衆自己解決問題和自己動作起來。因此我們說，恰恰就是這樣的民主主義應當成爲我們社會民主組織的基礎。（斯大林：『梯夫里斯黨組織改組』）。

民主應當依據條件來考察，在黨內民主問題上的偶像化是不應當的，如衆所周知，因爲黨內民主的實行依據於每一時機的具體條件、時間和地點。（斯大林：『在聯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十七年來，尤其是五中全會以來的黨的鬥爭經驗，證明了有在黨內、八路軍與新四軍內，繼續堅持鐵的紀律的必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羣衆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在過去，由於克服了張國燾一類破壞紀律的傾向，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抗日戰爭的順利執行。在今後，又必須堅持這種紀律，才能團結全黨，克服新的困難，爭取新的勝利。在些裏，幾個基本原則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鬥爭以極大損害。爲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那些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

教育。過去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燾一類，則利用一部分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所以紀律教育，不但在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監督黨的領導使之服從紀律也有其必要。黨的紀律是帶着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幹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爲此原故，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着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後，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並使之成爲全黨的模範。（毛澤東：『論新階段』）。

處在偉大鬥爭前面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與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領導鬥爭向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話，必須具體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與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與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等等上面。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沒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達到發揮積極性之目的。大批能幹人材的創造，也只有有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於我們國家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反映到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

象，這種現象，實在妨礙着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衆運動中，民主化之不足。爲此原故，必須在黨內實施民主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與集中制的聯系，並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了黨內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於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義。

在軍隊中的黨，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鬥力。但同時，軍隊黨的民主應少於地方黨的民主，應是爲着鞏固軍隊紀律與增強戰鬥力的，而不是削弱紀律與戰鬥力。在地方黨，也應該是有利於鞏固黨的紀律與增強黨的戰鬥力，而不是相反的。

擴大黨內民主，是鞏固黨與發展黨的必要步驟，是使黨在偉大鬥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鬥難關的有用的與重要的武器。（同上）。

反對黨內幾種不正確的傾向

以下的四段文字，是從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紅軍第四軍在閩西古田所召開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摘出來的。毛澤東同志起草的這個決議，是我黨建黨建軍的最寶貴文獻之一，其中許多部分直到今天，還有其現實意義。

極端民主化

一、紅軍黨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確實減少了許多，如黨的決議之比較的能夠執行，『由下面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口號之沒有人說了，都是事實。但在實際上，這種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決不是在一般黨員的觀念裏頭，根本肅清了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

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毒根還深中在許多同志的心中，如決議案之執行，種種表示勉強的態度，就是根據之一。

二、糾正的方法：

第一，是從理論上掃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担负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必然走到革命的失敗，同時亦就是幫助了統治階級反革命壽命的延長。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農民生產及城市小資本）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客觀上實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種。具有這種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糾正而任他發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向反革命道路。

第二，是在厲行組織上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綫是：

（一）黨的指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綫，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國。

（二）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情況及羣衆生活情況，成爲正確指導的社會來源。

(三) 黨的各機關決議事情，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便須堅決執行。

(四)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的傳達到下級機關及黨員羣衆，其方法就是開活動分子會，或支部以及縱隊的黨員大會（須看環境的可能），派人出席報告。

(五) 黨的下級機關及黨員羣衆對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非組織意識

四軍黨內非組織意識，表現在各方面的很多，最顯著的有如下三種：

一、非少數服從多數：

如提議被否決，表現非常的嘔氣及不誠意執行黨的決議案，都是這一種的例子。

糾正的方法：

(一) 會議上要使到會人盡量發表意見，明瞭對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決，二次再議（以不妨碍工作爲條件），期於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 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意見在黨的第一次會議失敗後，後一次會議未開之前，必須擁護多數的決議，除在後一次會議得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二、非組織的批評：

(一) 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並增強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但紅軍黨內的批評很多不明白這種意義，而誤用了去攻擊個人；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而且毀壞了黨的組織，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識的表現。糾正的方法，在於使黨員明白批評的意義，是增加黨的戰鬥力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而完全不能利用批評去做個人攻擊的工具。

(二) 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批評，這是因為沒有建設黨的組織的政治意義於一般黨員的觀念之中，因此不懂得黨的組織（會議等）的重要，以為批評在組織內、組織外沒有什麼區別的原故。這種結果亦足引導黨走上毀壞的道路。糾正的方法，就是建設黨的組織的政治意義於一般黨員的觀念之內，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肅清一切不負責任的給羣衆以壞影響的非組織的批評。

(三)、略

絕對平均主義

一、紅軍中絕對平均主義，曾經有一時期發展得很厲害，經過多少鬥爭，確實減少了好些，但還有許多渣滓殘存着。如給傷兵的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爲工作需要，而認爲不平等制度；分東西要求極端平均，不願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請米不開大人小孩，體強體弱，只要平均措；分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打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爲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付担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願大家拾不成，不願一個人拾了去。以上這些例子，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絕對平均主義並沒有從羣衆的頭腦裏根本的去掉。所謂去掉了些，只是部分的或形式的罷了。

二、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實在是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的一樣，都是手工業小農經濟的產品，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質方面罷了。

三、糾正的方法：在理論上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時期，物質的分配亦當按照個人及工作的需要，決然無所謂絕對平均。在紅軍內物質的分配，應該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餉平均等，因爲這是現時環境中紅軍鬥爭的需要。但必須反對

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

唯心觀念

一、唯心觀念，在紅軍黨員中非常濃厚。其結果，對政治分析、對工作指導、對黨的組織，都有非常之大的妨礙。因為政治上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於黨內唯心的批評精神，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其結果，往往釀成黨內無原則無意義的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於黨內批評問題，除開唯心的批評精神之外，還有應該要說及的，就是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批評的任務，不明白最大的是指出政治錯誤，其次才是指出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生活缺點及小的技術方面，如果不是與政治及組織的錯誤有密切的聯系，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技術的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尋常技術方面，人人變成寸謹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記黨的任務，這是最大的危險。紅軍黨內技術的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是和唯心的非科學的批評精神一樣，必然要得到（而且已經得到）它的最壞的結果。

二、糾正的方法，唯一的是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肅清唯心的和技術的精神。說話要有證據，討論要注意它的政治意義。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馬克思和列寧說：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之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還將存在；只是在共產主義之下，這個差別才會消失。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之下，『工資』也應按照各人勞動而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而發給。可是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竟不同意這點，却以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失了。究竟是誰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對呢？抑是平均主義者對呢？應該認為，在這裏馬克思和列寧是對吧。（『新環境和新經濟建設任務』）。

我們再舉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而且差不多是很初步的。

然而在一部分黨員中，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宜

佈勞動組合爲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那末，黨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就由公社，由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退回到低級的形式。試問爲什麼呢？原來是因爲在勞動組合中沒有平等，因爲在勞動組合裏，在各組員們底需要上和個人生活上保存着差別，而在公社中却有平等，因爲在公社裏，各社員們底需要和生活狀況都是均等的。但是第一，在需要方面和個人生活方面實行均衡、實行平均制的那種公社，在我們這裏已經不存在了。實踐已經證明，如果公社不放棄均等制，不在事實上轉變到勞動組合底狀況，那它就一定已經滅亡了。所以，根本就用不着援引在世界上已經不存在的東西。第二，任何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制度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謬論，這種謬論是只適合於某種原始的禁慾主義教門，而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因爲決不可能要求所有一切人彼此一樣的需要和口味，決不可能要求所有一切人過着一個模樣的個人日常生活。而最後，難道在工人中間不是也保留着一種在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差異嗎？這是不是說工人是比農業公社社員離社會主義離得遠些呢？

這些人顯然認爲社會主義是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的個人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平均起來，劃一起來，均等起來的。不待說，這種設想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

義毫不相干的。馬克思主義所瞭解的平等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第一，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是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一切人都是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三，一切人都有按其所能而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其勞動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第四，一切人都有按其所能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其所需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在這裏，馬克思主義底出發點是：各人底口味和需要，無論就質量或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在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和彼此平等的。

你們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馬克思主義未曾承認而且現在也不承認其他任何平等。

如果由此做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起來，劃一起來，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口味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計劃，一切人都應管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同樣的飲食——那就是庸俗的說法和誹謗馬克思主義了。

馬克思主義是平均制度的敵人，瞭解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到了。馬克思和恩格

斯還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痛斥那種原始的空想社會主義，並因為它鼓吹『普遍禁慾主義和粗鄙平均思想』而稱它為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一書中，曾闡出整整一章來痛斥的批評杜林所提出來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那種『急進派的平均思想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曾說：

『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是歸結於要求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列寧也這樣說：

『恩格斯寫得千真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竅不通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曾企圖藉口於平等概念來誣賴我們，硬說我們想把一切都弄得一模一樣。他們曾企圖拿他們自己臆造的這個謬論來歸罪於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由於自己昏暗無知而不知道社會主義者——而且正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平等二字若不瞭解為消滅階級，那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是想消滅階級的，而正是在這一方面我們主張平等的。可是，如果期望我們能把所有一切人都弄得彼此一模一樣，那就是最空洞的詞句，就是知識分子的拙劣的杜撰了。』（列寧：『論用自由平等口號來欺

騙羣衆的把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二九四頁）。

這樣看來是明白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描寫成爲一切都服從平均『原則』的舊時沙俄營房，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對資產階級的作家們這種無知與愚鈍負責的。

（『聯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各位參議員先生，各位同志：今天邊區參議會開幕，是有重大意義的。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不能有任何別的目的，只能有這個目的。因為我們的敵人不是國內，而是國外的，是德意法西斯，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蘇聯英國美國聯合一致，反對德意法西斯侵略，蘇聯紅軍正在為全人類的命運奮鬥。我們的目的同他們一樣，唯一的在於反對德意日法西斯。日本還在繼續侵略，它要消滅中國的獨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中國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中國各黨派各階級各民族合作，只要是中國人，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鬥。共產黨的這種主張，是始終一致的。中國英勇抗戰已有四年多，這個抗戰是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的，是由國共合作及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的合作來支持的。但是還沒有勝利，還要繼續奮鬥，還要使三民主義見之實行，才能勝利。

爲什麼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爲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直到現在還沒有在全中國實現。爲什麼不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當然是一個更好的制度，這個制度在蘇聯早已實行了，但在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實行的條件。陝甘寧邊區所實行的都是三民主義，任何一個建設，任何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沒有超過三民主義的原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要爲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爲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各階級各民族都要有人權政權財權，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都要各得其所。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中間階級的利益，如果中間階級不得其所，如果中間階級沒有說話權，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事做，沒有書讀，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及其他各項政策，都是爲着團結一切抗日人民的，顧及一切階級，而特別是顧及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的政策，是真正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使農民有衣穿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地主有衣穿有飯吃。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扶助工人的政策，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

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如此等等，都是爲了團結全民，以便合力抗日，合力建國。這樣的政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就是三民主義的政策。既不是所謂一黨專政，也不是外國的舊式民主，而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這是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民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的原則。這就是傾聽羣衆意見，要聯系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的原則。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爲了防止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同志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應該跟別人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爲是，盛氣凌人，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敵人漢奸以及破壞抗戰與團結的人們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不要緊的。國事

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同志們，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教育，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辦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的態度和作風。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與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敢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綫的。同時也要使各位黨外同志贊成我們的主張，瞭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强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個叫做內外夾攻，把毛病治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各位參議員先生不惜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的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宣傳指南

列寧是怎樣進行宣傳的

一八九三年末，列寧移居彼得堡。列寧在彼得堡最初的一些發言，就在彼得堡馬克思主義小組參加者中間刻上強烈的印象。非常精通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善於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當時俄國經濟政治環境的才能，確信工人事業勝利的熱烈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卓越的組織天才——所有這一切，就使列寧成了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公認的領導者。

列寧受到那些在他所指導的小組裏聽講的先進工人們熱烈的愛戴。

工人巴布石金，當回憶到列寧在工人小組裏上課情形時說：「我們所聽的講演，是帶有很活潑的，很有興味的性質，我們大家都十分滿意這些講演：我們講師的智慧，是經常令我們贊歎佩服的。」……

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當在某一個工廠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裏的情形的，——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曾揭露廠主盤剝虐待工人的事實，曾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曾寫着工人們的要求。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的腐爛，關於工人們的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的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情實況，揭露無餘。在這些傳單裏，就提出了相當的政治要求。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工人罷工書。一八九五年秋天，列寧寫了發給托爾通工廠罷工男女工人的傳單。這個工廠是屬於英國廠主們的，他們獲得了幾百萬的利潤。在這裏，工作日是延長到十四小時以上，而每個織布工人每月所領得的工資，却不過七個盧布。罷工的結果，是工人獲得勝利了。在很短時間中，「鬥爭協會」就印發了幾十種這樣的告各工廠工人的傳單和宣言。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蘇聯共產黨歷史』一九——三一頁）。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羣衆化

我們需要組織羣衆來實行我們的決議。僅僅靠我們的思想，——政治的影響是不夠的。我們應當剷除對運動底自發性的期望，這是我們的基本觀點之一。我們應當記得：如果沒有百折不回的、長期的、耐煩的、往往似乎沒有什麼效果的組織工作，羣衆是不會飄流到共產主義的岸邊來的。而爲了善於組織羣衆，我們就要學會列寧斯大林的藝術，把我們的決議不僅變成爲共產黨員所了解的東西，而且變成爲廣大的勞動羣衆所了解的東西。應當學會用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羣衆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與羣衆說話，這種戰士的每一句話，每一息思想，都要反映出成千百萬羣衆底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不是時常會簡單地、具體的、形象的、親切地、爲羣衆懂得地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熟記的抽象的公式。實在的，你們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它們是寫得如此深奧，甚至於連我們黨的工作人員都難懂，更用不着說普通工人了。

同志們，如果想一想：工人們，尤其是在法西斯蒂的國家裏，在散佈和閱讀這

些傳單的時候，冒着犧牲自己的性命的危險，那末，我們就更加明瞭，必須用爲羣衆所懂得的文字來寫，以便使所遭受的犧牲，不致於成爲徒然無益。

我們的口頭宣傳和鼓動，也是一樣。在這裏，應當老實不客氣地說：法西斯蒂往往比我們的許多同志還要靈活些，巧妙些。

比方，我現在記起希特勒上台執政以前在柏林舉行的一次失業工人大會。當時，著名騙子和投機大家斯克略列克兄弟底案子已經審問了幾個月，再三遷延着。在大會上發言的國社黨的演說家，利用這案子來達到自己籠絡人心的目的。他歷數斯克略列克兄弟底詐欺取財，賄賂收買以及其他種種罪惡後，便着重說道，他們的案子已經遷延了好幾個月，德國人民因爲審判這件案子，已經花費了幾十萬馬克的金錢。在聽衆掌聲雷動中，他說，像斯克略列克這一類的匪徒，是應當立刻槍斃的，而在審判時所花費的金錢，應當發給失業工人。

當時有一個共產黨員站起來要求說話。大會主席最初沒有許可，可是，在願意聽一聽共產黨員意見的聽衆的壓力下，不得不給他說話。當這個共產黨員走上講台的時候，所有到會的人都聚精會神起來，要聽一聽共產黨的演說者說些什麼話。但是，他說了些什麼呢？他提起嗓子說：

「同志們！共產國際執委底全會剛才完結。全會指出拯救工人階級的道

路。同志們，全會在你們面前提出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奪取工人階級底多數」。(笑聲)全會認為，應當使失業工人底運動「政治化」。(笑聲)全會號召把失業工人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笑聲)」

這個演說者往下所說的話，也是這一套，顯然，他認為是在「解釋」全會底真正的決議。

這一種演說能不能夠奪得失業工人呢？起初準備把失業工人政治化，其次革命化，然後再動員他們以便把他們的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這能不能夠使他們滿意呢？(笑聲，鼓掌)

我當時坐在會場屋角裏，很痛心地看見：到會的失業工人，很想聽聽共產黨員底說話，以便知道，他們具體地做什麼——現在開始打起哈欠來了，顯然感覺失望。因此我絲毫也不覺得奇怪，當主席用粗魯態度停止我們的演說者底發言的時候，在會場上，沒有任何反對……。

可惜，這並不是我們的鼓動工作中唯一無二的例子。這一種事情不僅在德國有過。同志們，這樣去鼓動，這就是鼓動他人來反對自己，說得客氣一點，也不過是小孩子的鼓動方法。永遠拋棄這種鼓動方法的時候已經到了。

在我作報告的時候，主席庫西寧同志，從大會場上收到寫給我的一封信，這封

信，是很值得注意的。我現在把這封信讀給你們聽。這封信上寫道：

『我請你在說話的時候，提到一個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將來的一切決議案，都應當用很通俗的文字寫出來，以便不僅受過訓練的共產黨員懂得，而且無論那一個毫無訓練的勞動者，讀到共產國際的文件時，立刻就懂得；共產黨員想做什麼，共產主義給人類一些什麼好處。某些黨的上層分子忘記了這點，應當使他們記得這件事情，而且應當使他們很牢固地記得這件事情。共產主義的鼓動，也應當用通俗易解的語言來進行。』

這封信的作者是什麼人，我不很清楚。但是我毫不懷疑：這一封信是表示了千百萬工人底意思和願望。許多同志認為：高深的話，羣衆不懂的公式和提綱，越是用得多，則他們的宣傳和鼓動也愈好。他們忘記了：正是現代工人階級底偉大領袖和理論家列寧和斯大林，在說話和寫東西的時候，總是用廣大羣衆最了解的語言和文字。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做法律，當做布爾塞維克的法律。

當你做東西做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想到普通工人，他該得懂得你，相信你的號召，決心跟着你走！應當時刻想到：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

。(鼓掌) (『季米特洛夫文選』，一〇七——一三三頁)。

魯迅論創作要怎樣才會好

編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却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 (速寫)，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 五、看外國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话。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復，即請
編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一年）

（答北斗雜誌問，『魯迅全集』卷四，三五三——三五四頁）。

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的應用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

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嚴密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論新階段』，一〇二——一〇三頁）。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爲着實行布爾塞維克化，至少必須努力做到若干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化，一般的是不可能的。

第一、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爲國會選舉機構的附屬物——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樣，也不能看成爲職工會底不要錢的附加品——如同某些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分子自時對於這點所反覆說的那樣；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負責領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自職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

第二、必須使得黨，特別是它的領導者，完全地精通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第三、必須使得黨在製定各種口號和指示時，不是根據讀熟了的公式和歷史上的類比，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的具體條件——國內的和國際的具體條件周密分析的

結果；同時必須顧計到各國革命的經驗。

第四、必須使得黨在羣衆革命鬥爭底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底正確性。

第五、必須使得黨底全部工作——特別若是黨裏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還未滅絕的話——改造起來，建築在新的、革命的步調上，它使得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羣衆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養和教育工人階級底廣大羣衆。

第六、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要把這與宗派主義相混淆！）和與羣衆的最大限度的聯系及接觸（不要把這與尾巴主義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不僅不可能教導羣衆，而且也不可能向羣衆學習；不僅不可能引導羣衆和把羣衆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羣衆的呼聲，以及誰知羣衆的迫切需要。

第七、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要把這與革命的冒險主義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不要把這與遷就行為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便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與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底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並且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第八、必須使得黨不掩藏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而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上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第九、必須使得黨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底優秀分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這些優秀分子是十分忠實的，足以成爲革命無產階級之意向底真正的表達者；並且他們是十分有經驗的，足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領袖、善於運用列寧主義底策略和戰路的領袖。

第十、必須使得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底社會成份，清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分子，以便達到最高限度的一元性。

第十一、必須使得黨創立起來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基於思想底一致性、運動底目的之明確性、實踐行動的統一性及廣大黨內羣衆對黨的任務之自覺態度而長成起來的。

第十二、必須使得黨有系統的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之執行。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文的危險，這只能破壞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對於黨的信任。

沒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條件，布爾塞維克化便是空談。（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塞維克化』，見『真理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聯共黨史』結束語

布爾塞維克黨所已經歷的歷史道路底基本總結是怎樣呢？

蘇聯共產黨（布）底歷史是教訓我們什麼呢？

一、黨史首先就教訓我們說：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它是不受機會主義沾染的，是對妥協者和投降主義者採取毫不調和態度的，是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採取革命態度的，——就沒有可能。

黨史教訓我們說：使無產階級沒有這樣的黨，就是使無產階級沒有革命的領導，而使無產階級沒有革命的領導，就是使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遭受失敗。

黨史教訓我們：普通的西歐式的社會民主黨，是不能成爲這樣的黨的，因爲普通的西歐式的社會民主黨是在國內和平條件下訓育出來的，是跟着機會主義者做尾巴的，是夢想『社會改良』而害怕社會革命的。

黨史教訓我們說：只有新式的黨，才能成爲這樣的黨，這新式的黨，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社會革命底黨，這個黨是能够準備無產階級去和資產階級決戰並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的。

這樣的黨，在蘇聯，就是布爾塞維克黨。

斯大林同志說：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黨，乃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是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底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在事實上，黨在

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之下，當然是談不到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按新的革命的風格去改造整個黨的工作，培養工人以爭取政權而進行革命鬥爭的精神，準備和吸引後備力量，與鄰國無產階級聯盟，與殖民地和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系，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制度和平條件中訓育出來的陳舊的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担负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面以陳舊的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樣的情形的。

因此，就必需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為爭取政權而鬥爭；這個黨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這樣機敏，以至於足以繞過那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一切和任何暗礁。

如果沒有這樣的黨，那就甚至於莫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莫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這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二至六三頁）。

二、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的黨，如果它沒有精通工人運動底先導理論，如果它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那它就不能實現其為本階級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力量，就在於它給黨以可能來在任何環境中確定方針，來了解周圍事變底內部聯系，來預見事變底進程，來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而且知道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

只有已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黨，才能够有信心地向前進展和領導工人階級前進。

反之，那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黨，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失去在自己行動中的信心，沒有能力領導工人階級前進。

有人也許覺得：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誠心來讀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中所有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學會按時引證這些結論和原理而以此自慰，並希望已讀熟的結論和原理將能適宜於任何環境，將能適宜於一切

實際情形。然而，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不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看成是教條集錄，看成是教義問答，看成是信仰象徵，而把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看成是咬文嚼字者和讀死書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乃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它既然是科學，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個地點，——它是發展着和完善的。不言而喻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能不以新經驗和新知識來豐富自己，而它的個別理論和個別結論，則不能不因時間變遷而變更，不能不由那些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要讀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並拘守這些公式和結論的每一字句。爲要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首先就必須學會區別它的字句和實質。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並學會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來運用這個理論。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以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要善於以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要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而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代替其某些已經

過時的原理和結論。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

在第二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由以下一點出發，就是認為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乃是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適宜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固然，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指出：不是國會制的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最適宜的形式。然而，很可惜的，馬克思底這個指示，並沒有在馬克思底著作裏得到繼續的發展，因而便付諸遺忘了。此外，恩格斯在其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中（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有信心的聲明——「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特殊的形式」，也是無容置疑的說明：馬克思主義者正是繼續認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治形式。恩格斯底這個原理，後來就成為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也是對於列寧——的準則。然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的革命，却提出了新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工農代表蘇維埃，根據對於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的研究，列寧從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並不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這一點，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說在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中，就提出組織

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最好政治形式的口號。各國機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國會制的共和國，而責備列寧為脫離馬克思主義，為破壞民主。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的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它拉向後退，把他的各原理中的一個原理變成教條。

如果列寧曾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而不敢用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新原理，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各舊有原理中的一個由恩格斯所規定的原理，那末，黨、我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末，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蘇維埃就會陷於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恩格斯和馬克思研究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曾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所有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這個結論以後就成為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準則。但是，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已轉變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向上的資本主義已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

根據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研究，列寧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各國機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責備列寧爲脫離馬克思主義。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爲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的經驗把他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他拉向後退，把他變成僵尸。

如果列寧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如果他沒有充分的理論上的勇氣去拋棄馬克思主義各舊有結論中的一個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社會主義有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可能的新結論，那末，黨、我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末，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就開始衰頹起來。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機會主義並不時時都是直接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這個理論底個別原理和結論的。機會主義有時還表現於企圖拘守馬克思主義底個別已經過時的原理並把他們變成教條，以便這樣來阻止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因此也就是來阻止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之發展。

可以毫不誇大的來說：在恩格斯死後最偉大的理論家——列寧，而在列寧以後，斯大林以及其他列寧門生——乃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他們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在無產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用新經驗來豐富了它。

正因為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的發展，是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已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布爾塞維克黨底先進幹部，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把這個理論看作是行動指南，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來豐富它，那末，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會不能獲得勝利了。

恩格斯在批評那些任在美洲並以領導美洲工人運動為己任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時，曾寫道：

「德國人沒有善於把自己的理論變成能把美洲羣衆發動起來的槓桿。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下是連自己都不懂得這個理論，却把它看作是教義和教條，他們認為必須把這個理論背得爛熟——而這樣就足以應付一切實際情形了。在他們

看來，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〇六頁）。

列寧在批評加米涅夫以及某些老布爾塞維克時，——這些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曾拘守着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舊公式，而當時，革命運動已向前進展而要求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在批評這些人時寫道：

『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總只這樣說，他們會很公平地譏笑那些背誦和簡單重複『公式』的行爲，因為這種『公式』最多只能提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必須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底具體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而改變其形態的……。必須領會那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估計到實際中的確定的事實，而不是繼續拘守着昨天的理論……。』（『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〇至一〇一頁）。

三、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如果不粉碎那些在工人階級隊伍中活動的，把工人階級落後階層推到資產階級懷抱中去的，並因此而破壞工人階級統一的小資產階級黨，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就是不可能的。

我們黨底歷史，乃是爲反對小資產階級黨『社會革命』黨人、孟塞維克、無軌

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而鬥爭並將它們粉碎的歷史。如果沒有克服這些黨並把它們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驅逐出去，那就會沒有可能達到工人階級底統一，而沒有工人階級底統一，那就會沒有可能來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

如果沒有粉碎這些起初主張保存資本主義、而往後——在十月革命以後——則主張恢復資本主義的黨，那就會沒有可能來保持無產階級專政，來戰勝外國武裝干涉，來建成社會主義了。

不可把這樣的事實當作偶然的，就是所有這些為欺騙人民起見而以『革命』黨和『社會主義』黨自稱的小資產階級黨——『社會革命』黨人、孟塞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還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已成為反革命的黨，而在後來，却已變成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的走狗，已變成間諜、暗害者、軍事破壞者、殺人兇手和賣國賊匪幫了。

列寧說：

『在社會革命時代，只有馬克思主義底極革命的黨，只有以無情鬥爭來反對其他一切黨，才能够實現無產階級底統一。』（『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五〇頁）。

四、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黨，如果不向自己隊伍的機會主義者作

不調和的鬥爭，如果不粉碎自己的隊伍的投降主義者，就不能保存自己隊伍底統一和紀律，就不能實現其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爲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者的作用。

我們黨內部生活發展底歷史，乃是爲反對黨內機會主義集團——「經濟主義者」、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義傾向者而鬥爭並將他們粉碎的歷史。

黨史教訓我們說：所有這些投降主義者集團在實質上都是孟塞維主義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是孟塞維主義底餘孽，孟塞維主義底繼續。他們也如孟塞維主義一樣，在工人階級中和在黨內，執行了資產階級影響底傳達者的作用。因此，在黨內爲消滅這些集團而鬥爭，乃是爲消滅孟塞維主義而鬥爭之繼續。

如果我們沒有擊破「經濟主義者」和孟塞維克，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建成黨並引導工人階級去實行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我們沒有擊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準備爲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須的條件。

如果我們沒有擊破一切和各色民族主義傾向者，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以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人民，就會不能保持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底旗幟，就會不能建成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有人也許覺得：布爾塞維克化費了太多的時間去進行反對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布爾塞維克過分估計了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底意義。然而，這是完全不對的。不可在自己內部容忍機會主義，正如不可在健全身體上容忍毒瘡一樣。黨是工人階級底領導部隊，是工人階級底前方堡壘，是工人階級底戰鬥參謀部。在工人階級底參謀部中，是不可容許那些缺少信念者、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和叛徒們立足的。如果在自己的參謀部中，在自己的堡壘中存留有投降主義者和叛徒，而去和資產階級作殊死鬥爭，那就是陷於腹背受擊的地位。不難瞭解：這樣的鬥爭是只會得到失敗結局。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的。爲要達到勝利，首先就必須從工人階級底黨內，從工人階級領導參謀部內，從工人階級底前方堡壘中把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叛徒們清除出去。

不可把這樣的事實當作偶然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民族主義傾向者，既然反對列寧，既然反對黨，所以結局也如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結局一樣，就是說，變成法西斯偵探機關的走狗，變成了間諜、暗害者、殺人兇手、軍事破壞者和賣國賊。

列寧說：

一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塞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所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曾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頁）。

斯大林同志說：

「如果我們黨已經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的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會能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它會能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孟塞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分子而固鞏起來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二頁）。

五、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如果黨內被成功所薰醉而開始驕傲起來，如果黨已不復看見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黨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及時來公開和誠懇糾正這些錯誤，那末，黨就不能實現其為工人階級領導者的作用。

如果黨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黨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如果黨是在黨工作的錯誤中來教育和訓練幹部，如果黨善於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末，黨就是不可被戰勝的。

如果黨隱瞞自己的錯誤，抹殺一切困難的問題，用百事大吉的虛誇來掩蓋自己的缺點，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浸透自滿情緒，一味自高自大，並開始高枕而臥，那末，黨就會不免於滅亡。

列寧說：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這個黨是否鄭重和它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那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黨鄭重底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其次：

「迄今以前一切革命黨之所以陷於滅亡，就是由於它們自傲和不善於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並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且學會克服弱點。」（『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二六〇至二六一頁)。

六、最後，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黨，如果和羣衆沒有廣泛的聯系，如果不經常鞏固這些聯系，如果不善於傾聽羣衆底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如果沒有不僅去教導羣衆，而且去向羣衆學習的決心，那末，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羣衆的黨——有能力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全體勞動羣衆的黨。

黨如果善於像列寧所說的那樣『與極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他們融成一片。』(『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那末，它就是不可被戰勝的。

黨如果在自己狹隘的黨範圍內閉戶幽居，如果它與羣衆隔絕，如果他用官僚主義的灰塵掩蓋着自己，那末，它就會陷於滅亡。

斯大林同志說：

『只要布爾塞維克是保持着與廣大民衆的聯系，那他們就會是不可被戰勝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失掉自己與羣衆的聯系，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臘人的神話中，曾有一個著名的英雄，他名叫安泰；據神話所說：他的父親是海神波賽東，他的母親是地神蓋婭。他非常愛慕自己這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的母親，這安泰很有力量，任何英雄都戰他不過；因此大家都叫他無敵英雄。他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於每當他與敵人決鬥而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在他身上，就是說，在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靠一靠，於是就得到新的力量。可是，他終究還有自己的弱點，就是害怕人家用某種方法使他脫離地面。敵人因為知道他這個弱點，所以就時刻暗中窺伺他。有一次，他碰到了一個敵人，這敵人利用了他這個弱點，並戰勝了他。這敵人名叫蓋爾枯里斯。可是，這敵人是怎樣戰勝他的呢？原來，這敵人設法使他離開了地面，把他舉在空中，使他失去與地面接觸的可能，於是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為布爾塞維克，也好似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一樣。也正好似安泰一樣，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聯系。而只要是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保持着聯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戰勝者。

布爾塞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被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斯大林）

「論黨工作缺點」)。
以上各點，就是布爾塞維克黨所已經歷的歷史道路底基本教訓。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 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的與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二)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單位將所號召者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此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則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便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及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及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

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典型的具體幹部之歷史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與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的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亦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亦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與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向下級具體單位的具體人員、具體事件學習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具體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行政首長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與參加學習的廣大羣衆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羣衆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變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則羣衆積極性既不能持久，又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與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羣衆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與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而這三部分人的比例，又大致都是兩頭小、中間大。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藉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領導

骨幹，必須是從羣衆鬥爭中（例如整風學習）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羣衆鬥爭所能形成的。任何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與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是也不可能完全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的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英雄）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拙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及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比較地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第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中去。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羣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無論是執行整風學習，检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其他任何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均須採取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系統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

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向羣衆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或方法論。

(五) 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均必須在此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此問題上存在着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與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與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與廣大羣衆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與不善於總結羣衆鬥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與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地接着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爲官僚主義的領導。此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會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 正確的領導意見是從羣衆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意見，這

是基本的方法論。在集中與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叫別人也是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作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羣衆。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任何工作（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防奸工作等等）上級領導機關都應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該使總負責人與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一件工作可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解決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爲自己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

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首長，惟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夠完滿地達到。

(八) 在任何一個地區、一個機關、一個學校、或一個部隊，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個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最中心的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這在該地區、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與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及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亦不要不分輕重緩急的沒有中心的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與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與工作秩序，並把這一秩序堅持地貫徹下去，而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 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一一說到，由各地同志根據本決定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鬥爭愈是艱苦，就愈

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與廣大羣衆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號號召與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和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與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故爲了反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科學的領導方法。

毛澤東同志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引言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間的正確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於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藉以打倒我們的民族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

在我們爲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綫，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綫，這就是文化戰綫和軍事戰綫。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

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奴隸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以至現在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量勝質」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出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藝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藝運動，在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紅軍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結合起來，彼此都是孤軍作戰，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原故。抗戰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等於與根據地人民的運動相結合，而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的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的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爲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有這樣一些問題，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是否還有

認識得不正確或者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立場。

態度問題。隨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譬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那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朋友，還有一種是自己，這就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三種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法西斯和一切人民的敵人，我們應該不應該給他們「歌頌」呢？絕對不應該，因為他們都是萬惡的反動派。他們在技術上也許有些優點，譬如說他們槍炮好，但是好的槍炮拿在他們手裏就是反動的。我們武裝軍隊的任務是在把他們的槍炮奪取過來，轉過去打倒他們。我們文化軍隊的任務是在暴露一切敵人的殘暴、欺騙及其必然失敗的前途，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朋友，對於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是讚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批評，就要反對。至於對人民羣衆，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

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其背上的包袱，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這個改造過程，而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對象問題，就是文藝做給誰看的問題。在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與在大後方不同，與在抗戰以前的上海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抗戰以後的大後方，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裏的政府把工農兵與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黨政軍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對象。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大後方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了，大後方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

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鍊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爲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在他們裏面，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在新四軍裏面，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就需要做很大的工作。我們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描寫對象與接受對象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言語不懂，你們是知識分子的言語，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言語。我曾經說過，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羣衆不賞識，在羣衆面前把你的資格擺的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

這一套，羣衆就越不買你的貨。你要羣衆了解你，你要與羣衆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裏，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校裏學生子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農兵總是比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了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爲馬列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列主義常識，但是現在有些同

志，却缺少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譬如說，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客觀決定主觀，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裏，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很深的影響。應該很澈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列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列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還要學習社會，就是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它的相互關係和個別狀況，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裏開了三次，大家爲了追求真理，有黨的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爲

這是對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運動，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事實就是：中國打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堅決和對內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大批文藝工作者與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與大後方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與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及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羣衆與如何為羣衆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或這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與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

到一聯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個問題為中心加以說明，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羣衆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甚至還有敵人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派來的掛着文藝招牌的奸細分子，但是除了這些人以外，却都是在爲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從事工作的，許多則是還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羣衆的。但是爲什

麼？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爲着人民大眾而是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爲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爲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爲帝國主義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奴隸文化，奴隸文藝。還有一種文藝是爲特務機關的，可以叫做特務文藝，這種文藝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實質却不出上面三種範圍。在我們，文藝不是爲上述種種人，而是爲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舊形式，我們是並不拒絕利用的，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他就變成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是工人、農民、兵士與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爲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爲武裝起來了的工農即八路军、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爲小資產階級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還在抗日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我們應該聯合他們，但是他們不贊成廣大人民羣衆的民主。他們都有爲他們自己的文藝，我們的文藝不是爲着他們，他們也拒絕我們的文藝。

我們的文藝，應該爲着上面說的四種人。在這四種人裏面，工農兵又是主要的，小資產階級人數較少，革命堅決性較小，也比工農兵較有文化教養。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着工農兵，第二才是爲着小資產階級。在這裏，不應該把小資產階級提到第一位，把工農兵降到第二位。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的問題，他們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就是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看得比小資產階級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些呢？我以爲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

知識分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去參加工農兵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去教育工農兵。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與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與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是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與滿腔的同情，連小資產階級的缺點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工農兵，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民間語言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爲着獵奇，爲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爲着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的鄙棄它們，而偏愛知識分子，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屁股還是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這樣，爲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

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是沒有澈底的解決。要澈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却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澈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屁股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爲工農兵的文藝。

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紛歧、對立、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爲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與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是有些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譬如說文學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爲工農、爲八路軍、新四軍、到羣衆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會說：革命文藝戰綫的不統一是因爲缺乏共同目的，而這個共同目的就是爲工農。這

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有人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羣衆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是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羣衆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爲着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列主義，是羣衆生活和羣衆鬥爭裏完全適用的活的馬列主義，不是單單書本上的馬列主義。把書本上的馬列主義移到羣衆中去，成了活的馬列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一一

爲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如何爲法，這是第二個問題。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爲什麼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出來了。因爲沒有弄清楚爲

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譬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的基礎嗎？都不是，只是從工農兵的基礎，從工農兵的現有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普及也好，提高也好，它們的源泉是從何而來的呢？無論是那一等級的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

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沒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與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也可以說是源泉吧，但這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以這為第一位，便是顛倒的看法。實際上，書本和現成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與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見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批判地吸收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鑑，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成為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與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借鑑古人與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東西也必須借鑑。但這僅僅是借鑑而不是替代，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死人與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倣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和軍事上政治上哲學上經濟學上的教條主義的性質是一樣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

像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地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沒有原料或半製品，你就無從加工，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雖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地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爲什麼呢？因爲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後的文藝却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活的列寧比小說戲劇電影裏的列寧不知生動豐富得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寧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還要做許多完全和旁人一樣的事，而且能够看見列寧的人很少，列寧死後大家再也看不見他了。在這些方面，小說戲劇電影裏的列寧就比活的列寧強。革命的小說戲劇電影等類，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飢餓受壓迫，一方面是剝削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羣衆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羣衆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加工的文藝，只有自然形態的文

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普及的文藝與提高的文藝都是加工過的文藝，那末它們還有什麼區別呢？有程度上的區別。普及的文藝是指加工較少、較粗糙，因此也較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的東西；而提高的文藝則是指加工較多、較細緻，因此也較難為目前廣大人民所迅速接受的東西。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與敵人作殘酷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愚昧，無文化，所以他們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們所急需的與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向他們作普遍的啓蒙運動，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與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使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裏送炭』的問題。所以對於人民，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輕視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者若不高於被普及者，則普及還有什麼意義呢？普及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總是一樣的『小放牛』，總是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與被普及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豈不又變成沒有意義了嗎？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裏，普及

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爲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的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只要是好的，也有指導我們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導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會起破壞作用的。

除了直接爲羣衆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爲羣衆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羣衆中的先進分子，他們一般都已受過羣衆所受的教育，他們的接受能力比羣衆高，因此他們不能滿足於當前的和羣衆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滿足於『小放牛』等等。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需要，暫時還只是幹部的需要，而不是羣衆的普遍需要；適應這種需要應該是一個方針，但是不應該成爲今天的整個方針或今天的中心方針。同時應該了解，爲幹部，也完全是爲羣衆，因爲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

教育羣衆，指導羣衆。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我們爲人民大衆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加工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爲人民大衆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文學藝術中間，既有從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爲被提高了的羣衆所需要、或首先爲羣衆中的幹部所需要的、比較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指導下的、爲今日最廣大羣衆所最先需要的、比較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不是所謂低級趣味）。無論高級的或低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爲人民大衆的，首先是爲工農兵的，爲工農兵而創作，爲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與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與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爲了幹部，主要的還是爲了羣衆。高爾基在主編工廠史，在指導農村通訊，在指導十幾歲的兒童，魯迅也用了許多時間與普通學生通訊。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牆報，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歌唱。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

該和在羣衆中做最低級的文學藝術普及工作的同志發生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羣衆的養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哺養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成其爲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羣衆，表現羣衆，把自己當作羣衆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羣衆才能教育羣衆，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羣衆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羣衆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是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羣衆的目前利益與將來利益的統一爲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與最遠爲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

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與目前的行會主義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種作品，只爲自己以及幾個朋友或少數人的集團所偏愛，而爲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羣衆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隘集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羣衆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羣衆，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在較多的人們中發生較大的益處，才是較好的東西。就算你的『陽春白雪』吧，這也是貴族享用的東西，羣衆還是在那裏唱『下里巴人』，你不去提高宅，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與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爲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爲清高，羣衆是不會批准的。

在爲工農兵與怎樣爲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一切問題，例如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題材問題，寫光明與寫黑暗的問題，團結還是不團結的問題，功利主義還是超功利主義的問題，狹隘功利主義還是遠大功利主義的問題，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我們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爲這個方針而服務。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爲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藝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即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爲藝術的藝術，超階級超黨的藝術，與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階級有黨的社會裏，藝術既然服從階級，服從黨，當然就要服從階級與黨的政治要求，服從一定革命時期的革命任務，離開了這個，就離開了羣衆的根本的需要。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機器中的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和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偉大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螺絲釘，與別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

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文藝的政治、羣衆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爲。思想戰爭與藝術戰爭，尤其革命的思想戰爭與革命的藝術戰爭，必須服從於政治戰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與羣衆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羣衆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羣衆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羣衆中去，爲羣衆所領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並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也是無產階級政治與有產階級政治的原則區別。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政治與政治家狹隘化，庸俗化，也是不對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綫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與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

來。其次，應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大概會更小些。在這一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系的，因而在產生團結的問題譬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就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綫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而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列寧所謂跛了腳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綫的各種力量裏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工農兵，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爲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戰綫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就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這方面

工作做得不够，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我這裏只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零星問題或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羣衆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都是好的或較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羣衆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都是壞的，或較壞的。這裏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與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爲大衆的動機與被大衆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爲個人的動機與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爲大衆的動機但無被大衆歡迎對大衆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爲（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抗戰團結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

衆、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抗戰團結的。按照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評，或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爲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即使是很高級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世界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的的方法論。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與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與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階級社會與無論什麼階級社會中各別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二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程度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排斥其反動的政治性，而只批判地吸收其藝術性。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例如，法西斯的文藝就是這樣。內容愈反動的作品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沒

落時期一切剝削階級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政治內容與其藝術形式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文藝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綫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存在着的。許多同志有着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爲問題的，我以爲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主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却說成爲唯一的人性，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文藝理論基礎的所謂『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更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

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我們與無產階級處於同一命運，和我們的生活與無產階級打成一片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原無故的愛，也沒有無原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統治階級提倡這個東西，孔夫子提倡這個東西，托爾斯泰也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爲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歸於分裂，階級消滅後社會復歸於統一，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在現時則還是沒有。我們不能愛法西斯，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麼？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與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裏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沒有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爲『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也寫些工作中的缺點，但是這種缺點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羣衆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與黑暗

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羣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的，缺乏歷史唯物論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但人民的缺點主要地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統治他們的結果，我們革命的文藝家們只應該把主作爲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去暴露，而不應該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只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羣衆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把雜文和魯迅筆法僅僅當作諷刺來說，這個意見也只有對於人民的敵人才是對的。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和中國的反動派，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特務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及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可以大聲疾呼，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

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筆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用對付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朋友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三種態度各不相同。我們並不一概廢除諷刺，但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無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劃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世界和歷史的創造者，爲什麼不應該歌頌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爲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人民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的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

加上他的愛人，再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脚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與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立場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要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或者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進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進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面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其實是並沒有懂得的。

「學習馬列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列主義，不過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列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學藝術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們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列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並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那末，馬列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爲是應該的，應該澈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的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三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

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羣衆等等的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完全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那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爲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內部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爲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

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是不能遲死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向敵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整個隊伍在思想上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爲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區別根據地和非根據地，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根據地，不但是兩種地區，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到了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當權的朝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羣衆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如果同志們在新的羣衆中間，還是像我上次說的「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同志想：我還是爲大後方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變的，大後方的讀者，

不需要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的老故事，他們希望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爲根據地羣衆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法捷也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們口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影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羣衆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與羣衆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就是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與羣衆結合，要爲羣衆服務，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間，在今後長期的學習與工作中間，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爲工農兵和人民大衆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一定能夠把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